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
中國合秩序性崛起個案研究

Why Is the US's Unipolar System Still Left Unbalanced ?
A Case Study On China's World Order Confirming Rise to Power

柯斯安
Christian Schmidt

指導教授：徐斯勤博士
Advisor: Philip Hsu, Ph.D.

2009 年 7 月
July, 2009

目 錄

目錄.....	i
表圖目次.....	iii
謝辭.....	iv
中文摘要.....	viii
英文摘要.....	ix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問題.....	5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	
第一節 極、區域極、單極體系、美國霸權.....	7
第二節 超強／霸權、強權、區域大國.....	9
第三節 均勢、權力平衡、秩序.....	11
第四節 制衡、未制衡、低度制衡、軟性制衡.....	13
第五節 和平崛起、正當崛起、合秩序性發展.....	16
 第三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現實主義霸權理論.....	17
壹 均勢優勢、全球布局、極的邏輯.....	22
貳 地緣政治、離岸平衡者.....	25
第二節 軟權力理論.....	29
壹 全球建制.....	30
貳 慈善性、自由主義、現狀、正當性.....	38
第三節 安全理論.....	42
壹 安全建制.....	44
貳 缺乏威脅.....	56
第四節 國內因素與制衡失敗理論.....	61
壹 戰略和意圖皆屬於國內及表層結構.....	61
貳 制衡失敗（施韋勒的低度制衡理論）.....	66
第五節 小結.....	71
壹 全觀未制衡因素.....	72
貳 各理論制衡和未制衡條件的簡表.....	73

第四章 研究假說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提出一套「美國未遭制衡」的研究假說	7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80
壹 假說產生方法基本內涵	80
貳 文獻研究方法	86
第三節 分析架構	89
壹 結構誘因及結構限制	91
貳 中國進入制衡局面	95
參 中國未制衡局面	98
肆 中美關係之全球局面	101
伍 中美關係之區域局面	103

第五章 從中國崛起思考美國未遭制衡

第一節 中國本土的制衡概念	105
壹 未制衡與現狀	107
第二節 未制衡之經濟面向	109
壹 中國發展國家模式之特徵	110
貳 中國闖進世界金融市場	111
參 外匯、匯率、債券	112
肆 中國發展模式、美元陷阱與中國對美政策	117
伍 相互依賴與制衡	119
第三節 中國受到各種制衡誘因卻不制衡（驗證第二個假說）	121
壹 因天安門事件而受制裁之事件	121
貳 炸毀中共駐南大使館事件	127
參 間碟飛機碰撞事件	132
肆 因台灣而引起的對美國宣示批評	134
伍 針對美國霸權的硬批評付之闕如	139
第四節 中國受到不同層次的制衡局限（驗證第一個假說）	141
壹 體系層次的中國實力	143
貳 中國建構和改變其區域環境	146
參 在東亞的中美關係	148
肆 中國未制衡的法理因素	150
第五節 小結：中國未制衡美國的綜觀	156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60
壹 假說二之驗證	160
貳 假說一之驗證	161
參 針對研究問題的回應	161
第二節 本文之整體解釋邏輯及其理論意涵	164

第七章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174
譯文部分	176
西文部分	177
關鍵詞索引	182

表圖目次

表 3-1	冷戰後中國「大國外交」諸理念類型複合發展示意表	21
表 3-2	中國「大國」定位諸理念類型理論偏向表	35
表 4-1	全觀未制衡因素	72
表 4-2	各理論制衡和未制衡條件的簡表	73
表 4-3	層次影響制衡條件示意表	75
表 4-4	假說生產過程示意表	85
表 4-5	層次分析架構表	87
表 5-1	中國的外匯儲備五年綜覽	112
表 5-2	人民幣兌美元十年綜覽	113
表 5-3	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十年綜覽	113
表 6-1	主要國家軍事預算比較簡表	142
圖 4-1	Normal Configuration For Conflict Formation	90
圖 4-2	Restraints Put On the Foreign Domestic Interest Level	92
圖 4-3	Restraints Put On the Regional Interest Level	94
圖 4-4	Scenario (I) for China Implementing a Balancing Policy	96
圖 4-5	Scenario (II) for China Implementing a Balancing Policy	97
圖 4-6	Scenario for China Implementing a Non-Balancing Policy	99
圖 4-7	China US Relations: Global Scenario	103
圖 4-8	China US Relations: Regional Scenario	104
圖 5-1	Summary of China Implementing a Balancing Policy Due to Violated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straints Put On Systemic Interests	159
圖 6-1	Summary of Balancing Due to Violated Interests	172
圖 6-2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Balancing	173
圖 6-3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Non-Balancing	173

謝辭

一、論文背後的幫手

此篇論文從第一個想法到最後的據點，經過多人努力和幫忙，才終於完成。

在此要特別感謝的朋友，包含 Wendy 和 Julia，他們分別對前三章以及最後三章進行修辭和校正工作；Yayi，對整篇論文進行錯字掃描；Vicky，因為她解決各種或大或小的麻煩，讓我能夠及時擺脫困境。沒有上述四位朋友的熱誠幫忙，今天便無法有此論文，在此對各位表達最大謝意。

針對論文寫作過程，要特別感謝徐斯勤老師，因為老師從一開始便發覺我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趣，在他的肯定和鼓勵下，我才放心發揮各種想法，突破框架思考方式，對於制衡理論發揮些許創新。因為我個人喜歡用圖表來思考，老師在看了這麼多個每次因為總結不同思考階段的靈感或心得而我繪畫的圖表和表格後，他總是保留最大可能的容忍和鼓勵，無疑是推動這篇論文最大一股隱藏力量所在。

回頭看，最能夠讓我了解台灣的老師們是王曉波、蕭全政和吳玉山。特別刺激我腦力激盪，讓我在暈頭和憤怒、大開眼界和一頭霧水搖擺不斷的老師們，是石之瑜和陶儀芬。在台大能夠專門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老師不多，我很幸運地能上到朱雲漢和黃光國兩位老師的課，收穫非凡。非常感謝以上各位老師對教學的熱誠和專注，使我受益良多。

在台灣過了三分之一的人生並在台大完成了學士和碩士兩個學位的我，寫完此篇論文也蘊含了一種錯綜複雜的回憶和告別之含意。我與本地人不同在於，他們要趕快修好學分、寫完論文出國。我則充分地享受了每一階段，從大一戰戰兢兢

競的面對第一場期中考，經歷了各種挫敗和突破，到考上研究所，終至撰寫論文，是一個浪漫回憶無窮的心靈旅行。

從遠或近貼身貼心地陪我此心靈旅行最重要的人無疑是我的父母，尤其媽媽來台住五年，至今覺得是一個奇蹟，媽媽是世上愛心最大、最勇敢的人。父母慈愛地全力支持他們唯一的獨生子多年在國外求學，是我未來自己當爸爸的時候才能瞭解的卓越功勳吧。

二、為何要寫「制衡」？

通常，外籍生選擇論文題目與其國家背景有關，馬來西亞同學寫馬來西亞政治，日本同學寫日本哲學家，美國同學寫有關美國的題目。有些老師也向我詢問要不要介紹德國國關學者，則一個一個遭我打回票。

原因很簡單：德國學者對於國關領域的烙印已經如此深，不用由我特別介紹，這些學者包括現實主義先驅者 Ludwig von Mises、Georg Schwarzenberger，現實主義泰斗 Ernst Haas、Hans Morgenthau、Reinhold Niebuhr、Henry Kissinger，建構主義著名學者 Alexander Wendt，國際政經大師 Peter Katzenstein，全球主義學者 Ulrich Beck 等人，以及其他影響國際關係學的學者如 Andre Gunder Frank、Eric Voegelin、Joseph Joffe、Thomas Risse、Klaus von Beyme、Franz Nuscheler、Frank R. Pfetsch 等人，皆對於國關理論貢獻非凡。當然，若只是透過英文視野窺見世界，容易誤以為國關純是美國人的特權。

更何況，台灣主要面臨的問題，即如何在中美關係中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度和自我尊重，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治困境，參考任何人的政治脈絡，無論是

德國、歐盟、兩韓或其他國家，都只是在文字上打轉，從比較的角度上根本無法類推出一個「實用」的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中華民國在台灣能夠在極為惡劣的區域環境中和平生存並邁向100歲，無疑主要有功於中美關係的制衡狀態。這種不讓任何一方輕易變動的平衡點，雖然有些台灣學者認為現狀對台灣是最不利的狀態，但至少這種制衡狀態提供給台灣千萬不確定可能性中的一個確定的生存利基（niche）。台灣不能奢求更多。要瞭解台灣位於當下國際政治最重大兩個強國的力量平衡點上，並研究此平衡點的內在運作邏輯，這是台灣國際關係界最重要的任務，也是選擇論文題目的動機之一。

三、最後一點感想

台大社會科學院院訊2008年第七號有報導介紹外籍生課業、生活面面觀，我很不幸地答應同學的邀請並接受訪問。不幸的原因是，訪問後，作者沒有再度給我檢查報導內容，幾個月後突然見到報導才領悟了一件事情：我在多年同學眼裡竟然只是一個會講中文的外國人而已。果然以如此低門檻的標準看待一個從九二一地震到紅衫軍，從開放新店捷運線到第二次政黨輪替共同生活的台北人，讓我心裡痛徹心扉。同學不知道，老是強調我出身不在台灣是一種微妙的排斥，令人苦思不解。同學尚未瞭解，今日全球化的世界裡，我當哪裡的人不再是命運，而是一個自由選擇。遺憾的是，無論我多麼努力入境習俗，只是因為外表不能變像台灣人，結果同學認為最值得佩服的是我會講國語，就如同佩服司機會開車一樣，不是嘛？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以最大量的愛心恭喜各位同學會用筷子吃飯！

摘要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世界霸權，其絕對優勢基於四柱歷史繼承：軍事優勢、經濟制度和理念的全球化、軍事聯盟的全球網絡以及合乎美國利益的現狀。

依照新現實主義和權力平衡理論，美國霸權必然增加結構性的反抗誘因，使得其他強權制衡美國。據該兩理論，中國是最有可能制衡美國的新興強權，原因在於中國三十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所帶動的軍事力量之崛起、政治野心之擴張以及能源需求之增加等因素。

但是，為了解釋制衡現象，即使傳統理論著重於結構與區域變數例如軍事力量、威脅以及區域社會建構，它們卻不重視外國勢力抑制國家核心利益對於制衡的影響。結果，它們無法提供一個令人滿足的解釋，在中美關係因軍事和經貿議題可能引起爭執的情況下，為何中國仍只面對制衡美國的輕微誘因。

本論文藉由假說產生途徑，提出制衡在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不同層次上具有關連性。據此兩假說，本論文進行若干中美關係可能發生衝突的個案研究，並特別針對那些給予中方制衡美國的最佳理由的個案深入探討。

本研究得到兩項結論：一是，目前為止，中國最關心的核心利益包含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政權穩定、經濟發展和區域參與。二是，在既有解釋制衡的那套變數中(軍事力量、威脅、區域社會建構)，可以加上第四種變數，即利益變數，使得解釋制衡更為圓滿。

本論文提出兩種值得玩味的研究發現：一是，當上述四項變數皆發揮顯著的影響時，制衡最有可能發生。二是，只要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菁英和國家整體不構成具體的軍事威脅，以及只要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受到侵犯時，中國將不會制衡美國，無論美國的軍事力量多大或兩國之間有何種社會建構。

關鍵詞：美國單極體系、中國崛起、未制衡、國家利益、權力平衡理論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S stood alone at the pinnacle of world power, resting on four historical legacies: military supremacy, globalization of its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deals, a global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a status quo beneficial to US interests.

According to Neo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the supremacy of US power gives rise to systemic incentives for other powers to balance against it. According to these two theories, China is the state that is most likely to balance the US due to its rising military power, growing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increasing energy needs, all of which are results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Yet, as traditional theories focus on systemic and regional variables like power, threat and regional social construction to explain balancing or the absence of it, they fail to appreciate the effects that the restraints of national interests place on balancing. As a result, they fall short in providing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as to why China is faced with only weak incentives to balance the US, even in light of potential conflicts over military and trade related issues.

This thesis employs a hypothesis-generating approach, assuming that balancing is related to national interest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state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is, several cases of potential conflict in Sino-US relations are examined, focusing on those cases which would give China the most reason to balance the US.

Two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irst, for the time being, China is mostly concerned with areas of national interest,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of it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unity, survival of the elite,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second, next to power, threat and regional social construction, a fourth variable, the interest variable, can be added to the set of variables which explain balancing.

This thesis presents two noteworthy findings: first, balancing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when all four variabl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second, as long as China's basic interests are not violated and as long as the US does not pose any other vital threat to the survival of China's state system, its elite or to China as a nation, China will not balance the US, regardless of the size and strength of the US military o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US unipolarity, China's rise, non-balancing, national interest,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

中國合秩序性崛起個案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欲探索美國未遭制衡的理論問題，可以回溯到「制衡或追隨」的爭論。這場國際關係爭論大致開始於 80 年代並持續發展至今，主要分成兩大派。制衡派認為，國家面臨外在威脅或競爭者軍事能力快速成長之時，將採取制衡反應，目的是軍事制止敵人和維持現狀。而且制衡被視為國際體系的基本機制。持此觀點的主要代表包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及哥倫比亞大學資深研究員華爾茲（Kenneth Waltz）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沃爾特（Stephen Walt）等人。另一派則主張，國家在面臨威脅或競爭者快速軍事擴張時，為避免制衡政策所帶動的各種風險，國家會常常推動追隨政策，即試圖躲避強權的軍事威脅。持此觀點的主要代表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施韋勒（Randall Schweller）、伊利諾大學教授施羅德（Paul W. Schroeder）、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鮑威爾（Robert Powell）、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

華爾茲認為，在國際體系上，每當一國權力增長可能影響到極（polarity）與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變化時，其他國家會單獨或聯合起來共同制止該國，針對挑戰者改變現狀（status quo）的企圖加以制衡（balancing），成功者達到均勢狀態，失敗者挑起國際戰爭。

在結構主義的架構下，國家進行制衡或追隨（bandwagoning），是基於自身的軍事能力和格局現狀決定的。華爾茲把制衡定義為「與權力較弱者的一方結盟」，並將追隨定義為「與權力較強的一方結盟」。但是，今日美國單極體系呈現前

所未有的結構特徵：平等對手消失了，世界更沒有能夠發揮平衡作用的第三力量。單極體系缺乏如同第十七到二十世紀英國在歐洲扮演平衡者的結構角色。中國面臨的體系特徵，亦即沒有戰略結盟的選擇，中國亦宣示不願與任何一方結盟。那麼，在不存在制衡選擇的美國單極體系中，中國是如何維護其國家利益？為何專家都認為中國是最有可能制衡美國的候選人？


中國於 1978 年後經歷經濟改革，經濟發展、區域整合和國際地位的升格，這些因素逐漸影響其外交政策。冷戰後的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強權，被諸多西方學者認定為美國的主要競爭者。以美國為首的國關學者，也按照現實主義的制衡假說討論中國崛起的目的、方式，以及中國何時在何種條件下制衡美國。但至今中國並沒有制衡美國。

針對「缺乏制衡」進行理論回應者，大致可分成三派。等待觀望派堅持結構主義的觀點，認為制衡遲早必然發生，「缺乏制衡」只是一個「單極的瞬間」（unipolar moment），持此觀點的學者包含華爾茲、德州 A&M 大學教授萊恩（Christopher Layne）、達特茅斯學院教授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等人。霸權穩定派則認為，美國作為善良霸權（benevolent hegemon），在性質上有別於所有其他強權。此派主張美國霸權事實上已跳出制衡或追隨的邏輯，又以達特茅斯學院教授沃爾弗斯（William Wohlforth）為主要代表。另外有人認為，制衡確實存在，但制衡的方法從軍事制止轉變成非軍事制衡，較弱的國家在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所謂軟性制衡（soft balancing）的策略，此派主要代表者包含芝加哥大學教授佩浦（Robert Pape）和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教授保羅（T.V. Paul）等人。

從中國崛起的角度討論制衡理論，值得參考的西方國關學者主要有喬治華盛頓大學 Elliott 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

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長季北慈（Bates Gill）、內基基金會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教授藍普頓（David Lampton）、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員博雷（Jonathan Pollack）、喬治城大學教授沙特（Robert G. Sutter）、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伊肯貝里（John Ikenberry）、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布贊（Barry Buza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維斯（Robert Jervis）、康乃爾大學教授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

國際關係學術界近幾年意識到，被認定為最有可能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國家－中國－似乎採取一套合秩序性崛起的不制衡政策。在全球和區域兩層次上，中國選擇不與美國對抗，但同時也不追隨美國。中國冷戰後「不制衡、不追隨」的崛起路徑，成為理論界重要的爭論。此爭論也成為現實主義內部的再生機遇。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論文主要有五項研究目的，如下：

一，本研究有關西方各類制衡理論，進行綜合整理。

二，本研究針對後冷戰「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之近期學術研究問題的各類理論和說法，進行對話，並提出一個補充假說。

三，本研究藉由中國是否制衡美國之案例分析，檢視中美關係的各個不同層面與問題，進而整理出中國對美國政策的整體性邏輯。

四，針對制衡問題的分析方法，本論文提出一個新的綜合性分析架構，方便顯示行為者結構性誘因、雙邊互動類型及行為者利益對於制衡的互動作用。

五，本研究將假說產生方法運用於中美關係當中，強調未制衡理論的價值。



第三節 研究問題

*Proving a negative is difficult.*¹

— Robert Ross

「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假如中國是制衡美國的主要候選人，便可以反過來問道：「中國為何不制衡美國？」

國際體系中的確存在著權力平衡理論所說的制衡機制。強權，尤其崛起中的強權，在經濟發展會帶動軍事擴張的假設下，容易啟動國際體系的制衡機制。然而本論文認為，制衡並非體系結構命中注定的，而是一個結構機制，亦即在特定條件下，快速軍事、經濟發展的強權可以免於制衡陷阱：亦即不受霸權制衡，也不制衡霸權。以不同分析層次看，主要的未制衡條件究竟處於何種層次：體系、區域或單元？換言之，中國不制衡美國究竟是因為美國的平衡者角色（體系層次），還是因為中國在東北亞受到某種格局的制約（區域限制）或因為中國自我克制，並追求合秩序性發展戰略（內部限制）？

把制衡機制視為具有層次性、結構性和條件性，是本論文一個重要的假說，也是在堅持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上，持續推展現實主義的重要觀念。

本論文進一步假說，經濟快速發展的強國容易掉入擴張軍事實力、擴大政治權力的陷阱。當強權不把經濟發展與軍事擴張分解開來，施行軍事擴張會導致二種負面的後果：一是勢必遭遇他國的制衡，二是容易使現狀與目標呈現較大的落差，使得自己成為反現狀主義者，並試圖以軍事能力改變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

冷戰後，中國在東亞區域成功地崛起，也期盼持續蓬勃發展。但中國仍是尚

1 Robert Ross. 2000.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123

未完整的強國，其追求的是現代化、領土完整、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提升。

中國決策者明知軍事擴張帶動鄰國質疑甚至讓美國制衡，所以中國領導人宣布「增進瞭解、擴大共識、發展合作、共創未來」等大戰略方向，並軍事擴張逐漸呈現緩慢與自我克制的趨勢。中國軍事擴張也服從於特定目標：確保領土完整、軍事現代化，不宣布全球戰略，不更改區域秩序、不挑戰美國、不干涉他國（台灣議題被歸類於國內政治，他國也承認台灣議題屬於特殊議題）。中國在增加軍事實力的同時，沒有遭遇制衡，同時也不制衡世界霸權美國。

（1）中國是如何成功地在增加其經濟、軍事及政治力量的同時，不啟動制衡反應，即不陷入制衡陷阱？換句話說：在堅持發展其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及政治權力的同時，中國是成功地抓住什麼樣的崛起秘訣以避免制衡美國，也迴避被美國制衡？

（2）未制衡條件在不同層次上究竟起何種功能？換言之，中國不制衡美國是因為美國的平衡者角色（體系層次），還是因為中國在東北亞受到某種制約（區域限制）或是因為中國採取合秩序性發展戰略，並為追求經濟發展創建和平環境（內部限制）？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

第一節

極（Polarity）、區域極（Regional Polarity）、 單極體系（Unipolarity）、美國霸權（US Hegemony）

「極」是指國際體系中，在體系層次上超強的數目（Buzan 2004; Kegley & Raymond, 1994），也就是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超強一定是世界上特定時間範圍內權力最大的行為者。國際體系分析層次可分為體系、區域、國家等三層，在冷戰時期內發展出的典型結構主義認為，體系層次等於全球，並在體系層次上只有超強此類行為者。但許多學者逐漸放棄此假說，並認為在後冷戰國際關係中，體系層次不一定等同於全球，而且超強（極）與強權兩者均為體系層次互相影響的主要行為者。本研究接受此新看法。

「區域極」是指區域層次的極，區域極的算法如以下：一是若區域無強權（南美洲、非洲、南亞），該區域內決定區域極的國家為區域大國。二是若區域有強權（歐洲、中東、東北亞、東南亞）該區域內決定區域極的國家不是區域大國而是強權。冷戰後許多學者注意到，美蘇對峙結束後，區域政治日益活躍起來了，也逐漸不容易以美國單獨一個因素解釋區域政治。區域極的概念試圖在現實主義理論範圍內處理區域政治、區域安全、區域與體系關係等新問題（Buzan and Wæver 2003）。

由於中國作為區域極的強權，它在安全方面被夾在體系層次和區域層次之間，並受到霸權因素、區域因素的相互影響，因此本研究為瞭解中國對美國的未制衡

行為，必須同時注重體系與區域兩分析層次。

「單極體系」是指由單一超強主宰的國際體系，該國權力超過能夠被其他國家制衡的門檻，但同時該國的權力不足於形成世界帝國（Wohlforth 1999）。

冷戰後第一次出現單極體系，亦即單極多強的體系，最常被提出的是一超四強（歐、俄、中、日）的結構。然而單極體系與帝國體系不同，前者在權力分配結構上允許超強與其他強權並存形成譬如 1+4 的結構。而帝國體系是指，在權力結構上只得有一個超強沒有強權的 1+0 結構，此種結構近將來不太可能再出現。

「美國霸權」是指美國在冷戰後所主宰的單極體系。學者通常把美國霸權與單極體系混為一談，遺憾的是，若干國關學者甚至把帝國與霸權加以混淆，對名稱的正確使用不太關心。今日世界上沒有帝國。蘇聯瓦解後，美國被視為單極體系的霸權，但其能力不足於形成帝國。有關美國霸權能夠維持多久，美國未來何時會面臨制衡，美國究竟要否當霸權或應否從國際舞台撤退扮演離岸平衡者等等問題，學術界見仁見智。

第二節

超強 / 霸權 (Superpower / Hegemon) 、 強權 (Great Power) 、大國 (Big Country)

「霸權」是指國際體系最重大行為者。它具備所有重要的發展要素，譬如美國享有領土、軍事、經濟和軟權力等方面的絕對優勢，因而可稱謂霸權。

作為「霸權」，它必需（一）在國際體系大部分區域有利益，因而它在大部分世界地區都要積極行動；（二）具備以及使用世界一流的軍事實力，並且其軍事能力與他國的軍事能力要有可觀的領先距離；（三）有強大的經濟能力和軟權力，因而能夠把自己的意志以和平的方式強加於他國；（四）把自己視為霸權，也被別的國際社會成員視為霸權；（五）在幾乎所有世界地區都積極參與安全機制，無論它的角色是造成威脅者、擔保人、同盟或干預者；（六）倡導與捍衛所謂普遍價值（Buzan and Wæver, 2003）。

「強權」是指國際體系體系層次上的重要行為者。它具備兩個或三個特別顯著的發展要素，譬如中國和歐盟都是在領土、人口、經濟上具備優勢，因此稱謂強權。

作為「強權」，它必需（一）在國際體系若干區域有國家利益，並在一兩地區扮演積極的角色；（二）具備至少兩個關鍵性能力，其中通常一種關鍵能力便是經濟能力；（三）在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外交政策中作為重要參考因素；（四）被其他國家視為具備未來成為超強的潛在能力（Buzan and Wæver, 2003）。目前，強權地位者有：歐盟、俄國、中國。

目前，區域的權力分配（極）為：單極（北美洲、歐洲、非洲、太平洋），

雙極（南亞），多極（中東、南美、東北亞、東南亞）。

「大國」是指特定區域內的重要行為者。它具備一個比較顯著的發展要素（領土或人口、軍事、經濟或軟權力），但其他要素闕如或不均勢。譬如巴西、加拿大、澳洲皆是領土大國，德國、日本是經濟大國，印度是人口大國。

作為「大國」，它必需（一）是特定區域內決定區域極的其中一個國家；（二）具有影響區域安全化的能力和意願；（三）但在能力上有所限制，無法影響區域之外的國際政治；（四）被其他國家僅僅定義為區域大國，無論該國是否認為自己應得到更高的體系地位（Buzan and Wæver, 2003）。



第三節

均勢（Equilibrium）、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秩序（Order）

「均勢」是指體系內主要政治行為者之間，於特定時間點上，存在著一個在質量上都近乎一樣的權力分配（Organski 1958; Kaplan 1966; Layne 1993; Sheehan 1996; Tullock 2006）。

「均勢」，除了牽涉到物質和統計上等層面，更具有一種心理上的含意，亦即「相互威脅」（mutual deterrence）（Halle 1984; Walt 1985; Bull 1997）。兩者的關係在於：一是、相互威脅包含於均勢之中；二是、有關力量強度要求，相互威脅不要求平等，均勢則強調力量均衡；三是、相互威脅主觀，均勢客觀（王義桅 2008:106）。

伊肯貝里把均勢視為一種多極的權力分配結構，即他在極數軸上把均勢與霸權作為兩個相反的極端（Ikenberry 2002, 2004）。有人認為，均勢是權力平衡的運作結果，它包含穩定、安全等概念，也因此均勢是秩序的基礎或是秩序的一種。均勢在概念範圍上略小於權力平衡，它通常只建立在相對權力上，不含過程、機制、建制等制度性的層面。

「權力平衡」的政治教課書定義是指（一）一套維持現狀的政策、（二）現狀的描述、（三）近乎均勢的權力分配、（四）意識型態（Kaplan 1951; Morgenthau 1973; Waltz 1979; Rosenau 1980; Linklater 1995; Vasquez 1998; Bull 2006）。

權力平衡有實然與應然兩面向，是現實主義最重要卻最模糊的概念之一。

權力平衡有兩個特徵：第一，在內容上，權力平衡明顯受到歐洲政治經驗的影響，在歷史研究上，主要研討歐洲史、歐洲思想、歐洲政治理論，都有歐洲主義的理論傾向，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學者以為權力平衡有普遍性。第二，權力平衡被視為在歐洲 18、19 世紀強權政治背景上，維持和平的一種雛型的安全機制，它具有協調、溝通的作用，但也有權力正當化、暴力合法化、強權主宰弱國的特徵。在本研究中，除在討論特定經典之外避免使用此概念。

權力平衡引起幾個重要的問題，譬如均勢與和平的問題，即近乎的權力平衡是否能避免戰爭，還是適得其反而造成衝突？均勢與現實的問題，即權力均勢是一個靜態不變的理想概念還是一個有變、可以計算及實現的具體狀態？總而言之，從此角度討論權力均勢有一定程度的哲學意涵所在。

「秩序」是指（一）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對付敵對勢力的集中或威脅而進行制衡的結果（Ikenberry 2002）。（二）追求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的基本或主要目標的行為格局。世界秩序的意涵包括（一）單極、雙極、多極的權力分配格局（現實主義），（Bull 2006）（二）國際關係結構的經濟制度和互相依賴格局（自由制度主義），（三）國家之間的意識型態和認同格局（建構主義）（郭樹勇 2006:66）。

宏觀而看，國際政治秩序有三種：霸權、均勢與集體安全。從社會秩序的觀念出發，甚至可以說秩序的層次分三種：社會秩序—國際秩序—世界秩序²。

有關美國單極世界秩序的這場爭論，實際上是一場關於國際秩序形成的爭論。伊肯貝里認為兩種秩序的意象，即均勢與霸權。

2 王義桅，2008，《超越均勢：全球治理與大國合作》，上海：三聯書店，頁 103。

第四節

制衡（Balancing）、未制衡（Non-balancing）、 低度制衡（Underbalancing）、 軟性制衡（Soft Balancing）

「制衡」分兩方向，一是霸權壓制新興強國，二是新興強國抗衡霸權。可惜的是，國際關係學者不嚴謹區分這兩種制衡方向，導致原本在性質、目的、正當性等方面有明顯差異的兩種制衡邏輯混為一談。嚴格來說，若是霸權壓制新興強國，霸權具有軍事優勢，以維持均勢、保持現狀為目的，基於保護既有體系的正當性，但態勢傾向被動，表現居安思危的態度。與其相比，若是新興強國抗衡霸權，新興強國受自己快速軍事擴張衝動的誘因，以改變體系軍事分配為目的、追求國家利益的實現，亟欲突破霸權建制對自己不利的正義邏輯，其態勢主動，表現出志氣、傲慢的態度。

針對其方法而言，「制衡」是指一國以內部動員或外部結盟的方式增加軍事實力為防止或抵制自己在國內領土上受到外國勢力政治和軍事征服（Schweller 2004; Shambaugh 2005; Molloy 2006）。

制衡的一般性條件為：（一）國家受到軍事威脅，即政治征服、領土侵略；（二）國家必須有確定的制衡目標，即軍事敵對的國家；（三）國家有意圖超過對方的軍事實力；（四）時間上要有關聯性和長久性，即軍事對峙要維持一段時間，大約至少十年，才能肯定制衡是一個能帶動整個國家制度的外交目標，不僅僅是單一時間點上的外交反應。

我以下補充兩點：（一）意識型態並非制衡條件，但意識型態對立的國家之間較容易發生軍事衝突，意識型態容易使兩國制度出現政治衝突、利益分歧、目

標矛盾的情勢；（二）制衡邏輯要求雙方具備近似對稱的威脅能力，因此若以核武作為國家分類標準，則制衡將發生在兩個核武國家或兩個非核武國家之間。

制衡的特徵：（一）制衡以軍事和傳統威脅為主，尚未聽過有人提出如經濟制衡、高科技制衡、環境污染制衡、移民制衡等非軍事領域的制衡內涵；（二）制衡是需要一段相當長時間進行的外交政策，它高度影響國內權力與資源分配結構，並形成高度的結構慣性（structural inertia），一旦制衡，騎虎難下；（三）由歷史案例來看，制衡結果只有兩種：若非「制衡勝利」，就是「國家瓦解」。第一世界大戰新興德國對霸權英國制衡，結果導致德國戰敗，國家被瓜分；1931年至1945年東亞爭霸之戰，導致日本命若懸絲；新興蘇聯制衡美國的冷戰，犧牲了兩代俄國人的福祉，終後瓦解了。伊拉克與伊朗爭區域之霸，因為是美蘇之傀儡，使得兩伊勉強維持形式生存，但內部情況岌岌可危，人民生活狀況慘不忍睹。

儘管政府為提防戰爭而採用制衡政策，但在大多情況下，戰爭始終發生。在核武國家方面，因為你死我活的軍事競賽所帶動的經濟負擔更高昂，在發生戰爭前有可能一方因受嚇阻而讓步或崩潰、瓦解，因而結束軍事競賽的惡性循環。

最後要注意，制衡與平衡、對峙、衝突、頤頤等詞有近義關係。相對於制衡，平衡的學術範圍更廣泛，難於定義，包含現狀、結果、過程、目標、政策及方法，和平或流血的平衡都有可能，所以作者若要在學術上使用平衡一詞，需要多加解釋才行。對峙則較靜態，雖有美蘇對峙的說法，但對峙並非國關術語。衝突的軍事規模則較小，死亡率低，時間有限，焦點清楚。

「未制衡」是指一國儘管具備制衡能力或受到特定層次的制衡誘因，但政治菁英有共識地採取不制衡政策。在此要注意：（一）未制衡政策為大戰略，更

是發展戰略，並非政治無能、國防不足、制衡失敗所導致的結局；（二）採用未制衡政策的國家通常身處於特定政治脈絡之中，例如：國家追求經濟發展及軍事擴張，尤其是期盼更改其體系地位，但該國深知這些發展與擴張政策勢必引起霸權壓制新興強國的慘重後果，所以新興強國政治菁英要謹慎且有智慧地採取一切政治措施以滿足其安全需求；（三）新興強國要注意霸權和其他強權如何評估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尤其新興強國的軍事能力以及其用武的意圖。

採取未制衡的國家具備一些特徵：在致力於發展軍事能力的同時，他們仍具有若干嚴重問題，譬如內部發展程度不均勢，或國際格局難堪。因此，這類國家必須採取迴避風險、搭便車、軟制衡等發展政策。因迴避風險，該國在某程度上會答應與國際接軌以取得安全保障，譬如參與區域安全、制度化其外交政策、透明化其政治過程、法律化其用武條件、積極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等等，以防霸權和強權對新興強國採取反制衡。

「低度制衡」是指一國因為國防能力未足、政治菁英誤判威脅、政治菁英對威脅無共識、社會嚴重分裂、社會受其他重要政治議題左右等國內因素而不制衡或無效率地制衡一個危險且需索無度的敵國（Schweller 2004）。

「軟性制衡」是指不直接挑戰強權軍事優勢但卻以非軍事方式拖累、阻礙及削弱強權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一切措施。（Pape 2005:10）軟權制衡在理論上很難被否證，也與普通外交行為有太多相似之處，因此在本研究中，除了在討論相關文獻之外會避免用此概念。

第五節

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正當崛起（legitimized rise）、 合秩序性發展（order-conforming development）

「和平崛起」是指（一）「崛起」與「和平」都是目的，兩者要同時實現，認為中國追求的是一種與西方大國不同的崛起；（二）「和平」為手段，「崛起」為目的，認為中國爭取和平，不過是為了實現崛起的目的；（三）第三種則反過來，將「和平」視為目的，將「崛起」當作手段，認為中國崛起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閻學通；胡鞍鋼）。

「正當崛起」是指新興大國以和平手段獲得了既有強權給予的實質或象徵性的正當性。大國發展的手段、過程和目標也都不違背既有的國際秩序，甚至加強國際秩序的穩定。

「合秩序性發展」是指興起中的大國以現有秩序安排為框架來統籌自身的國力增長戰略，權力必須在制度要求的前提下進行運作，以現狀政策為主要模式，以有限均勢外交為重要補充，服務於融入國際秩序實現成長的戰略目標。合秩序性發展在權力操作面上，就是指經常性的現狀政策以及在地區層面上一定情況下維持國際總體制度安排而進行有限的均勢外交（郭樹勇 2006:67；龐中英 2004）。

第三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現實主義霸權說

*The very effort to maintain a hegemonic position
is the surest way to undermine it.*³

—Kenneth N. Waltz

霸權說的核心論點在於，美國的軍事能力超越了可受制衡的門檻。沃爾弗斯有一句名言說「美國實力的絕對優勢阻止了均勢格局的再度出現。」(Wohlforth 1999:7)

據霸權說，這樣的絕對優勢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的軍事能力以及全球軍事布局的優勢、二是美國在地理上的離岸優勢⁴。

強調軍事優勢的穩定性與建設性作用的學者有喬治城大學教授庫普乾 (Charles Kupchan)、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奈伊 (Joseph S. Nye)、沃爾特、沃爾弗斯、保羅等人。提出美國在地理優勢的學者有米爾斯海默、沃爾特、伊肯貝里等人。認為是「極」和「現狀」的邏輯給予美國不受制衡的和平時期的學者有布贊等人。

在此要先說明霸權說的一些特點。從傳統的現實主義的觀點看，權力引起反抗，且越大的權力引起越大的反抗。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美國的軍事能

3 Kenneth N. Waltz. 2002.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America Unrivaled –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ed. G. John Ikenber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62

4 在霸權說的制衡邏輯下，制衡方向都是新興強權挑戰霸權。因為霸權各方面的優勢，均是挑戰者所望塵莫及。中國經濟規模在1989年僅為美國十五分之一，1999年九分之一，2005年五分之一。雖然中國經濟翻了三倍，但以整體規模而看，才勉強達到了小英國的程度，但中國人口比英國多20倍，領土比英國大40倍。

力超越了受制衡的門檻」頗有疑義，這是基於傳統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均勢才能穩定」。

但權力均勢等於穩定的命題早期已受到懷疑，如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早於 1942 年斷定：「事情的真相是國家只對於對它們有利的平衡（不平衡）有興趣。它們的目的並不是取得一個平衡，而是一個游刃有餘的優勢。若只與潛在敵人具備相同的軍事能力，就不算真正的安全，只有在比敵人強一點的時候，才有安全。」（Spykman 1942:21-22）

冷戰時期是均勢理論的高峰，學者普遍認為世界體系超穩定是因為美蘇之間達到核武均勢。但也有學者提出異論，「均勢穩定」在密西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A.F.K. Organski）的著作中受到系統性的批評。奧根斯基與斯皮克曼一樣強調權力的負面作用或危險性。

直到 1994 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曼斯菲耳德（Edward D. Mansfield）的著作中才第一次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對均勢等於穩定之家說提出挑戰。他認為權力具有建設性的一面，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與戰爭呈現出結構性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一個線性關係，而是一個倒過來的 U 形關係。也就是說，在權力分配特別均勢以及異常不均勢兩種情況下，國際體系皆會穩定。然而，當體系權力分配有「一點不均勢」的時候，最容易發生戰爭。這種「一點不均勢」的情況可能是某一強國的崛起導致整個體系的權力分配漸漸發生變化，或強國之間的聯盟關係發生改變。

按照曼斯菲耳德的理論，美國的權力優勢使得國際體系穩定運作。在現實主義世界中，這種主張明顯地與傳統均勢理論和繼承均勢理論的結構主義分道揚鑣，並成為失衡穩定論的先驅者。

失衡穩定論是後冷戰早期的霸權穩定論。這些學者觀察到蘇聯的迅速衰退，也看到在歐洲和亞洲地區內部仍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何況一個反美聯盟。同時，美國在 1991 年的伊拉克戰爭上再一次展現出其無敵的軍事優勢，這些現實證據都指證歷歷，因此他們認為美國具備的軍事優勢與我們至今所觀察的體系穩定之間似乎呈現出某一種相互關係。雖然這種關係違背傳統國際關係的經驗法則，但由於過去的國際關係的本質與今日的國際關係不完全一樣，所以在新的國際關係的基礎上，可以發展出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甚至不少人認為，國際建制的大量出現以及全球化的擴張與深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各國之間的來往，甚至改變權力本身。

結構現實主義也能接受「美國作為霸權」的前提，可是他們不同意其結論，認為按照權力平衡理論單極體系不能繼續長存，即使短期未來內美國似乎有幸能夠躲避受制衡的命運，但在中期未來一定受到其他強國的反抗。華爾茲主張：

「國際平衡被打破；按照理論，人們期待國際平衡能夠重新恢復。」新現實主義者反駁，單極、雙極和多極三種體系的結構因素不同，權力平衡理論不適合解釋單極體系。尤其是，相對於多極或雙極體系，單極體系本質上的優點在於其權力分配涇渭分明。這就是說，在今日的權力分配下，美國的強大與體系的穩定之間的關係在理論上具有無法抵抗的吸引力。主要的理由是：「階層產生競爭，而且在權力分配不均勢的體系中，以嫉妒和爭霸作為驅動力的競爭特別容易促發戰爭。」（Kegley & Raymond, 1994:54）而在今日單極體系中，這種情況剛好不存在，因此美國的強大，對某些學者而言，是最有說服力的論點。

中國學者對霸權理論的回應

斐魯恂在《中國人的政治心理》說道：「中國人認為他們之所以會在國力處於最低潮的情況下和西方國家發生接觸完全是歷史的巧合。隨著時間的過去，否極泰來是不可避免的後果，中國終將恢復她強國的地位。...受到這種說法的影響，中國人非但不談現代化的案方案，靜待『中國人世紀』的到來，所以，中國人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發展腳步便放緩了下來，不像其他新興國家那樣地積極。在他們的頭腦當中根本沒有發展計畫這類的觀念。⁵。」

即使過去 20-30 年的改革開放恰好否證了斐氏在後一段有關中國人會否積極追求經濟發展的說法，但是前一段講的有道理，即中國人對於國力增長的必然性和正當性深信不疑，有高度的共識。因此，中國政治學者討論國力不覺得要特別顧慮美國人的態度，因為中國增加國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和理所當然，不可以受到任何國家的干擾或阻礙。

因此，中國現實主義學者承認國家利益、國家主權、軍事實力、國際格局等重要物質概念，尤其軍事實力更是自我定義至要的關鍵因素。國際體系的特徵如無政府狀態、自助原則、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等，對中國人而言再清楚不過。富國強兵以保障國家安全，是大家的共識。但要注意，富國強兵不一定代表反美，而只是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的一種生存策略。

中國學者也逐漸看到，中國崛起呈現一個弔詭現象。即使中國確實享有過去所無的物質進步與國家建設，但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與美國的絕對差距可說仍在加大，而不是縮小。中國即便能保持目前崛起的勢頭，也不過是中國專家所說的「一超多強」的其中一強⁶。但此類論述仍為少數。

5 斐魯恂，1988，《中國人的政治心理》，頁 109。

6 保羅 甘迺迪，2007，《大國崛起：相對論》，台北：青林國際，頁 202。

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張登及將中國崛起前後不同發展階段的勢力，與中國對應的對外態度連結起來，以便我們比較。我將其進一步分為不明態度者、合秩序者及挑戰者三類行為。冷戰結束幾年內，學者仍討論中國是不是屬於體系大國，但我想問題已有了肯定答案，因為就連美國等區域國家，也認為中國是舉足輕重的體系因素。

目前諸多現實主義中國學者以「負責大國」之名，期望一個「強大中國」之實，在以下表格中以●為代表，在現實主義解讀下的中國，其態度目前還不明確。因為中國對外行為包含支持與反對現狀的兩種基本心態，只是輕重程度因時而異，所以我認為「負責大國」是方法，目的是「強大中國」，這應該是諸多中國現實主義者的共識。部分中國學者只是不便說實話或過度樂觀，因此只談中國負責，不講對抗，以◆為代表（蘇長和，2000）；過度悲觀或過度強調「美國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領導是永遠不能認同，在政治上永遠不能與之和平相處」的學者，則將中國的崛起視為體系挑戰，以▲為代表（楚樹龍，1999，沉驥如，1998）。

表 3-1 冷戰後中國「大國外交」諸理念類型複合發展示意表

複合類性	不明態度者			合秩序者		挑戰者	
	體系大國	體系改良大國	不情願的負責大國	負責大國	負責的追隨大國	體系挑戰	反大國
體系大國	○	○		○		○	
負責大國		○	○	○	○		
霸權挑戰大國		○	○			○	○
行動趨勢	韜光養晦與多極均勢下的合縱連橫	融入現狀卻更改秩序，追求參與主導改革	維持與更改秩序並重	相互依存下的大國協商	融入現狀秩序並追求追隨主義	不怕向美國挑戰	心有餘而力不足，企圖打破現狀
		●		◆		▲	

資料來源：張登及，筆者調整

壹 均勢優勢、全球布局、極的邏輯

接下來談美國的軍事能力以及其全球的軍事布局。這裡的核心論點是：「其他國家不願形成一個明顯的反美聯盟，原因在於這樣的聯盟仍會遠遠弱於美國。」（Walt 2006:126）

美國的國防預算從 2001 年以來不斷的增加，至 2007 年其國防預算高達 5710 億美元，除了其大量的核武和國內軍事設施，美國在全球各地體現其無所不在的軍事能力。按照《The Military Balance 2008》，美國於 2007 年在全球 162 個國家和地區有駐外部隊，也就是經雙方協議後，美國在全球八成的國家和地區長期派駐軍隊或相關人員，在其中 43 個國家和地區美國甚至派遣指揮官，並經營大規模的軍事組織。

在此背景之下，霸權說的學者認為「美國繼承冷戰以來所建立的全球軍事結構，這樣的結構深層地深透到許多與美國聯盟及友好的國家，且此結構含括著龐大且錯縱複雜的實質存有物。」（Wohlforth 1999:34）「因為相對於其他國家（或大部分的其他國家的聯合），美國是如此強大，它可以嚴厲對付或懲罰任何違反美國意願的國家。就算美國無法將其意志強加於其他國家之上，但它絕對能讓反對的成本變得十分昂貴。」（Walt 2006:182）此論點可以打一個比喻形容為「約束衣」論點，意味著美國的全球軍事存在似乎約束他國的制衡能力。

這「約束衣」論點主張，制衡並非一個體系內必要的行為。只要一方的軍事能力達到絕對優勢，也就是超越了可受制衡的門檻之後，超強獲得了一個不可被挑戰的優勢地位。「硬性制衡尚未出現的原因在於，沒有任何競爭國家或聯盟具備足夠的軍事能力以形成對美國的嚴重挑戰。」（Paul 2005:53）絕對優勢體現在

於霸權秩序上。「霸權秩序建立在於強制統治之上。權力，而且終究是強制力，維持秩序。」（Ikenberry 2002:10）有的學者甚至把霸權秩序形容為非正式的帝國秩序，並問到「如果當所有人無論單獨或聯合，都無法嚇阻或將其擊敗的話，我們該如何去面對這隻巨獸呢？同盟與戰爭這兩支維繫權力平衡過程中最尖銳的利箭，都並非對抗廿一世紀初期這個霸權國家的好辦法。到底哪一種同盟才能擊敗美國？什麼將是熱核戰爭後的勝利景象？我們又該如何去對抗一個軍事預算等於其他國家軍事預算總和的對象呢？」（喬飛 2007:65）

為了降低對於「約束衣」論點的懷疑，有的學者試圖從歷史經驗解釋強國的崛起有時候是一個不受抵抗的單獨事件。「歷史告訴我們威脅並非權力的必要衍生物，並且強權的出現並非總是伴隨著強有力的挑戰者或聯盟的崛起。」

（Schweller and Priess 1997:17）

以上所列出的霸權說論點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主張美國軍事能力超越任何他國或聯盟的總和軍事能力的學者，因為不考慮軟權力制度等其他因素，往往必須誇大美國的軍事地位以符合自己的論述。這種誇張美國軍事能力的說法一方要矮化他國的軍事能力，另一方也刻意降低經濟、制度、軟權力等因素的重要性。只有從軍事布局單一方面的角度看，美國似乎談得上霸權地位，但在經濟、制度、軟權力等方面，美國尚未具備絕對優勢。所以有些學者頂多用「不完整霸權」一詞來形容，但大部分學者仍繼續以「超強」形容美國冷戰後的地位。

第二，各國不制衡美國都是因為同樣的理由？主張霸權說的美國學者似乎都認為絕對優勢對任何國家都具有系統性的約束能力。這意味著中國、歐盟、俄國

等國家所面臨的體系誘因和限制都遠遠超過各國區域和國內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然後，因為按照霸權說美國超強凌駕國際體系，美國對各國所滲透的軍事影響力彷彿成為各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參考依據。簡言之，這些學者以為美國是國際體系中唯一主動的行為者，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隨美國而變動：「美國為其他國家提供公共物品並解決了地區性安全困境問題，因此消除了其他國家結成挑戰者同盟的主動性。」（Ikenberry 2002:18）在此，伊肯貝里用美國軍事實力解決區域和國內兩層次的制衡因素，顯然有點過早。為了讓權力優勢變成理論上最重要的解釋項，所造成的理論代價太高，犧牲了國內因素影響外交的重要解釋變數。

第三，霸權說的學者強調美國與他國之間顯現前所未有之軍事相對能力的落差。雖然這個落差的存在並且不斷地擴大，但這種絕對優勢為何不會讓他國感到威脅或不安全，光是從軍事方面無法獲得答案。因此，在美國為何未遭遇制衡的問題上，軍事優勢懸異的現象應作為被解釋的項目，不是解釋的一部分。

第四，絕對軍事優勢能約束他國發動制衡的命題，在國家關係理論上缺乏根據。但為了提升這個命題的說服力，學者必須先把「權力為惡」轉換成「權力為善」，才能解釋為何更大的權力不會帶來更大的威脅。然而，這個權力本質轉換的論述必須藉由軟權力、制度、文化等其他媒介進行，因此在邏輯上，整個解釋要成立，必須建立在那些軟權力的解釋工具之上。

第五，不制衡除了能力外，也要考慮意願的問題。令學者感到奇怪並不是美國既有的軍事能力或其軍事支出為何大量持續擴張，而是為何在同時期內他國反而只維持甚至減少其國防預算。假如他國試圖制衡美國，但因為經濟負擔或其他因素達不到制衡效果甚至半途而廢的話，我們便有理由認為是美國軍事優勢成功地約束了他國的制衡企圖。但事實並不支持此解釋。事實上，歐盟、俄國、中國、

印度等大國除了口頭期待多極世界的到來之外，沒有任何具體的制衡行動。這點明顯指出制衡不是或不僅是一個能力的問題。



貳 地緣政治、離岸平衡

一個只建立在軍事優勢的不制衡論述站不住腳。軍事優勢這一論點可以解釋為何他國不會輕易地對美國發動戰爭，但它不能解釋為何他國似乎不願意制衡。如果我們接受美國具有軍事優勢這一論點，我們要說明這樣巨大的軍事權力為何不遭遇反抗。現實主義者堅持軍事優勢在今日世界中的重要性仍然很高，所以他們往以下兩個方向尋找答案，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位於離岸的遠方，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很久沒打過侵略性的戰爭。兩個論點都屬於地緣政治。

美國位於離岸的遠方，是一種地理上的優越。沃爾特從威脅理論解釋美國全球性的軍事設施為何不造成威脅，理由在於「美國與其他強權在地理上的隔離而減少直接侵略的威脅性，同時減輕了美國軍事力量所可能會威脅到其他國家的感覺，也因此降低了它們加入一個反美勢力的誘因。」（Walt 2006:39）沃爾特和歐文（John M. Owen）都認為「因為美國在西方所位於的隔離位置，使其不容易發動地理擴張之戰爭，這對美國有利。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對歐洲和亞洲國家而言，美國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盟國。」（Walt 2006:124）歐文主張類似的看法（Owen 2001:240）。

這些學者並不覺得美國離岸的地理論點與美國在 162 個國家和地區有駐外部隊和基地之間有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沃爾特等人並不認為，美國擁有的一萬多個核武彈頭、戰術彈道導彈以及星戰計畫對他國造成威脅。反而，他們都是從傳統作戰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並認為在今日的國際體系中，威脅性仍在於傳統戰爭的方式和目的，也就是在佔領和侵略鄰國的領土。然後，在他們的邏輯中，美國沒有自然鄰國，因為加拿大和墨西哥不算鄰國，而是屬於大美國版圖。大美國之外，只有太平洋和大西洋，因此歐洲、俄國、中國等潛在的敵人都在海外。海

外的強國因為不可能跟美國陷入領土糾紛，也沒有侵略的可能性，所以美國對他國很安全。

施韋勒更進一步地比較美國和亞歐地理對威脅的影響：「地理上鄰接性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比起大陸型強權，海島型強國天生較不具備威脅性；而且，在地理上尚未開發之內陸進行土地擴張遠不如在核心地理位置進行類似的土地擴張具有威脅性。海島型強權因為其行為而具有威脅性，大陸型強權則因為其本身而具有威脅性。」（Schweller 2004:29）按照此論述，因為美國是一個海島型強權，「美國可以選擇參與或抽身，可是這樣的選擇卻是歐亞強權所缺乏的。」（Buzan 2004:100）

值得玩味的是，霸權論者認為美國既然位於霸權地位，美國的有所作為應該要完全符合其氣勢，美國要強而有力地主張自己的世界秩序。他們擔心美國將來會露出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問題。沃爾弗斯認為，世界秩序畢竟順從美國的基本價值和安排，那麼美國也要積極地治理此國際結構。

與此相反，結構主義派的學者通常擔心美國過大的勢力必然帶動他國的反抗。他們引用與上述同樣的離岸論點，但堅持與上述的霸權論者相反的觀念。他們認為美國應該逐步地從國際霸權地位退縮，並減少其國際任務，尤其是停止其軍事上的霸權作為，然而要採用一個所謂的「離岸平衡者」的宏觀策略。米爾斯海默在《Tragedy》中主張沒有任何國家能作為國際體系的霸權。美國應該扮演一種宏觀平衡者的角色，即當在某區域內發生失衡的狀況時，美國便該積極地參與並平衡，免得區域內出現一個區域霸權。萊恩、沃爾特等人也提出類似的「離岸平衡者」觀點。

無論學者以離岸論點支持美國霸權或認為美國要回歸離岸的安全港口，論點

背後都強調擴張和征服這些傳統的威脅。只有在美國有可能以傳統作戰的方法入侵他國領土的風險之下，離岸論點才會有意思。然而，只有在除了這種威脅之外沒有可能出現其他威脅的情況下，他國才會有覺得美國的地理位置給予他們一種絕對的安全感。

但事實上，其他國家所擔心的並非美國會否掘墓盜屍或掠奪敵人的城堡，而是美國的核武飛彈能夠在半小時內摧毀世界上任何角落。美國的軍艦能迅速地封鎖世界上任何海路，也能快速地派遣上萬陸兵到任何國家的土地上干預區域政治。無論美國離岸不離岸，這些威脅都一樣格外具體。主張離岸論點的學者都忽略這些現實威脅。



第二節 軟權力理論

*The less we use our power, the greater it will be.*⁷

—Thomas Jefferson

根據奈伊定義，軟權力（soft power，或譯軟實力）是指一國擁有的文化資源和規範價值，以及對他國的吸引力（attractiveness）。此概念意味著，一國採取非軍事方式，以說服而非威脅的手段，影響他國的決策結果或外交行為。據我所知，軟權力並不針對解釋非制衡行為。對中國決策者而言，美國對華的威脅程度與美國的軟權力，兩者之間並沒有正相關係。亦即，美國的軟權力雖強盛，但其軍事威脅並不一定因此減弱。

軟權力較大的國家所追求的國家利益在國際間更有正當性，自然受到較多人擁護，此時該國所需的硬實力成本（如軍備）將得以降低。反之，軟權力低落而徒在硬實力上暴虎憑河，其政策成本當然要所費不貲⁸。

軟權力主要體現在兩種國際現象上，一是全球建制，二是一套鬆散不嚴謹的治理思想，如慈善性、自由主義、現狀、正當性。全球建制透過制度規範，柔性制約他國的外交行為。治理思想方面，則由決策領導階層導引外交工作方針與具體內容。

7 美國的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1815，<http://www.harpers.org/archive/2008/03/hbc-90002075>

8 保羅 甘迺迪，2007，《大國崛起：相對論》，台北：青林國際，頁 202。

壹 全球建制

全球建制是指國際制度，基歐漢（Robert Keohane）定義為（一）正式的政府間組織或跨國非政府間組織；（二）政府間針對某問題而制定的明確的規則；（三）協約或習慣。

我在未遭制衡的架構下討論全球建制，提出於兩個問題：一是，全球建制有沒有防止新興強國制衡美國的作用？二是，全球建制是否有包裝、修飾美國霸權的作用？

（1）美國中心主義下的全球建制

國際建制能否制約強權的行為？主張軟權力的學者都持肯定的態度。但關鍵在於，軟權力者並不認為任何建制都能防止他國對美國展開制衡，而只有美國自己在冷戰以來所建立的制度才會有一種防止制衡的保護作用。全球建制主要包含：聯合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元作為全球貨幣、國際法等。有趣的是，美國不一定受自己制度的絕對制約。因為這特點，我把這些論點列為美國中心論。

「自 1989 年以來，美國的國際組織仍是國際關係中的關鍵成分。」（Aldred and Smith 1999:169）從這個認知出發，伊肯貝里主張「美國霸權之所以比較容易為其他國家所接受，是因為其所處的密集的制度結構。」（Ikenberry 2002:6）而這裡的制度指的只是美國所建立的制度。而且「美國在世界體系的各地高度制度化所扮演的角色意味著美國並沒有立刻激發一個害怕其權力的反制衡聯盟出現。」（見於 Buzan 2004:55）

伊肯貝里、歐卓特（Ken Aldred）、布贊等人都強調美國在國際建制中的重要地位。但為了避免陷入「過度的權力勢必造成制衡」的傳統現實主義的理論困境，大部分學者強調，權力分成軍事與軟權力兩類；美國與世界在軍事上所呈現的權力差距並不同於各種建制內部的權力分配。他國在關鍵建制中卻已經能夠制衡美國。

（2）美國有進出全球建制的超凡能力

美國對國際建制採取一種選擇性的態度，也就當美國需要國際建制要給予它正當性與支持的時候，國際建制能積極發揮善良的建設性的作用。然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他國才有理由擔心美國的軍事權力，就是當美國在國際建制之外進行強權政治並不受建制的制約的時候，但這並不表示國際建制對他國失去約束力。結果，他國受制度性制約或誘因而不制衡美國。

簡言之，當國際建制需要美國的時候，是因為各國把建制視為一種多樣的服務平台，他國能從建制獲得利益。當美國需要國際建制的時候，美國把建制作為一種合理的霸權框架，自己能從建制獲得利益。然而，還有兩項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通常被軟權力霸權論者所忽略，即當美國不需要國際建制的時候，它也可以超越任何組織而不受其影響。另外，當美國的國際建制在未來將會喪失其穩定性或競爭力的話，美國的建制也有可能遭到取代，這個時候我們將見證和平或不和平的多極世界秩序的來臨。

（3）美國建制提供其他國家所需要的利益與服務

針對國際建制作為一種多樣的服務平台，伊肯貝里主張「霸權秩序靠某些最

低程度的利益交叉維持的。美國提供他們認為非常重要的服務，為防止他們主動尋找推翻這種秩序。」（Ikenberry 2002:10）「他們對美國需求很高。」（Walt 2006: 189)

這似乎意味著美國微妙地以提供各國所需要的利益和服務來換取整體體系的穩定。這個解讀不像攻擊性現實主義者所認為的權力擴張，也不是防守性現實主義者所提出的安全目標，而簡單的就是無論是經濟、安全、權力、尊嚴等等方面都有可能是利益計算的重要因素。在別的地方，伊肯貝里主張「霸權秩序可能會更加徹底地制度化，被注入各種公認的互惠的政治互動過程。因此形成的秩序可能不會全面的反映基本的權力分配。」（Ikenberry 2002:10）

（4）軟權力包裝與修飾硬權力的暴力面貌

軍事上所呈現的權力差距不同於各種建制內部的權力分配。意思是，美國能夠成功地將軍事權力直接轉換成軟權力或國際談判力。這論點反映制度論學者的核心命題，即美國維持其霸權制度不是靠軍事能力，而是建制的吸引力。不是推（push），而是拉（pull）：「美國戰後霸權秩序都呈現了一種現象，即此秩序對其建制產生了正面且增加的回饋。此現象是有效及可欲的。」（Ikenberry 2002:232-233）因此，要制衡美國建制體系的話，「美國權力所造成的極端不對稱要比固有的這些侷限性來的嚴重得多」（Ikenberry 2002:14），其他國家才開始真的想要制衡美國。但其他國家面對美國權力的時候，主要是在各種組織、建制及非軍事場合上，因此在這些組織和建制等場合上，美國與他國的權力差距並非如此顯著，因此制度論者認為，他國會比較樂於接受美國整體的世界秩序，至少整體的世界秩序不會差到讓大家陷入非常不利的利害關係。這似乎是說，美國的

行動因為透過各種國際組織和制度，降低了軍事暴力的面貌和危險性，正如伊肯貝里所認為：「美國霸權為何不受挑戰的原因在於美國冷戰以來所建立的國際結構蔽護了美國的行動。」（Cameron 2005:186）

（5）美國鑲嵌於制度之中

歐卓特基本上持與伊肯貝里類似的觀點，他對於美國霸權制度為何未遭遇制衡提出了總結如下：「美國無法宰制世界的原因，恰好是美國未遭遇制衡的理由。一是全球經濟及安全的相互依賴逐漸增加。二是在關鍵權力來源上，美國還不具備足夠的優勢。三是美國對主要區域強權可能形成反美聯盟感到焦慮，而極力避免製造出對反美聯盟有利之條件。」（Aldred and Smith 1999:177）在別的地方，他提出另外三個理由：一是，美國是一個誠實掮客（honest broker），二是，美國具備世界最強大的軟權力，並能因此影響他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三是，美國與所有地區強權享有共同利益，這樣的情況在事實上抑制了區域大國之間嚴重極化的情形，因為美國不可能以自己為敵（Aldred and Smith 1999:179）。

（6）全球建制與潛在敵人

針對美國的潛在競爭者而言，「美國在歐洲和東亞仍然維持冷戰時期的主要建制，而這樣的建制制度化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並且在歐洲和東亞的軍事發展上持續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Buzan 2004:55）東亞至今不願或無法建立強而有力的反美聯盟，「這造成了目前在美國所領導之經濟及安全方面的國際制度之外沒有其他建制能與美國競爭。具體結果就是中國及俄國都得參與國際貿易組織、北約的擴張等。」（Aldred and Smith 1999:169）「就算中國及俄國都對美國保持

一定程度的對抗態度，但相對於中國與俄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它們分別與美國所建立的外交關係仍然比較重要。」（Aldred and Smith 1999:172）總而言之，「基於冷戰遺產及其權力後盾，美國最適合持續地擔任世界秩序的管理人。」

（Aldred and Smith 1999:174）

（7）中國國際地位之爭論

張登及在《建構中國》整理出一個表格，方便我們比較體系大國、負責大國及挑戰大國三類大國對於內政與國際向度以及行動者與結構向度有什麼樣的關係。張登及認為，國際建制能否制約大國行為要看是什麼樣的大國，就是說該國自我定位決定國際建制對自己的影響力。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認為作為體系大國，它相對於國際建制更考慮到體系地位、國家在整個體系的行動自由，也就是格局對國家的約束力。依此中國可能認為美國的體系地位約束中國在東亞的崛起，因此視為與美國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未來。但若中國自我定位是負責大國，它就不會這麼認為。因為對一個負責大國而言，非軍事的國際建制是權力來源的一種，國家接受透過建制間接影響他國，也願意受該建制的相當約束。再者，若中國認為是一個挑戰大國，那麼它主要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與理念，它是一個比較自私、內向而不顧後果的大國。

表 3-2 中國「大國」定位諸理念類型理論偏向表

	體系大國	負責大國	挑戰大國
內政／國際向度	國際因素具有決定性影響，特別是體系結構性質。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裡具有壓倒性的重要性。	內政與國際因素具有動態的關聯。重視主權國家之外，也強調跨國間的國際組織與建制的的作用。	內政與國際因素具有動態的、辨證的關聯。內政因素對行動者如何自我定位並看待體系有重大影響。
行動者／結構向度	體系結構性質對行動者的外交行動有決定性影響。	結構以制度等形式制約行動者的抉擇。行動者在外在因素制約下有某種程度的選擇空間。	結構圖像是行動者的權力和實踐建構的產物。結構與行動者相互辨證地制約對方。

資料來源：張登及

(8) 相互依賴的軟權約束力

謝淑麗在《脆弱的強權》一書中論述：「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則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兩國處於彼此依賴但又互信不足的微妙處境⁹。」

相互依賴理論的基本論點在於，經濟與貿易的綏靖效應（pacifying effects）。如同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說道：「經濟相互的依賴，已為這兩個太平洋大國（中國與美國）帶來強大的互利。除非發生巨大的問題，光是這股經濟力量，大概就足以繼續把它們倆綁緊在一起，任何發生衝突的趨勢都可因而減少及緩衝¹⁰。」

對外資的高度依賴，又使相互依賴更為緊密。克里斯坦森（Thomas J.

9 謝淑麗，2008，《脆弱的強權》，台北：遠流，頁 262。

10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13 有關貿易關係帶來綏靖效應的論點可參見 James L. Richardson, "Asian-Pacific: The Case for Geopolitical Optimism," in *National Interest*, No. 38 (Winter 1994/95), pp. 28-39. 貿易和中美關係可參見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國際研究院的演講（March 8, 2000），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William J. Clinton: 2000 (Washington, D.C.: US. Political Printing Office, 2001), Vol. 1, pp. 404-408.

Christensen) 認為『貿易相互依賴擴大的因素，在於大量外資湧入中國，尤其是外資及國外市場亟需的製造業。』克里斯坦森結論，給定如此大的相互依賴：「即使美國採用直接和全面的圍堵政策，只會適得其反甚至遭遇失敗。這麼做不僅得罪中國，其實也會損害華盛頓在東亞區域的相對影響力¹¹。」

有許多這方面的研究都提醒我們，相互依賴並非萬靈丹。即使相互依賴能加強國家的懲罰手段，但同時也會削弱其防守能力，這點值得玩味。只要一方開始以貿易懲罰手段，為特定外交政策增強後盾，無論是美國或中國，另一方很可能立刻回以相同方式，雙方便容易掉入惡性循環。個案研究也可得出，貿易上的懲罰手段，似乎只會使當下特定時點的外交癥結更加明顯，卻無法消除根本問題。反之，貿易爭執屬於問題的一部份。與其雙方採取相互貿易懲罰手段，外交利益交換反而才是較佳解決方案。

不制衡的首要原因，絕不可能是相互依賴，但許多相關研究報告卻如此認為。事實剛好相反：要先有不制衡政策，才可能發生相互依賴。兩個相為敵意的強國，實難想像之間會有大量貿易活動。然而在不制衡政策的架構下，一旦貿易往來維繫數年、日益密切，進而產生相互依賴時，可能會產生正面回饋。亦即，相互依賴會替提倡不制衡政策的政府機構帶來正面加強的效果，使它們在外交過程中獲得更大影響力。

簡言之，對於經濟相互依賴足以創造所謂綏靖效應的說法，我抱持懷疑態度。我反倒相信，經濟相互依賴會使中美雙方外交決策菁英提升對互相關係的瞭解和重視。但光就相互依賴現象，仍不足於解釋不制衡的因素。

11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1):45.

(9) 正當性與全球建制

由於崛起所帶動軍事能力的快速提升，新興強權受到霸權的懷疑與冷處理。一個新興國家畢竟正在試圖改變其國際階層的地位，對上層的國家而言，代表一種挑戰。國際政治上，政治權力不是無限資源，更是一個隨著擁有權力者的數目增加而逆減的資源。

新興國家為了爭取應得的權力部份，非參與全球政治與其建制不可，負責強權和體系大國的新興強國都朝著加入全球建制的必然發展路線，目的是以表現維護體系的精神爭取正當性。

作為霸權的美國則沒有正當性與否的問題，因此它可以在特定時間點上不理睬某些全球建制而為所欲為，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是典型的例子。但新興強權沒這個可能，因為它尚未獲得完整的正當性，一旦不接受建制規則，立刻被視為挑戰者，可說產生因小失大的結果。

謝淑麗正確地論述：「中國領導人在對美關係上進退兩難。一方面，中國的成就、領導人本身的權力均取決於美國的合作態度。美國若把中國定位為新冷戰的敵人，在中國身上套上經濟緊箍咒，就算只有少數盟邦配合美國的新冷戰，中國的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也會趨緩，內政問題也會加劇。美軍若擺出敵對姿態，會迫使解放軍和人民要求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強化中國戰備，從而升高戰爭的風險。一如中國學者的解釋，『歷史經驗和教訓顯示，後發大國要崛起，唯有與國際體系的主導強權合作一途。』十九世紀美國就是循此道崛起，不與大英帝國起衝突。中國和平崛起的上上之策，就是所作所為要像個負責任的大國，同時又能順應當前的超級強權——美國¹²。」

12 謝淑麗，2008，《脆弱的強權》，台北：遠流，頁 267-268。

貳 意圖 (Intention) 、慈善性 (Benignity)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現狀 (Status Quo) 、正當性 (Legitimacy)

*For all of those brave men and women struggling for a better life,
there is – and must be – no stronger ally or advocat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our nation remains a beacon of light for those in dark places.*

—Robert Gates¹³

有關美國為何未遭遇制衡，第二種軟權力的論述強調美國的意圖、慈善性、自由制度、現狀及正當性。這裡的核心論點是：「反美制衡沉默了是因為美國的意圖被視為相當慈善。」(Walt 2006:124) 佩浦觀察美國的近代史同樣認為「美國的慈善意圖有名。」(Pape 2005:19) 可見在此種論述下，美國不遭遇制衡的因素被視為美國的本質。無論這個本質體現為美國的國際建制或國內政治制度：「霸權的慈善性以及對霸權的制度約束會降低採取這種做法的可能性。」

(Ikenberry 2002:11) 庫普乾 (Charles Kupchan) 認為「美國是一個慈善的單極，它願意保護他國且自願『畫地自限』。」(見於 Owen 2001:119)

德國《Die Zeit》(The Times)周報編輯及發行者及史丹佛大學兼職教授約弗約弗 (Josef Joffe) 認為「美國不是一個貪婪的帝國。美國沒有遭受制衡的原因在於，伊拉克戰爭以及 2001 年的阿富汗戰爭，不僅都具有防禦或反擊性質，同時其目標也相當明確的緣故。」(Joffe 2007:64)

美國所謂慈善性的論說受到美國左派及其他國家許多學者的批評¹⁴。不可否

13 Robert Gates, 2007,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199>

14 可參考 Noam Chomsky. 2004.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認，美國是近代史上參與最多國際衝突的國家。若只談後冷戰時期，在接近 20 年內，美國被旋入了歐洲，非洲、中東等地方的幾場衝突和戰爭。所以要注意，美國學者強調慈善性不完全單一基於歷史證據，反而更出於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自我定位。

（1）美國的自我定位

美國的自我定位，簡而言之就是美國為現有的國際秩序背書，它在過去建立了、正在經營著以及將來會持續保護既有的國際秩序。美國把自身的價值觀、意識型態、政治制度視為四海皆為準，因此美國應當作為國際秩序的領導者。作為領導者，美國認定既有的秩序為現狀，為了維持現狀美國永遠出發於善意、慈善性、保護現狀的動機。

在國際關係史上，超強認定現狀十分正常。認定現狀牽涉到自我定位。除了慈善性外，其中自由主義也扮演著重要的地位。「硬制衡沒有發生是因為美國霸權的自由特徵，美國國內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Paul 2005:48）

沃爾弗斯認為「大部分的國家比美國更迅速的減低其國防支出。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民主主義及全球化更改了世界政治的本質。」（Wohlforth 1999:18）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歐文甚至認為「反美制衡的程度與國內自由制度的程度之間有正相關係。這個關係受國內機制、習慣方法及外交是否符合自由主義的影響。一個國家是否自由勢必影響兩種方面，美國如何對待那國家，而且那國家如何對待美國。」（Owen 2001:121）

（2）慈善性與自由主義在未遭遇制衡的理論上佔弱勢

（一）慈善性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有爭議；（二）慈善性與自由主義皆是文化和制度性因素，其變化甚慢，無法解釋國際制度的變化。接近 70 年以來，美國在世界秩序中居高地位。但除了在最近 20 年以外，美國的領導以及美國所領導的國際制度受到嚴厲的反抗；（三）把美國的價值和制度視為國際關係變化與否的重要因素再度犯了美國為中心論的研究偏見。世界政治被瓜分為主動的美國和被動的他國，這個看法十分缺乏說服力。

（3）現狀及正當性軟權力的論點

權力正當性論點假說，當權力具有國際體系公認的正當性，我們有理由預測比較少的反抗，各國會相當樂於接受此股權力。而且，因為權力受到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成員的公認，權力的多寡也不再成為大家感到威脅性的因素，因此權力正當性能脫離傳統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對極端權力分配的負面假說。

「現狀已經反映美國的偏好，（…）而其所能掌控之軍事優勢不僅不違背反而能支撐現狀。這減少著其他國家反抗美國的誘因並加強其穩定性。」

（Wohlforth 1999:33）

在國際關係史上，每當發生大戰爭時，戰勝國以其權力定義現狀。冷戰結束後，該是輪到戰勝國美國定義現狀；當現狀被定下之後，世界各國可以簡明分成接受現狀國及不接受現狀國。因此，如保羅說「美國被視為現狀的捍衛者。」

（Paul 2005:53）他是說美國定義現狀，而且各國承認美國作為新世界秩序的領導者。在現狀的二元邏輯下，不反對美國秩序的國家便被視為接受新定義的秩序。

如果現狀被懷疑的話，可能會發生何種情況？柯義耕（Robert Kagan）說明：

「過去每當一個或多個強權對於既有階層體系和建制表達不滿且試圖藉由武力推翻現狀的時候，多極體系便會崩潰。」由於現狀與體系的極數無關，因此，各強國接受美國單極體系現狀可以視為該體系正常運作的根本條件。假如各國開始對體系現狀的正當性提出懷疑的話，在此情況下，無論美國的武力、經濟能力多強，美國再也無法依靠武力或經濟誘因強迫各國接受該體系，進而世界格局變遷來臨了。

中國對軟權力理論的回應

中國國關學者也承認中國軟權力微不足道，所以才有這麼多中國學者講硬權力，討論如何用硬權力保證發展勢頭與和平安全。軟權力難於系統性地建立起來，它似乎是國家整體成功發展的「自然表現」，領導人不僅難於刻意擴大軟權力，這世代中國人也不見能夠見到中國軟權力的具體實現。

相對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尊重個人等美國價值概念，中國軟權力的來源薄弱，不易輸出政治體制或社會生活方面的對應價值，畢竟儒家思想及共產黨以前的近代史，長久以來已受共產黨片面詮釋浸染。此外，中國道德哲學、中國太平世界觀等政治思想，也不易為西方世界所接納。儘管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性，但就制衡問題而言，文化研究仍無法提出關鍵性的論證。

對此論述，我在下文的個案研究也會提出佐證。台灣問題是少數將能挑起利益偏差情況的因素。以往，中國盡量讓美國弄清台灣問題的癥結，使美國認知到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另外也以領土完整為理由，不斷強迫美國對兩岸關係表態。台灣等國家都認知到中國的底線所在。這種硬態度雖使台灣三代人民憂心台灣的未來，但結果卻也說明，中美政策正在吻合、趨同，對台海穩定有一定貢獻。

第三節 安全理論

There is no security on this earth; there is only opportunity.

— Douglas MacArthur

「安全指的是穩定、完整、不存在威脅和危險。」（叢鵬 2004:4）安全概念分別代表一種客觀的狀態、一種主觀的感覺以及一種價值。安全的對立概念為危險或威脅。現實主義認為，安全是一種熵性的（entropic）狀況，也就是安全需要各國不斷地積極管理才能維持其穩定狀況。

維護安全的手段有很多個。制衡是維持安全其中的一種，但它並不是唯一的手段。甚至，制衡被視為最後的維護安全的政治手段。若制衡政策失敗或無效，恐怕最有可能的後果若不是戰爭，即是被對方支配。因為制衡在國內會帶動出一套激烈的政治措施，使得其成本甚高，除了容易陷入一種軍事競賽之外，制衡更會消弱國家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推行制衡政策的國家，已經放棄或無法選擇其他維護安全的政策，進而必需把安全單獨建立在軍事對抗之上。制衡是維持安全的最脆弱並且成功率最低的手段。

國家安全是指「國家安全利益不受威脅、侵害和破壞的一種狀態。」（叢鵬 2004:5）這裡安全包含一些國內因素，如國家制度、民族、宗教、治安、民主，以及一些國外因素，如國際政治、國際經濟、軍事、文化、國際信息交流。國家安全牽涉到許多軍事以外的重要面向。只以制衡維持國家安全，便無法處理這些軍事以外的重要安全面向。

國家安全觀發生了改變。早在冷戰時期，美蘇重視核武安全，即「確保相互摧毀」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宏觀戰略。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出現「複合

性相互依存」的現象，導致國家的自主性受到侵蝕，各國格外重視經濟安全。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依靠自己的國力獲得安全。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發生巨大的變動，加劇了各國重新調整其大戰略及安全評估的必要性。

防守型之於攻擊型現實主義

在後冷戰的現實主義理論中，發展出兩種不同安全觀念。一方面有防守型的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認為國家最後目標是確保國家生存及完整，就是維護一個不受外在威脅的國際環境。權力是維護安全的一個手段。另一方面有攻擊型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國家最後目標是擴大權力，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價值，但並非唯一或最重要的價值。權力才是最可貴的政治貨幣。

防守型的現實主義自然比較重視實質的國際安全建制，並認為美國積極經營各種安全建制成功地防止他國制衡美國，也從根本上消弱了他國制衡美國的必要性。美國安全建制產生了許多「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因此使得那些密切與美國合作的國家感覺到安全。

相對於防守型的現實主義，攻擊型現實主義比較重視威脅那一面，並認為各國不受到美國的威脅而因此不制衡美國。美國只要奉行一個謹慎的外交政策，特別是減少其各種干預活動，並扮演一種離岸平衡者的角色，便能長期免於制衡。

壹 安全建制

*The ideal, once it is embodied in an institution,
cases to be an ideal and becomes the expression of a selfish interest,
which must be destroyed in the name of a new ideal.*¹⁵

— Edward Carr

東亞在地理、文化、政治、經濟等面向上是世界最具多樣性的地區之一。在安全上，東亞可分為東南亞（東盟）和東北亞（中俄北南韓日）以及南亞（印度、巴基斯坦）。

東亞為一個多極（multipolar，即俄、日、中、印度、美國）的衝突矩陣（conflict formation），容易陷入權力政治，相似於 20 世紀的歐洲，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為無政府狀態，在未來近幾年內比較不可能形成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印度、中國東南亞的人口增長、工業發展都將擴大東亞區域互相競爭發展及生產資源的壓力。

「面對某種區域性的威脅，他國通常會期待美國的保護。」（Walt 2006:187）而且「較小的國家藉由美國的權力以制衡它們的較大的鄰國。」（Walt 2006:190）在東亞區域內，這種論述有爭議性，東盟和中亞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或形成與中美兩國選擇性合作。

多極格局意味著，美國不再是唯一最重要的行為者，而是在一組重要行為者之中，與它相比最有能力的一個行為者。在體系層次上美國仍保持明顯的優勢，但在東亞區域，美國僅作為區域極之一。大量撤軍後，美國更突顯它從區域外干涉東亞各國的性質。冷戰結束後東亞在美國大戰略中失去了重要性，美國因此大

15 Edward Carr. 1954.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MacMillan London, p. 94

量減少東亞軍事存在。此時除了韓國分裂此一問題外，東亞回到冷戰前的基本問題矩陣：兩岸問題、中印邊界糾紛、中日歷史問題、日俄島嶼糾紛、中越歷史問題、印尼分裂主義、越南柬埔寨衝突、泰國越南衝突、泰國政變、南沙群島主權糾紛等問題。

與上述各國政治爭執相反，東亞區域大國之間形成了日益增加的經濟相互依賴，美國、中國和日本是東亞各國最重要的貿易國家，經濟依賴區域化是多極的另一象徵。

（1）東亞國際政治的特徵

在區域上，所有區域大國呈現出不對稱的不完整性（asymmetrical incompleteness）：美國缺領土，中國缺政治發展和領土完整，俄國缺經濟，日本缺軍事實力和國際地位，印度缺經濟力量和國際地位。在東亞區域，美國、俄國和中國具有聯合國權力正當性，日本與印度被排除其外。強權聯盟的選擇有限，美日，中俄，日印度（NIC 報告）。

（2）中國在東亞區域的地位

中國是一個經濟、軍事、政治發展及領土均不完整的強權，以經濟改革支援軍事發展，以軍事實力解決領土糾紛，政治發展待解決。主要活動空間在東亞地區，體系層次次要。

對大部分美國國際關係學者而言，最迫切的問題在於中國崛起是否變更東亞區域秩序以及中國會否趕驅美國的實力（大部分美國學者相信這就是中國最終目的。）但是中國意識到了，如果中國試圖把美國從東亞地區驅除，中國便會被視

為反現狀國家，也勢必遭遇美國的反制衡。

對日本和韓國最急迫的問題在於如何因應這些中國崛起所帶動的各種新的經濟挑戰和資源競爭的壓力。東盟各國歷史上較為傾向於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但它們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會把自己的遊戲規則強加於東亞地區。

（3）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

中國瞭解美國和其他大國擔心權力平衡、威脅、全球秩序變更等重大國際政治的變化。中國必須接受美國和其盟友在東亞的政治利益，無論中國是否喜歡這樣做，並把美國利益理解為與自己非矛盾性的戰略因素。其實，有不少西方學者已經認知到，在東亞冷戰後中美關係呈現出微妙地互補互斥關係，這些人進一步瞭解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事實上利於中國：（一）美國在東亞駐軍減少東盟各國對中國感到威脅的心理感受；（二）美國在東亞對中國不制衡確證中國權力崛起是不違背世界秩序，並具有正當性。

然後，中國是如何利用或重新形成東亞區域，如何能夠在促進經濟軍事發展的同時成功地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關鍵在於，學術界目前把「制衡」和「追隨」構成為對立關係，中國在東亞的路線又不屬於兩者，是因為實際上兩者之間還有一個不夠受重視的第三條路，即「正當強權的崛起」。

（4）中國如何避免啟動制衡機制

中國能夠避免啟動制衡機制，是因為以下幾點：（一）中國慎重地把經濟和軍事發展的動力脫節開來。中國政治菁英反省歷史各強國崛起途徑深知軍事發展速度是啟動制衡的重大因素，軍事崛起越快造成制衡反應越不可避免；（二）中

國試圖更積極地影響東亞區域化過程，即（甲）主張非同盟政策以避免權力過度集中、（乙）主張睦鄰外交；（三）與美國積極打交道，即（甲）形成與利用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性、（乙）表示經濟負責任和政治善意。

但中國國際行為也包含一些將有可能導致矛盾或爭執的因素，如以下：（一）中國領導人故意誤傳國際社會，尤其有關軍事實力和意圖、黨內運作和決策過程等可能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通通受政府控制、扭曲、誤報；（二）中國領導人一向把台灣問題構成為國內議題，堅持主張「一個中國」原則，對此爭取國際社會的默認，但美國和一些鄰接國家仍擔心會被台灣問題拖下水；（三）中國對若干國家軍售，包含北非、中東等不安定地區的國家，並向這些國家和非民主政府提供軍事和核武技術與資源。

（5）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建制

伊肯貝里認為，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來自「美國所建立的、廣泛的政治夥伴與安全網絡，以及一系列的全球和地區制度，提供了所謂的全球治理。」

（Ikenberry 2002:285）

美國從東亞地區撤軍並非更改東亞區域極格局，美國仍持續密切與日本、南韓、台灣、澳洲等國維持法理上的安全關係，目的是在東亞維持現狀。這種安全條約或承諾一方面提供給美國干涉東亞地區的理由，另一方美國也難於脫身於動盪不安的東亞區域，尤其在美國不願意干涉區域爭執的時候，此種法律承諾的確也成為危機。

在東亞中美「對峙」的區域結構中，東協的角色特別重要，從東協的行為選擇也可看出中美力量差距的發展。因為東協各國能力不足，自身防衛能力有限，

所以東協對於區域安全非常敏感，也更依賴一個外在(external)的安全保障。無疑，東協是一個典型的「聯車」(bandwagoning)的例子，一方面是因為它在政治上不夠團結，另外一方面是它地緣和軍事上的脆弱性所導致。在政治上，東協只是一個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論壇，涵蓋民主和非民主的國家，但大致上皆有政府腐敗、內政動亂或分離恐怖主義等問題。在地緣上，東協涵蓋巨大的領土，但卻因而難確保各國安全。因為這些結構上的脆弱性，東協內部分歧大，政治共識都是「最小共通點」(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因此，徐斯勤和鄭敦仁認為東協採取一種政治套利的策略選擇(strategic choice of political arbitrage)¹⁶。如此一來，東協能夠在東亞的雙極區域體系下利用中美之間的矛盾以獲得利益，並維持現狀。

(6) 美國提供法理上安全承諾

美國與菲律賓(《美菲協防條約》，1952年)、澳洲和新西蘭(《美澳紐協防條約》，1952年)、韓(《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澳洲、新西蘭、泰國、菲律賓、法國(《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日本(《美日安保條約》，1960年)維持正式的安全關係。美國與台灣(《與台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維持責任式的安全關係。冷戰時期，美國反對多邊主義及東亞地區形成安全建制，反而增值了雙邊安全條約，便利美國能夠對每個危機用單獨不同方式來處理。

冷戰後，這種情況基本上沒變。2001年後，美國則積極與東盟國家進行聯合軍事練習。美國近幾年認知到了，中國戰略學術界討論中共解放軍能利用不對稱

16 T.J. Cheng, S. Philip Hsu, "Between Power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Rethinking the Post-Cold War East Asia," in *Rethinking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U.S., China and Taiwan*. 2004. Ed. I Yu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p. 425-460

戰略（asymmetrical warfare）對付美國，因此美國為對應中國新戰略思維更積極與亞太地區同盟國合作。

然而，拖了五年未結束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全球反恐戰爭以及 19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等因素，讓大家懷疑美國有沒有政治意願持續支撐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和軍事負擔。

（7）美國以平衡者的角色維持安全

「一些國家希望美國在本地區扮演平衡者的角色，這為美國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機會。」（叢鵬 2004:43）從權力平衡的角度而言，美國能夠從區域外發揮平衡者的功能。在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專任作者西卡（Gerald Segal）於 1999 年以「限制」（constraint）總結冷戰後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戰略，意味著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圍堵中國，在經濟方面則積極地與中國打交道，期望能夠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規範之中，也希望如此能避免意識型態衝突。

除了法理上的安全保證和各種共同軍事練習外，美國也透過金融機構一方提供給予區域公共財，另一方對亞太區域進行金融操控。不過，在 1997 年亞洲經濟危機前後，世界銀行對東盟國家各種嚴厲要求受到東盟各國反對，它們認為世界銀行不公正做法才讓金融泡沫經濟對東盟國家的造成重大後餘震，前後各種舉措使得美國形象在東亞地區受挫。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際，東盟各國第一次明顯往中國依靠，更體現美國金融安全保障的價值和能力逐漸降低。

（8）美國積極地與中國打交道維持安全

美國學者認為，後冷戰的東亞地區不制衡快速崛起中國是一件出乎預料的現

象。對此最能夠簡明的解釋就是美國在東亞積極作為：因為東亞區域各國把制衡中國的任務交給美國負責，結果是印度、日本，東盟各國都對中國採取低度制衡政策。事實上，美國以各種方法鼓勵低度制衡：（一）美國嚴格控制核武擴散，堅持不允許南韓、日本、台灣、澳洲、東盟各國取得核武；（二）美國栽培日本國防依賴美國；（三）美國反對東亞多邊主義。

美國反對東亞地區團結制衡中國，是因為一旦制衡機制開始運作便騎虎難下，軍事擴散、甚至大規模的軍事競賽都有可能出現，美國如何下手制止？

（9）東盟和東盟地區論壇

東盟創立於1967年，主要進行經濟議題、非軍事問題的協商組織，有助於形成共同問題意識的平台。對現實主義者而言，東盟的創立證明，東南亞地區各國在無政府狀態、自助原則、權力關係的壓力下，受到體系誘因形成權力平衡，早期是為了團結平衡美蘇對抗對東亞地區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冷戰後目的改成抵抗中國、日本和印度所可能帶動的威脅。德國學者羅藍（Jürgen Rüländ）說「對現實主義學派來說，戰後東南亞動盪的歷史證明，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構成了該地區國家壓倒一切的利益。自助與增強軍事力量成為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考慮。大國之間的權力平衡是避免戰爭的唯一手段。」（陳奕平 2006:3）

冷戰後，東盟面臨民主化浪潮的壓力，各國受到美國的干涉和批評，東盟與美國的關係一波三折。在911恐怖事件後，美國又與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關係暖化，增加軍事存在和多邊軍事練習。

東盟地區論壇於1994年創辦，主要是為了因應冷戰後東南亞區域安全條件變化，東盟國家擔心中國、日本、印度試圖填補美蘇對抗結束後所出現的權力真空

會帶來區域災難。在創辦宣言中明顯提出東盟地區論壇的目的：「（東盟國家）讓美國繼續軍事存在，（…）是為了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及確保日本沒有必要扮演美國的保護者的角色。」冷戰後初期，讓區域各國首腦頭痛的是，美國可能從東亞部分撤軍、各國無法平衡中國與日本的影響、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亞洲缺乏多邊組織處理軍事問題、如何確保中國變成一個友好的巨人。

（10）中國安全建制

中國自從 90 年代中後積極地參與和形成東北亞和東南亞兩地區的安全建制。許多國外學者對中國此新區域政策強烈討論，有人認為中國準備對美國打不對稱戰爭，有人相信中國崛起成為負責任大國，有人看出東盟各國追隨中國。

中國於 1982 年宣佈新憲法後，對外明顯降低了意識型態外交鬥爭，而強化務實外交，希望能與區域所有大國保持良好的工作性外交關係，簡稱為睦鄰外交。中國睦鄰外交是指一套包含傳統和新安全議題、單邊、雙邊和多邊合作、固定和非固定的機制、宣言、協定、條約等方式、第一軌道和第二軌道的層次，是內容豐富的外交政策。目的是穩定東亞政治環境、深化與友好國家關係，為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做長期準備。中國瞭解東亞區域大國擔心中國政治制度會被其他國視為一種威脅，對民主國家而言，中國共產制度一向合理化美國在東亞軍事存在：「美國的軍事進駐卻是需要的，至少為了制衡一些持有不相同意識型態的區域強權。」（Walt 2006:189）因此，為抵消意識型態所產生的懷疑，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東盟加三、六方會談、上海合作組織等框架下積極與鄰國協作。

東盟於 1997 年 12 月初次邀請江澤民出席中國東盟首腦非正式會晤，雙方於 2002 年 11 月同時宣布《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與《中國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

作聯合宣言》，在南沙群島爭議上多顯示協商意願。

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架構下參與區域重建，但由於東盟地區論壇主張共識決和自我限制，其決定多為最小公分母，雖然內容廣泛但約束力不佳。當政治共識不在，中國試圖與開放經濟市場引誘東亞國家積極與中國合作，同意在未來 10 年內建設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龐中英 2004:79）。

（11）上海合作組織（SCO）與六方會談

中國在中亞地區更為積極，於 2001 年 6 月在上海創辦上海合作組織（SCO），創立國包含中國、俄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等六國，目的為因應冷戰後中亞地區需要形成多邊多項合作機制，從 2001 年至 2008 年宣布《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多邊經貿合作綱要》等幾種重要協定，企圖於未來 20 年內在中亞地區實現商品、資金、服務及技術自由流通的經濟合作目標。合作項目延伸到軍事、反恐、經濟、環保、教育、文化等方面。美國學者認為上合組目的是創立一個「反北約」類似的組織，但中俄重申中亞地區尋找一個更多元多樣的多邊安全建制不違背美國既有的戰略因素，上合組不會與美國發生利益衝突，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反西方的軍事政治聯盟（龐中英 2004:77）。歐卓特也認為「中國及俄國會認為與美國維持與加深既有的安全聯繫總比發展一些其他安全關係來得重要，因為其他安全關係不僅排除美國，甚至會被視為其目的為反對美國。」

（Aldred and Smith 1999:179）上海合作組織（SCO）被美國人解讀為反美聯盟，但從中國的角度而言，反美意涵應該最輕，區域安全的考量則為重。

六方會談是中國積極參與東北安全機制的另一場合。原本為因應北韓核武問

題於 2003 年創立的會議，各方正在考慮要否把六方會談轉換成一個常設性的機制。

六方會談雖然無法根除朝鮮半島的政治僵局，但目前卻是有效制止朝鮮核武問題進一步惡化。

（12）東亞安全建制仍處於初期階段

無論從廣度（國家數目）、多元度（議題的多項性）以及深度（法理上的約束力）而言，遠不及安全公共體的內涵，無論在軍事實力、組織結構、合作文化等方面都不如北約和歐盟。建制學派對安全機制保持樂觀態度，有時候卻把建制學派的看法盲目地套在東亞區域上，並誤認東亞地區已形成有效安全機制。事實則不然。

舉例而言，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里斯（Thomas Risse）強調集體安全對區域穩定的影響，集體安全也可以作為未遭遇制衡的一種解釋，他認為「目前的世界秩序以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為主。自由民主國家主宰著目前的世界秩序，並且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這點能解釋為什麼美國尚未遭遇到制衡。」

（Risse 2005:266）從區域內不會有制衡美國的現象出現的理由在於：（一）集體安全重視自由價值以及維持強而有力的內/外團體界線；（二）不同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穩定的及相互依賴的互動產生一種強大的社會利益，並使得各方關心對方的健全發展；（三）關係的制度化，即高度的國際治理結構，在國際社會成員之中創造出社會秩序（Risse 2005）。

沙特分別以三種途徑來解釋中國為何不制衡美國。一，美國藉由有效運用軟硬兩種權力，來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美國有效的對華政策，使得中國領導人放棄制衡美國，既然制衡美國不會帶來任何利益，又何以冒緊張對立的危險。二，

美國總統布希改變對華政策，與中共拉近友好關係（accommodate），進而引導中方正面回應，使得中國在東亞及世界政壇上日益抬頭。這種情況下，對東亞來說，制衡美國似乎喪失其政治意義。三，中方領導人對中國在東亞的政治影響力顯得愈發有自信¹⁷。

理論上將不制衡行為概念化，似乎侷限於這種概念矩陣：中國或美國政府，何者會先主動？姑息主義或權力政治，何者才是最有影響力的政策？至於中國對美不制衡會持續多久？沙特也坦言無法解釋。不制衡行為在何種程度上受美國政策影響？中國不制衡的內部因素又為何？

一言以蔽之，集體安全、社會利益的相互依賴關係以及社會秩序等現象都防止昔日的權力平衡結構出現。但他也發現「今日，後冷戰時期的主要國際社會結構就是安全共同體，除了俄國之外，這共同體包含所有其他的強國。（但）中國也從安全共同體解脫了。在亞洲權力平衡及安全困境仍有重要影響。」（Risse 2005:266）

沙特及其研究夥伴的理論架構雖立論簡明，但焦點卻是放在戰略與意圖。沙特並未解釋中國不制衡美國的因素，而是闡述中國外交政策對美國的意義。但其結果是，中國的外交政策被結構成必須依賴美國單一國家，認為中國沒有獨立外交政策可言。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國內條件，他倒極少提及。

（13）中國學者對於安全建構的回應

在中國，國際建構主義者一般拒絕「權力是命運」（power is destiny）的權力

17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 98

觀，並放棄經濟發展勢必產生軍事能力擴張和武力衝突的假說¹⁸。如果中國能成功加入既有的權力結構和世界秩序，尤其是經濟和貿易建制，那麼中國與美國的基本利益可說是日益趨同（王逸舟 2003:250-252）。

國際建構主義是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很重要的話題。對於建制能約束中美衝突的說法抱持懷疑的中國學者認為，全球化主要表現為美國化，至於全球治理、國際建制等現象，其實是利用美國權力作為後盾，違背了各國平等原則，因此中國的崛起勢必與美國資本主義發生對峙¹⁹。

但大部分的中國國關學者並不這麼悲觀。他們認為中美之間並非必然相互違背，畢竟在許多國際組織之中，中美關係均發展順利；世界多極是許多國家的共同長期目標，推翻既有建制不合理也不實際²⁰。中國的利益與既有建制深根固抵。

近幾年討論中國作為責任大國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出現於坊間。這些研究對於中國加入並維護國際組織和國際建制，均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許多學者均認為，成為責任大國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最佳抉擇，能確保中國平穩度過崛起階段的不確定性。

責任大國政策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第一要解決美國對華的困惑，第二是慎防美國對華態度惡化，第三才是刺激亞太地區各國與中國合作，發展亞洲互信²¹。

18 Legro 認為，國家對於體系層次條件，頂多會遲緩回應；國家權力增加時，國家不見得必然要擴張外交意圖

19 有關此議題可參見：張頤武，〈全球化：亞洲危機中的反思〉，王寧等主編《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 82-86；張文本，〈全球化的基本矛盾與中國的選擇〉，《中國社會科學》，2003，第 2 期；沈惠平〈全球化中的權力擴張〉，《現代國際關係》，2000，第 4 期；李慎明〈全球化與第三世界〉，《中國社會科學》，2003，第 3 期。

20 王逸舟，2003 年，《全球整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蔡拓，〈全球化與當代國際關係〉，參見於俞可平主編，1998，《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75。

21 針對中國責任大國的重要論述可以參考包含：鄧永昌、胡鞍鋼、黃仁偉、郭樹勇、流杰、曹泳鑫、梨兵、虞衛東、張健榮、周士新、王震等其他人的著作。針對中國增加軟權力影響之討論可以參考包含倪世雄、丁偉、俞新天等其他人的著作。

貳 缺乏威脅

美國未遭制衡的另外一種解釋來自以沃爾特為主要代表的威脅理論。沃爾特修正結構主義權力平衡的條件，權力大小不再是引起反抗、制衡的最重要因素，反而是威脅。但「威脅的來源並非只有權力。」（Walt 2006:28）產生威脅的因素還包含：「權力聚集情況」、「地理距離的遠近」、「所擁有的進攻性能力的大小」以及「威脅意圖的存在與否」。在上述四種影響威脅的因素之中，沃爾特認為「對進攻性意圖的認知可能在聯盟選擇中起到特別關鍵的作用。」以及「一國越是呈現出進攻性或擴張性，越可能引發與之抗衡的聯合的形成。」（陳奕平 2006:77）

如果把制衡視為結果，除了認知或意識型態所可能導致的誤解之外，基本上一定必需先有威脅才有制衡。威脅是產生制衡的決定性條件。這個邏輯反過來說，當一國不受威脅的話，它也不會主動採取制衡。

伊肯貝里也贊成這個論點，他說「威脅論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未出現對美國的制衡。美國權力確實非常強大，但他並不會帶來威脅，至少不足於引起對抗同盟的形成。」（Ikenberry 2002:15）

（1）權力不一定代表威脅

對威脅論的學者而言，決定威脅還得考慮以下兩個因素：一是地理位置，一是美國國內制度。但也不能忘記美國所建立起來的各種全球建制，以及美國的善良意圖。具體而言，按照沃爾特（Walt 2006），美國不會直接威脅他國的理由在於：

(a) 地理位置，美國難於進行擴張領土的戰爭。再加上，其他強權都彼此鄰接，因此強權相對於擔心美國，更擔憂彼此。在亞洲，美國被視為同盟。地理鄰接性解釋為何中國、俄國、印度很難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反美聯盟。與美國比起，它們更擔心彼此的擴張性意圖。施韋勒也說「大部分時間，美國權力對大部分國家不產生威脅。美國在地理上與其他強權分離，並且美國對征服他國的領土並沒敢到興趣。「聯車」(bandwagoning)是在迫切威脅對方之下該國與自己聯盟，但「美國並沒有這麼常威脅這麼多國家。」(Walt 2006:186-187)

(b) 美國意圖可以被視為相當友善，至少到最近為止。美國視自己為離岸平衡者，其他國家對美國秉持同樣看法。

(c) 美國權力都是防守性的。美國努力於將權力用於維持既有的安全建制。沃爾特認為權力本身不等於威脅，反而必須考量到反現狀意圖及意識型態，才足以判斷過大的權力是否會招來制衡反應。由於美國向來贏得誠實掮客(honest broker)、世界體系穩定捍衛者之美譽，因此從未遭受全面制衡。然而911恐怖事件後，美國外交採用先發制人原則(“doctrine of preemption”)，全球掀起反對聲音，質疑美國單極體系是否有所變質，從善霸變成惡霸。因此沃爾特主張美國應採取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一來利用美國強大軍事優勢，把勢力放射於全球體系，二是與他國保持距離，避免過度切入世界其他區域的權力中心。

按照沃爾特的說法，如果美國要於未來繼續維持在東亞的軍事優勢，就必須力圖圍堵中國，儘量避免中國於崛起過程中產生過度的權力誘因，且不要讓中國領導人以為，坐得上東亞霸權的席位是輕而易舉或理所當然的²²。沃爾特說：

22 Stephen Walt. 2006. “Taming American Power”, p. 241

『中國的經濟擴張對美國優勢（US primacy）帶來長期威脅』；對此威脅，美國以兩種政策作為回應：一、鼓勵（encourage）中國參與於國際建制，譬如國際貿易組織；二、對中國謹慎圍堵，確保中國不會向台灣或其他美國東亞盟友動武²³。美國總統布希說：「中國不會受美國的威脅，但不代表不會受制約²⁴。」

（2）補充威脅論

上述主要因素說明威脅論如何看待美國為何對他國不造成威脅。除此之外，沃爾特還補充另外三個理由：

（一）其他國的制衡政策失敗了，因為採取制衡很危險；（二）當一個反美聯盟出現的時候，美國都能夠施行「分而治之」的戰略；（三）在軍事、物質等方面，任何反美聯盟勢必會比美國微弱。

其他作者還提出稍微不同的因素，對保羅而言，他國不感到威脅的原因在於：

（一）「強國不怕被美國佔領，因為自己具備核武。」（二）中國、俄國及其他國家都在經濟上與美國有高精度相互依賴關係，它們擔心軍事競賽會阻礙經濟發展；（三）強國不怕美國的直接征服，因為美國曾謹慎地不干預中國、印度和俄國的分離運動；（四）強權不怕被美國征服，因為所有的強權都認為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團體的不對稱策略讓長久佔領他國領土的行動變成無法施行的；（五）大規模的制衡沒有發生是因為強權並沒有把美國權力視為對它們主權的威脅

（Paul 2005:53-56）。

23 Stephen Walt. 2006. "Taming American Power", p. 46

24 George W. Bush's speech at the Reagan Library, November 19, 1999.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37&prog=zgp&proj=zusr>

(3) 以沃爾特的理論觀點設想中國未制衡

沃爾特解釋，權力大小轉移到全球體系不會自動產生威脅，這種看法確實有說服力。沃爾特認為惡意企圖帶動制衡反應，確實強調了反現狀意圖的重要性。但在解釋為何美國仍必須圍堵中國的時候，他主要是基於經濟擴張等零和賽局的論點認為經濟擴張必然會與美國利益發生衝突。另外，他也認為中國企圖建立一個東亞霸權體系，但也只是出於自己猜想，畢竟中國官方文獻從未提到有意建立霸權體系。簡言之，沃爾特並未參考中國國內因素，也未探究中國參與國際政治與經濟建制更深層的內部理由，而僅解釋極為模糊的假說，如中國領導人的意圖，或他所猜想的菁英意圖及長期戰略。

然而，以沃爾特的理論觀點為出發點，確實也可得出不錯的論述構想。儘管中國政府從不明言其意圖與戰略，但由於受到前蘇聯瓦解和國內民主運動的深刻影響，外部威脅轉而為內部威脅，因此原先關注的是冷戰體系的穩定與風險，現在則須轉而重視國內菁英生存與國內政經體制的發展。中國將軍事上不制衡美國，作為換取經濟利益的主要籌碼，以經濟利益作為繼續不制衡美國的主要動機。美國能提供中國參與全球體系的機會，為中國創造經濟誘因，進而改變中國對美國單極體系的利益期待與威脅感受，有助於讓中國逐步減少受美國威脅的印象。引用這些解釋，輔以沃爾特的威脅理論，可將不制衡概念與經濟利益連結起來，把體系改變與菁英利益相為結合。進一步可以得出，參與國際建制可刺激務實外交、與意識型態妥協，都有助於繼續減少對外威脅，並改善國外雙方的威脅。軍事圍堵與軍事制衡不再被視為實際可用的外交。但沃爾特並不支持上述推論邏輯，因此也未能認知到中國不制衡美國的真正原因。

(4) 意圖之於正當性

美國近幾年加速了軍事能力的擴張。從現實主義看來，國防預算不斷擴張應令他國擔心美國意圖和戰略，威脅理論以美國「意圖為善」想要解決這個矛盾。問題是，意圖是最不客觀的變數。在溝通意圖過程中必定發生不同議題、當局、媒體、個人干擾和誤解。意圖是短期和不確定的，任一方能夠有意無意影響意圖的內含、表達和意涵。

因為意圖在理論上的缺點，應該應利用正當性這一概念代替。也就是，國家依據權力定位彼此的體系位置，並認定長期有效的正當性地位。因為權力不是固定不變，當權力發生改變時，體系位置隨著而變。正當性可以回答為何發生問題。當快速崛起的國家在客觀上獲得了新的體系位置，其新位置的正當性必須被其他國家所追認，否則發生衝突。若新霸權的國際行為破壞既有體系，並嚴重地挑戰甚至限制其他國家的利益，其他大國將會拒絕追認給予那個新崛起強國的正當性。正當性的好處在於，各國的行為其實作為正當性不斷被驗證的一個過程，它是一個永續被溝通的權力貨幣（power currency）。

第四節 國內因素與制衡失敗

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醜惡的東西。
 在整個改革開放中都要反對腐敗。²⁵
 — 鄧小平

壹 戰略和意圖皆屬於國內及表層結構

沙特（Robert Sutter）認為中國之所以不制衡美國，是因為美國總統布希並不給予中國首要關注，讓原以為中國對美國享有相當程度的權利槓桿的中國菁英，打消了這個錯誤期待。事實上，許多中國政治學者認為，布希上任後不久的 911 恐怖事件，對中國而言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來使美國將注意力從中國的崛起，移轉到伊拉克及中亞，二來美國軍事預算日益擴張，無法應付另一更龐大的軍事任務，譬如與中國交戰。在這個情況之下，中國受到的軍事威脅相當有限，因此也沒必要對美回以軍事競賽或制衡。

可見，大部分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都把國家行為因果關係置於體系層次（systemic level），很少考慮到國家層次（domestic level），也很少獨立探討區域層次中的因果關係。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理論家欲將國際關係學發展為一獨立的政治學領域，尤其獨立於國內政治。惟有在體系層次上無法提出具說服力的因果關係時，才會往國內或區域兩個方向尋找答案。它們把不能解釋的變數，留到國家層次，並稱之為「大戰略」或「菁英意圖」。

癥結在於，大戰略及菁英意圖，常淪為代罪羔羊般的替代說法。學者討論美國不制衡時，為了簡化模型，不對各國內部仔細說明，只以大戰略或意圖草草代

25 鄧小平，1996，《鄧小平文選》，香港：三聯書店，頁 492。

過。使用本土的（indigenous）國關理論卻太抽象，無法闡明大戰略背後各國內部的政治結構及利益誘因；簡言之，這些理論未能描述國家行為的國內限制²⁶。

石之瑜則以反對戰略及意圖作為的論點，來解釋反制衡。他說道，中共近六十年使用過好幾種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外交原則，如社會主義外交（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平共處、反霸權主義、孤立主義、國家主義、新現實主義的獨立外交、新自由主義的大國外交等大戰略²⁷。冷戰後，中共基本上接受「對抗之中沒有前途」的方針，「要建立世界影響力，最好的方式是推動高速、高品質的經濟發展，展開誠懇合作、國際經濟與文化交流，把自己變成富裕民主社會，虛心吸收有用經驗，而不問其政治與社會導向，以增進人民的物質與文化財富。（...）一九八二年以來，獨立自主是中共最高外交口號，在此大標題下又列出反霸、反帝、和平共處及開放政策²⁸。」可見，戰略是國家建構的副產，旨在促進國家建立，協助臨機應變。

西方中國專家則偏好闡述中國最新戰略及外交政策。譬如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認為，中國近來採取了一個新俾斯麥式的戰略，目的在防止壓倒性的反華崛起陣營出現。這樣的避險戰略（hedging strategy）並不直接以美國或其盟友為敵，而是在大部分情況下，防止反美趨勢出頭，尤其是近期的未來²⁹。不過在 1997 年，金氏卻提出相當不同的看法，當時他認為中國外交目標有三：一是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勢力；二是阻止日本發展為中國在東亞的強敵；三

26 施韋勒現實主義的低度制衡理論，可說是一個不錯的例外。

27 石之瑜，〈中共對外關係〉，《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下冊），台北：陸委會，頁 10-49。

28 如上

29 Avery Goldstein.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關北京其他圍堵戰略的分析，可參見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3):64-99

是預防東協國家、俄羅斯或印度等較次要區域行為者，向美國或日本靠攏³⁰。

不難發現，金氏的猜測前後矛盾。其實，從比較金氏十年前與十年後的戰略描述可見，中國對美政策雖維持不制衡的態度，但外交上確實出現卓著進步，尤其在區域行為上。可惜金氏沒能從近十年內哪些因素的改變，來解釋中國大戰略的變化。我認為，國內條件是一個不錯的因素，尤其是外交政策正面回應所產生的官方利益誘因。

在中國學術界，有關「中國大戰略」的討論，是近幾年才有的³¹。但自此以後，中國發展出不同的本土戰略思維。最知名的區域戰略包括睦鄰外交戰略，此戰略涵蓋了政治、安全、經濟、資源等項目的廣泛外交思維。此戰略以相互（經濟、安全）依賴為出發點，在不理會各國政治制度為前提下，與東亞、中亞、南亞各國或各國間加深關係，為區域穩定發展作出一切努力³²。

對於戰略，中國在 1997 年後更清楚提倡中國和平崛起之說³³，目的有二：一是回應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以及現實主義普遍堅持的「中美衝突之說」，畢竟霸權之改朝換代，很可能引發強權爭霸的危險³⁴。

二是提出制衡理論的替代方案，認為制衡並非權力崛起的必然結果。理論上主張與西方採取不同的假說，強調中國制度具有獨特特徵，與西方歷史的發展道路固然有所不同。由於地廣人眾，中國於崛起中仍保留諸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厭棄霸權主義、擴張主義，以領土飽和、尊重國際法為基本原則，避免與美國發

30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3): 36-73.

31 有關中國大外交的比較完整的討論，可參見：王逸舟，2003 年，《全球整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32 陳向陽，2003 年，《中國睦鄰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頁 287。

33 也稱之合秩序性崛起（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或和平發展（鄧永昌，中國和平發展與西方的戰略選擇）

34 許長榮，多難興邦：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經驗和人文啟示，北京市：新世界，2008；彭澎主編，和平崛起論：中國重塑大國之路，廣州：廣東人民，2005；胡宗山，中國的和平崛起：理論、歷史與戰略，北京市：世界知識，2006；張幼文，徐明棋等著，經濟強國：中國和平崛起的趨勢與目標

生衝突。這個論點背後的自我形象（self image）主張，中國崛起屬歷史必然、不可抵抗，世界體系的霸權會像陰陽起伏不斷改朝換代，中國的崛起順從自然規律，其意圖善良，基本上也支持現狀，但新強國的崛起引致影響權力重新分配，不必大驚小怪。

台灣大學教授蕭全政認為中國借和平崛起之名，行制衡美國之實。「中共的『和平崛起』戰略（是以...）完成『反霸與爭霸』的最高目標。（...）為了『反霸』，就全球層次而言，中共講求大國外交、聯合南方國家，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尤指聯合國和國際貿易組織），參與國際政經運作與競賽規則之制定，以制衡『一起』的擴張和全球主義的發展，並強調多極化的趨勢；而在亞太層次，中共強調睦鄰政策與亞洲主義的擴張，以牽制美國霸權和亞太主義的發展。根據中共自己宣稱，這都是針對美國『稱霸』而進行的『反霸』³⁵。」林經緯也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理論在某程度上而言，只是為了達成對外宣傳目的，中國對內對外有兩種崛起版本，以掩飾中國「積極制衡」美國之事實，最明顯的例子為 911 恐怖事件之後，中俄簽定合作條約：「中俄囿於國際現實情況，雖未言明共同威脅所在，但自 2001 年以來藉持續加強中俄雙邊關係，在國際上聯手合作，企圖抑制美國單邊主義，中俄實際上已經達成默契³⁶。」

責任大國理論主張，中國發展軍事能力對亞洲區域有建設性作用，有助於對外宣傳中國的正當性³⁷。此政策提出之際，中國外交發生了改變，原本由鄧小平主張的「韜光養晦」，於 90 年代中面臨了一連串的挫折，讓中美之間陷入似乎相互為敵的地步。這點我在討論個案部分已提到。「韜光養晦」最大缺點在於過度

35 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22 期，頁 21。

36 林經緯，〈探索中俄軍事合作的虛實〉，《中國大陸研究》，50(2)，頁 133。

37 劉杰，〈走向「負責任大國」：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定位及路徑演繹〉，《負責任大國的路徑選擇》，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 編，2007 年，第 2 輯，頁 20。

消極，對外「抽格」的行為，除了會模糊戰略之外，也引起周邊國家憂心，擔心中國一旦強大，會不會繼續支持東亞現狀。對於鄰國的擔憂，中國政治菁英提出安全戰略主張，宣稱中國會是一個講求和平與責任的大國，一來讓政治菁英理解到，其實中國國家安全並未受威脅³⁸，二來也讓外國政治菁英看到，中國願意與該區域分享其繁榮發展。無論如何，責任大國理論至今仍常用以合理化中國的積極對外作為，這裡尤指東亞地區。

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際，中國外交提出消極的「韜光養晦」，到了2003年，卻逐漸轉為積極的「多邊戰略」。既然美國大抵維持對華圍堵政策，中國於二時期所認知到的國力與行為不可能有太大差異，畢竟大國有大國行為，有責維繫區域穩定、與區外大國維持穩定關係。在體系層次不變之下，中國外交會產生改變，應有區域和國內兩層次的動機。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系主任勒格羅(Jeffrey W. Legro)認為「大戰略透過國內政治加以過濾。（...）外交戰略的意義很難單憑外在條件來定奪。（...）權力及相互依賴都不足以直接構成中國大戰略，畢竟唯有國際體系內各因素都經由國內政治的決策過程，才會發生效用³⁹。」

38 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49（4）

39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7), 5(3): 515-534.

貳 制衡失敗（施韋勒的低度制衡理論）

施韋勒在《Unanswered Threats》一書中，提出一個第二意向回歸（second image reversed）的國內政治模型，解釋為何那些受到威脅的國家時常無法謹慎地挑戰其戰略環境中各種危險的變化。在國際理論上，這種從國內政治的角度去解釋一國的對外政策的途徑值得玩味。施韋勒從新古典現實主義出發，主張結構層次的壓力必然需要透過國內政治結構的傳遞才能夠產生效果，而每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國內政治結構並不一定相同，如此也就說明了為什麼處於相似環境結構下的國家，有時候會有截然不同的對外作為。這點在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歷史所做的詮釋幾乎全數被保羅施羅德證明無效之後，顯得十分關鍵。

具體而言，低度制衡是指一國不制衡或無效率地制衡一個危險且需索無度的敵人。當一國實行低度制衡時，有兩種情況，一是把崛起強權的意圖誤解為友善，亦即在認知上發生誤解，二是雖然它正確地解讀對方的侵略性意圖，但因為受到國內政治及社會局限，國家沒有採取謹慎的國防政策，因而無法保護國家安全。

施韋勒並沒有特別說明低度制衡的後果，有的改用低度制衡的國家倖免於被他國征服，有的則沒這麼好運。低度制衡本身並不一定導致政治災難，而且當我們考慮國內因素的時候，可發現低度制衡並不是一個國際政治的例外，而是預設常態。

低度制衡有兩種原因：（一）行為者的偏好，對政治菁英而言，國內因素比國際因素更為重要，國際因素不產生採取制衡政策的誘因，此種情況可視為是否有制衡意願的問題；（二）制衡政策潛在的國內風險和成本過高，政治菁英決定不採取制衡政策的誘因，此種情況可視為是否有制衡意願的問題；（二）制衡政

策潛在的國內風險和成本過高，政治菁英決定不採用制衡政策，此種情況可視為能否具有制衡能力的問題。

在尚未出現一個確定且廣泛的政治共識以前，低度制衡與撫慰政策應會得勝，就是因為這些政策代表受到最少抵抗的國內政治路徑（Schweller 2004:48）。

在施韋勒的分析模型中，四種因素特別重要：菁英未達到共識、菁英內聚程度差、政權很脆弱以及社會內聚程度差：

（1）菁英共識

菁英共識是指菁英對威脅的認知，可以用認知一致度來衡量。一種情況是，菁英認知到威脅很迫切，但有關如何面對這威脅無法達成共識，是撫慰政策、追隨政策或推卸責任政策？

結構主義時常忽略認知的問題，施韋勒提出上述的兩種因素一針見血，因為問題建構是一個主觀的過程，且只有局部地受客觀事實的影響。國內的意識型態、社會議題、宗教、政治制度、特殊問題等都能阻礙菁英客觀地認知到外部威脅。

中國新一代的政治菁英對來自東亞區域的威脅以及來自美國實力的威脅頗有系統性的、實際的研究和認知，相對於過去的政治菁英新一代的領導人比較不受意識型態左右，他們努力於讓中國扮演負責任大國的新角色。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假設，中國新領導人對威脅的認知應該達成了高度一致。

（2）菁英內聚程度

菁英內聚程度是指中央政府政治菁英內部的分歧程度。政治菁英內部分歧程度在政治光譜上分成雙極，一極是極端國家主義者和不忠國賊兩個極端對立的

陳營，另一極則是所有政治菁英及團體屬於一個主要大黨，並共同宣導其意識型態、宗教信仰或民族主義的主張。

中國明顯屬於第二種情況，所有社會力量以及政治團體屬於共產黨，共產黨外不能有任何社會及政治力量。因為外交政策屬於軍事委員會與領導人的專權，外交權沒有結構性的平衡機制，外交政策的擬定、規畫、執行及監督全是總理、國家主席、軍事委員會等人單獨負責，不受國會、在野黨或其他政治勢力的影響。由於此特色，有關外交政策，菁英的內聚程度，我可以假設它是高度一致的。

(3) 政權脆弱性

政權脆弱性是指政權軟弱和政府不穩定、正當性不足與政策無力。有關中國的政權脆弱性有兩種矛盾性看法。一方提出中國內部在社會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地區之間的發展落差、環境安全、食品安全、人民暴動等各種嚴重問題，中國國內情況似乎岌岌可危。另外強調共產黨公共政策的執行能力、對人員、資訊、物品流通的控制能力以及對國內社團壓力的抵抗能力。如單單從政權內部運作討論，中國政府顯然穩定、政權健全有力，看不出政權的脆弱性。

(4) 社會內聚程度

社會內聚程度是指將社會成員及社會團體聯繫起來的力量。所有社會成員接受同一套遊戲規則，承認社會體制的正當性並且尊重解決紛爭的機制，無論他們之間的分歧有多深刻。

在中國國內政經發展的問題十分嚴重，例如政治腐化、城鄉差距、社會階級貧富差距。在法律不公正、不完備、不中立的情況下，人民無法參與政治過程，

無法表達反對聲音，故對於共產政權的支持必須依賴於經濟發展以及生活條件的進步。

因此，社會內聚程度的解釋途徑在中國是否適用確實是一個問題，由於中國幾乎沒有由下而上的政治議題流通過程，上屬單位不需要對下屬單位或人民負責，使得最高層負責外交政策的單位獲得廣泛的自由空間，不受下屬單位的壓力而能夠按自己的判斷採取外交政策。

理論上，社會內部分歧的國家會低度制衡，而且社會內聚程度較強的國家最有可能有效地制衡外部威脅，並且政權會獲得社會廣泛的支持與服從（Schweller 2004:12）。

但產生低度制衡的因素並非僅限於以上四種，因為不能排除這樣一個可能性，即一個國家具備制衡的能力卻自願不制衡。當世界主要國家把世界格局視為現狀及正當，低度制衡是一個謹慎且合理的政策。這點合乎霸權說。

貧窮與富裕國家之間的衝突部分可回歸於既有世界秩序的正當性之爭，即領土的瓜分、建制的運作、治理的結構、規則與價值。在一個正當的世界秩序中，連最不滿的國家也希望改變體系之內的改變，而並非改變體系本身。只要不牽涉既有的建制結構的破懷，現狀的更改是可以接受的（Schweller 2004）。

關鍵問題在於，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之中，崛起的強權所倡導的價值是否獲得維護和推廣？提升崛起強權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是否能滿足於其意圖？

假如（一）在政治上，中國有一個穩定的政權，並且此政權不依賴民主正當過程，政策結果不需要對人民負責，這會增加政治菁英對社會批評的抵抗力；

（二）在經濟上，中國社會內聚力高，大部分社會團體支持改革開放及國家大戰略，也支持有關國家發展的機關和政策以達成此目標；（三）在堅持改革開放的

過程內，中國菁英對於採擇不制衡政策有共識；（四）菁英內聚力高，雖然我對於共產黨領導階級內部運作的瞭解有限，但我可以假設，菁英能夠有效地達成共識，一部分取決於政黨高層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所擁有的結構性優勢，另一部分則是藉由地方領導人以人脈為主的濾選機制。

依據低度制衡理論，中國政治菁英最有可能達成有關制衡美國與否的共識。換句話說，中國政治菁英最不可能無法達成有關要否制衡的政策。結論是，因為中國在冷戰結束後至今確實還沒制衡美國，這個事實絕不可能是因為中國國內政治失敗所導致的，而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中國政治菁英有志一同地選擇了不制衡這一項政策。

中國採取「不制衡政策」和中國不採取「制衡政策」，在理論上有不同意涵，後者從結構現實主義或傳統的制衡理論推論，前者則著眼於新古典現實主義，但基本上都牽涉到同樣事實：中國不制衡美國顯然沒有受到體系機制的懲罰。因此，不制衡美國產生了正面的政策回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增加了不制衡政策的收益。為何要突然廢除一個有利的政策？

在不制衡美國的外交框架下，中國才可以提升自己所欲扮演的東亞區域領導角色。其他東亞國家把中國視為華禍或華興完全取決於中國能否善意且負責任地對所有重要的國家建立並長久地經營一套完整的友好關係。

若中國與美國發生冷戰式的制衡對決，中國便無法建立東亞地區中的領導地位。

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實質軍事能力的提升已經讓東亞地區其他國家感到十分不安。但是因為中國目前推廣且實施「睦鄰、安鄰和富鄰」政策，他國才沒有對中國施行積極的制衡政策。

第五節 小結

以上整理諸多制衡條件，主要可以歸納出幾種類性的條件：

- （一）屬於國家範籌，如軍事實力、領導階層、國家意圖、國家利益；
- （二）屬於國與國之間的互動範籌，如正當性、經貿關係；
- （三）屬於區域結構及體系結構範籌，如極和體系結構。

從成文不成文層面切入，可以發現有些條件對政府有不同程度的約束能力。

有些條件：

（一）屬於成文法，即影響政府決策過程，如中共於 2005 年提出的「台灣獨立法」和中美「三個公報」；

（二）不是成文的說法，對政府沒有行為約束力，但基於歷史經驗，以為有局部的普偏性，如意識型態對立、後進發展強國的軍事崛起對體系產生威脅（德國對英國，日本對中國）；

（三）僅僅是假說和理論，其普偏性受懷疑，如美國對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區域層次的安全結構對區域內國家行為的影響。

從國際層次的角度看，可發現大部分理論都以體系層次為重點，可能是因為制衡概念受到冷戰思維影響，讓制衡討論集中到體系層次。也就是說，結構主義、新自由制度論和全球主義等理論都強調體系層次的權力關係和經濟制度相互依賴關係，傾向於忽略制衡在體系、區域和國家三種分析層次上各自發揮不同功能和受到不同限制。

壹 全觀未制衡因素

表 4-1

一般性因素	不制衡行為之體系因素	體系及區域環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貿易外交，貿易合作成為全球、全區域的主要發展 相互依賴，中美貿易合作關係對雙方非常重要
		軍事能力分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沒有體系爭霸的威脅 美國享受軍事優勢 中國缺乏長期與美國交戰的能力 中國沒有當體系霸權的能力 中國沒有擴張主義的軍事傳統
		美國戰略及外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對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 (carrot-and-stick policy) 成功，能影響中國的對美政策 美國於伊拉克及阿富汗軍事交往，中國並非主要外交任務 美國多數中共外交專家認為中國並不作為體系威脅
	不制衡行為之國內因素	菁英決策團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非簡單 (non-simplistic) 中美關係觀 中共新菁英團隊相對於第三代領導人更多元、高學歷、開放更與學術界合作
		改革過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外交為改革服務
		社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煽動民族主義製造負面的國際中國形象，政府謹慎操控民族主義情緒 多數人民拒絕以意識型態為主導的生活方式
	特定因素	保持距離	國際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對華圍堵戰略 (US Sino Containment Strategy) 美國對華強手途徑 (US Strong Hand Perspective) 美國於 911 恐怖事件後不斷擴張軍事預算，已占世界總軍費之過半 美國堅持研發、使用、佈置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區域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包圍政策，美國利用與東亞各盟友關係對中國產生制衡杠桿 美國繼續將軍事基地佈置在與中國有陸地接壤的國家 中國堅持迅速軍事現代化
		維持現狀	體系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國大致上能接受既有的國際建置，採取默認戰略
			區域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國從睦鄰外交獲得國際地位的提升，也獲得經濟榮景 中美在關鍵利益衝突上獲得了共識 (台灣問題) 美國在東亞有助於壓抑日本走軍事正常化的趨勢 美國維持美日安全條約關係、台灣關係法、美軍駐韓各種安全條約 東協各國對中美在東亞採取政治套利的策略選擇 (strategic choice of political arbitrage)
		拉近距離	體系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對華：先妥協途徑 (US Compromise Perspective) 經濟相互依賴性
			區域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區域周邊國家對美、中兩國維持雙方靠攏的安全外交
			國內因素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成熟領導團隊，領導階層從處理好中美關係獲得社會地位、經濟利益、歷史地位 迴避風險政策 反美、反霸、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鬆散化、掏空化

貳 各理論制衡和未制衡條件的簡表

表 4-2

理論	分析層次	制衡條件	未制衡條件
華爾茲之體系論	體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國際權力分配過度集中，形成單極結構 制衡是體系功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無（未制衡只是過渡時期的現象）
沃爾特之威脅論	體系、單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綜合實力 (aggregate power) 地緣距離 (proximity) 具有威脅對方的軍事能力 (offensive capability) 威脅對方的意圖 (offensive intention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霸權地緣位置疏離其他強國 雙方均無感到威脅或沒有威脅意圖
沃爾弗斯之霸權穩定論	體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甲國權力大但不至於超強，能夠形成國際建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甲國權力微小 甲國權力超大，能夠制止乙國採取制衡政策
美國（國際）建制論	體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乙國敵意的政治制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國際）建制能夠引誘潛在敵人加入國際政經規範
美國先發制人制衡論	體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先發制人制衡乙國，因而刺激乙國制衡美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即使先發制衡乙國，但乙國無感到威脅或無能力回應
權力正當論	體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乙國權力被視為不具有正當性 乙國自稱挑戰國際秩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乙國權力具有正當性
美國善良霸權論	單元（美國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過度奉行單邊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美國自由民主制度 軟權力
施韋勒之低度制衡論	單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乙國內政治菁英團結、有能力，社會團結並無其他更重要的議題，使得菁英能夠堅決回應外部威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乙國內菁英不團結、無力，社會部團結或有其他更重要政治議題，造成菁英無法適當地回應外部威脅

第四章 研究假說與研究方法

*Science may be described as the art of systematic over-simplification.*⁴⁰

— Karl Popper

第一節 提出一套「美國未遭制衡」的研究假說

壹 層次影響制衡條件

本論文區別體系、區域和國家層次，認為各有不同制衡條件。制衡條件與國家利益有關，因此若利益受侵犯的話，主要端看被侵害利益的層次，以及受害國家的體系地位，以判斷被受害者的反應。

相對於弱小國家，強國的利益更為重要，因此無論是體系、區域或國家利益受侵犯，新興強國的反應都會更為嚴厲。

表 4-3 層次影響制衡條件示意表

層次	利益重要性	維護利益的結構誘因	制衡條件
國家	高，並隨著國家能力增長而提升	強，並隨著國家能力增長而提升	違背核心利益，如領土完整、國家主權
區域	中，但隨著國家能力增長而提升	中，但隨著國家能力增長而提升	違背區域利益，如區域秩序、區域軍事安全、區域經貿合作、區域經濟發展條件
體系	低，但隨著國家能力增長而提升	弱，但隨著國家能力增長而提升	違背體系利益，如全球經濟穩定、核武不擴散

表格：作者自繪

40 Roberta Corvi, Patrick Camiller.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Karl Popper. Routledge, p.121

新興強國的特點在於，隨著權力的增長，其利益排序發生重組，新興強權的自我定位、利益評估、對區域和體系結構的影響都發生相當快速的變化，霸權要謹慎關注新興國家，要釐清新興強國如何重新界定不同層次的利益，以避免發生利益衝突。

貳 一個制衡邏輯

不少美國制衡專家認為新興強國在回應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時，大致上只能選擇「制衡」抑或「追隨」兩項⁴¹。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則強調有中國特色的崛起路線，即所謂「和平崛起」，尤其強調新興強國能夠在堅持崛起同時迴避制衡。本論文認為，以上兩種看法各自強調同一個制衡邏輯的不同可能性。

此制衡邏輯可以從兩個切入點講：一、結構層次開放與否；二、利益受確保與否。所以本論文針對一個制衡邏輯的兩個切入點分別提出兩個假說。

參 針對「結構層次開放與否」

如上所述，制衡邏輯一方面強調層次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霸權的角色。原因在於，當新興強權增加總和國力並往整個區域擴張後，一方面要衡量新興強權的國家利益是否受到尊重，另一方面要端看霸權是否允許新興強權的擴張與否，並且霸權要加以阻礙或開放。

41 Stephen Walt.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pp. 3-43

所以第一個假說事實上已經牽涉到三個重要因素：層次、利益以及霸權的角色。質而言之，由該三個因素分析觀察可以得到，中國不制衡美國，即中國採取合秩序性崛起的未制衡政策，取決於美國不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主要包含其國家主權、國家領土完整、共產黨領導權等國家層次的核心利益。再者取決於美國不侵犯中國的區域利益，包含允許中國往整個東亞區域擴張其影響力⁴²。最後取決於美國允不允許中國往區域甚至全球體系滲透影響力與否。

假說一

合秩序性崛起的未制衡因素起源於國家層次，但主要表現於區域層次上，並在區域層次上影響中國與美國的互動模式。

制衡因素取決於國家層次是指，作為國際體系中的獨立單元，國家的一切行為和利益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維護和擴大國家能力和功能。國家會否制衡另外一個國家，端看制衡會否維護國家的生存或根本利益，抑或國家層次的根本利益是否受到確保（保護、尊重）。換言之，國家層次特別指的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有時候強調「爭取利益」，如經濟發展、天然資源的獨佔權、影響他國外交行為等，有時候則強調「維護利益」，如領土完整、政權穩定、不干涉內政等。制衡作為防衛性外交政策，特別牽涉到「維護利益」，其根本目的是要克服外在威脅，並維護和擴大國家能力和功能。

中國這種「維護和擴大國家能力和功能」會如何表現？往外伸張權力是中國崛起的主要特徵，但往外擴張權力受到國內的、區域的和結構的限制。中國目前

42 由於中國國家能力仍不足於往全球體系擴張，中國最關心的是國家及區域層次的利益及影響力。

的整體能力不足於影響整個體系的變化，中國所謂的往外擴張，主要是影響東亞區域。所以本文假設中國的崛起目前為止主要表現於區域層次上。

當然，中國軍事現代化在未來二十或三十年持續發展的話，總有一天中國會以軍事能力影響東亞以外的其他區域，這個時候中國會越來越像一個體系行為者，也越來越像一個第二個超強。

在國家利益受到保護的前提下，新興強國會在區域內爭取發展並擴張其影響力，直到其欲跨越區域層次，更往體系層次發展。如上所述，此時端看美國要否允許中國成為一個全球體系的強權，這是一個長久且看得見的過程。若這些發展條件被侵犯的話，新興強權的崛起便受阻，並回到被侵犯層次利益加以保護，因而採取制衡的可能性甚高。

肆 針對「尊重利益」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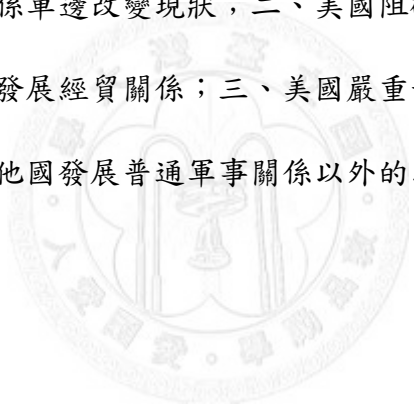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這點也跟層次有關，尤其是牽涉到在層次上可觀的利益。譬如，以美國論述角度，主要認為美國未遭制衡是因為美國：一、軍事實力太大；二、地理優勢；三、在區域上提供軍事平衡、經濟穩定的公共財；四、代表自由民主。

但本論文研究中國不制衡美國動機後，認為美國以為不受制衡的理由不完全是中國不制衡美國的真正理由。中國不制衡美國反而是因為：一、在戰略上，中國不用挑戰世界和區域秩序以擴張其影響力到東亞區域內，一方面是經濟崛起「自然」改變了中美合作及中國與其他區域國家合作的結構誘因，另外一方面美國過去已逐步開放區域層次，並不違背中國在東亞區域扮演重要角色；二、中國經濟發展提升了中國體系地位，並改變了中國決策者對體系和區域層次的結構誘因的反應，尤其如美國確保中共國家及區域利益的話，在中美互動之方面，合作

的邊際刺激總比制衡的邊際刺激高；三、中國決策者為降低國際衝突的機率，在美國確保不侵犯中共國家利益的條件下，一方面積極推動睦鄰政策，另一方面自助扮演軍事安全、經濟穩定的角色。

如果比較美國與中國之間在什麼條件下制衡對方，發現美國論述主要認為，如果中國發生下列情況，美國將會制衡中國：一、中國快速發展軍事實力並表達意願對美國東亞盟友動武；二、中國對台海兩岸關係單邊改變現狀；三、中國被主要東亞國家視為威脅來源。

中國則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制衡美國，條件為：一、美國干涉中國的核心利益，尤其美國對兩岸關係單邊改變現狀；二、美國阻礙中共國家發展大工程，尤其限制中共在東亞區域發展經貿關係；三、美國嚴重干擾東亞權力平衡，包含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他國發展普通軍事關係以外的以圍堵、阻礙中共為目標的軍事聯盟關係。



假說二

中國是否制衡美國，其策略選擇並不完全以針對美國權力為唯一條件，而必須衡量：

- (1) 中國在關鍵**利益**上（例如：台灣問題、共產黨專政、經濟成長）是否不受到美國的挑戰；
- (2) 美國有沒有對中國產生其他緊迫**威脅**，包含
 - (a) 政經威脅：對中國而言，中美政經合作的結構邊際刺激能否維持高於制衡邊際刺激的狀態；
 - (b) 正當性威脅：美國是否承認中國作為強權的正當性（例如：美國具體和象徵性地接受中國軍事、經濟、政治等能力的崛起）。

當滿足以上所有條件時，則中國將會繼續採取不制衡美國的合秩序性崛起戰略。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此章節討論研究方法，將分成有關產生假設性方法基本內涵和有關行為者誘因、雙邊互動類型及行動者利益之互動性分析架構等兩個主要部分。因為論述循序，先介紹理論類型等方面，但重點在於假說產生的方法。

壹 假說產生方法之基本內涵

在政治學中，通常將理論建構(theory building)及理論驗證(theory testing)兩大環節區分開來。理論建構是種非常複雜的活動，包含學術界整體的研究進步，也包括諸多學者個人的研究突破。

針對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而言，理論建構有兩個方面需特別注意。一方面是所謂類型 (typology)、類型理論(typological theories)，以及具備類型特徵的研究途徑 (approaches that share typological features)。另一方面則要瞭解，透過類型途徑產生出新假說或想法，會如何補充既有的理論架構。

(1) 類型理論及類型化架構

就整個研究過程來看，類型理論通常是一種中級階段的研究工具。構思完最重要的獨立變數後，研究者可採取類型理論，將這些獨立變數予以類型化(通常分為名義性、順序性、間隔性或其他類型)，再加上提出假說，以闡明變數在單獨及共同的情況下，分別會產生何種效應。一個理想的類型理論，也應進一步討論，不同情況下，不同組的獨立變數會如何影響特定依賴變數。

類型理論可指出實際觀察到的變數關係，以及目前尚未被觀察的變數關係，或者處理特定變數之間，所有可能出現的變數連結關係及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類型理論能整理出一般性的路徑 (generalized pathways)。這裡所謂的一般性路徑，不限於發生過一次或千次之路徑，也可能是尚未發生的假設性路徑。

類型理論對於獨立變數的多寡，通常不會太早下定論。亦即，基於「異途同歸」(equifinality) 的原則，不同變數、事件和路徑發展，都有可能產生同樣的結果。譬如，未制衡若為結果，其原因可能在於霸權與挑戰者之間的軍事力量差距過大，抑或因為雙方之間沒有明顯威脅，抑或雙方不會違背彼此的基本利益等等。即使可能性很多，但都是起因於特定變數之間的不同輕重組合，可根據類型化的發展來追溯。

類型理論的優點，在於能提供一個相當彈性的平台，使研究者能夠結合行為者和結構，讓這套行為者與結構的複合假說形成一種初級理論。譬如，透過某些類型理論，可瞭解不同類型的國家如何與不同類型的國際體系發生互動，抑或不同類型的經濟體系如何與不同類型的經濟部門或經濟行為者產生互動。

為分析不同類型的行為者，布贊根據不同類型的互動層次和互動方式，建立了一種類型分析架構。運用這種分析架構，極有助於進行不制衡研究。在堅持國家作為單一行為者的原則之下，可指出國家同時在三個不同國際層次上行動，以及國家會基於不同目的而做出不同反應和行動。在布贊類型架構中，即使不是所有變數互動可能性都對本研究一樣重要，但至少可提供一種可能性空間 (possibility space)，這是以往所未見的。以往在新現實主義影響下，研究者認為，超級大國不僅是其主要行動集中於體系層次，其利益也集中在體系層次上。換到今日，研究者則發現，由於行動空間擴大，超級大國的利益可分成不同層次，不必然匯

聚於體系層次上。此外，由「異途同歸」的特徵來看，未制衡不必然肇始於體系層次上的互動。換句話說，未制衡可能是由一組極低層次的因素所引起(如同施韋勒討論國內因素對制衡失敗的重要影響)，至少有這個可能性。

施韋勒之有關聯盟的首部研究著作，基本上可說是一種類型理論，探討不同類型之行為者（現狀者/推翻現狀者）的行為特徵，如何受到其個別體系位置之影響，或它們的行為如何受制於個別軍事力量、地緣情況。中國之崛起，於是也衍生出一個問題：一個現狀強權是否必須在行為上接受現狀？一個反對現狀的國家，是否可為了拖延時間或累積軍事能力，而掩藏其真正目的，並佯裝為現狀強權？亦即，根據先天將國家區分為現狀國家和反對現狀國家，可能並不符合當代事實。

施韋勒於第二本著作中，除討論制衡失敗問題，也對此問題做回應。他提出一個類型理論，認為在國內層次上，有四組獨立變數會影響制衡反應。為此，施韋勒從兩個角度去回答制衡問題，一是國際結構和體系位置決定制衡和聯盟，二是國內情況也決定制衡的根本能力和意願。

我絕不敢稱本研究為一種類型理論。我認為它還差了一兩步驟，只能說是個初級階段性研究，亦即所謂的類型或類型化架構。另一稱呼或許更符合事實：一個具有類型特徵的研究。

類型理論和類型化架構的差別在於，前者較類似學術界的最新研究產品，後者則像生產過程中的工地，要把大量原料、資料轉換成適合做研究的小部分。透過類型化架構，可將不同事件劃分為具有共同因素特徵的類型。在一個理想的類型化架構中，這些類型不僅鉅細靡遺，也會彼此互斥，亦即某一現象(phenomenon) 中的每一案件(case)，均有一個唯一對應的類型。此外，經過設計，各類案件應具備高度類似性，各類型間的案件則要有高度差異性。

一個有關未制衡的理想類型化架構，應要從各種獨立變數中，明確區別出哪些不會採取制衡的國家，譬如一個具有軍事、經濟和軟權力優勢的國家，由於處於國際體系高位置，若該國不對其他國家進行侵犯，也不對其他國家構成其他威脅，且又尊重其他國家的核心利益，那麼此類型的國家可歸類為從未制衡的國家。

雖然上述極簡化的類型有著一絲真理，但仍有太多因素未能考慮到，譬如意識型態如何影響制衡？經濟衰退的強國如何抵抗制衡誘因？決策菁英面臨正當性危機或領導危機時，他們在國際層次上會否較容易對他國家產生威脅？軍事優勢為何有時會產生威脅，有時則不會？

(2) 具有類型化架構特徵的個案研究

針對本研究，可視為一個具有類型化架構特徵的個案研究，但目的並非建立一個細膩的類型化架構，而是透過類型方式，探討中國崛起個案，思索中國如何受到各種影響來制衡美國。作為個案研究，我保留一個開放態度，希望有助於後續研究，共同建立一個較完整的類型化架構，甚而有助於發展為一個制衡類型理論。

換句話說，在初級的研究階段中，透過個案研究，會有助於發展歸納性的類型化架構，畢竟建立一個類型化架構的目的，便是列出一系列最能解釋某現象的理論因素。中國未制衡美國的因素大致列出來，會包含：首先，美國是否尊重中國主權，尤其指牽涉到台灣等爭議性地區的領土主權；再者，美國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扮演阻礙者或推動者的角色；最後，中國會否成功建立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以上只是初步列表，後續研究會再增加新的因素。

(3)「基石方法」途徑

有鑑於理論建構的開放性特徵，上述的研究方法不啻為一種積沙成塔的方法，亦即所謂的「基石方法」途徑（“building-block” approach）。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認為，這種方法的基本特徵是，每份個案研究均能提供一些新的要素，以協助理論繼續發展。在整個過程中，類型的多寡往往不確定，處理同樣類型化架構中的類型時，每位研究者的作法可能稍微不同，原因一方面是研究分前後、高底層次，另外則是被研究對象持續改變。

個案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從個案研究中歸納出全面性的假說（general hypothesis），而是相反地將全面性假說細膩地套在個案研究上，提出更深層的理论假說，提供給未來研究檢驗。

(4)「個案研究」之基本內涵

艾克斯坦比較「個案研究」和「比較研究」兩種研究方法，認為前者具有下列四項特色；（一）研究範圍是處理單一個體，而非大量個案或母群體（population），處理整個個體（whole individual）而非嚴格限制的變量（variables）；（二）在研究方法與技術上，研究的每一階段都是開放的，並無嚴格的程序；（三）研究報告的內容是個案歷史和詳細素描（portraiture）；（四）研究目標是確立研究對象的特色（particularity and unique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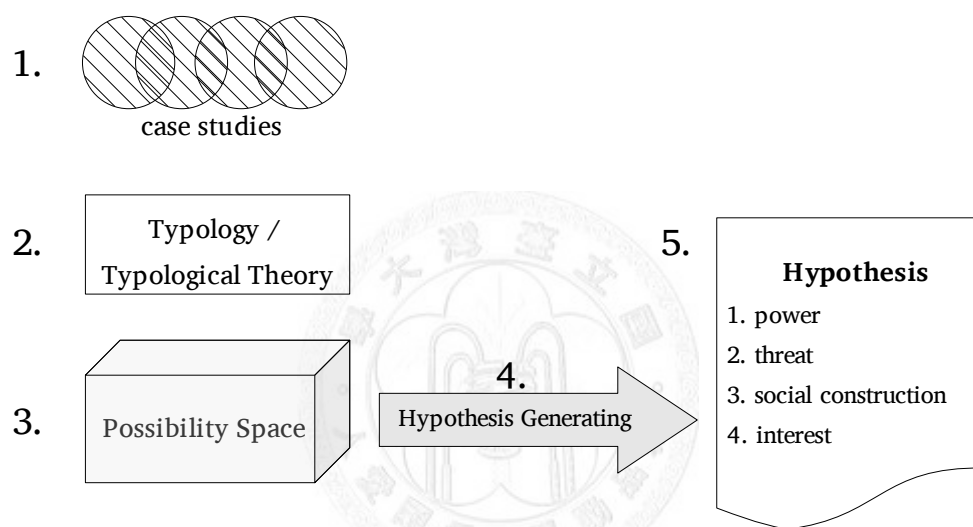
(5)假說產生之方法（hypothesis generating）

假說產生（hypothesis generating）是一種檢討和補充假說架構的過程。所謂檢討是指，基於新的個案研究所發現的新訊息，研究者重構分析類型，對新的和舊

的關鍵因素加以重組和分類，並複審可能性空間是否出現新的可能性。從可能性空間中歸納一組新的代表性的變數關係，並將它描述為假設性的因果關係。假說產生的「產品」便是提出一個補充性的假說，開放給後續研究檢討和驗證。

整個假說產生過程可如以下圖表表示：

表 4-4 假說生產過程示意表



貳 文獻研究方法

此研究進行文獻分析，目的是在理論上抓到「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背後的問題意識。要回答此研究問題，要先瞭解這是與現實主義內部有關之主要分析層次的爭論，結構主義主張體系層次為主，新古典現實主義則不排除區域和國家的分析層次。

更重要的是，各理論提出的論點在性質上有所不同，有的是結構性，有的是過程性，有的則是互動性。無論我們要支持或反駁某一論點，務必是有針對性的，不可以用過程性的論點反駁結構性的論點，更不可以跨層次用區域層次的過程論點反駁一個體系層次的結構論點。關鍵就在於仔細地區別不同論點的層次和性質，文獻分析的目的在此。

本論文參考布贊的分析層次架構。布贊區別「分析單位」(Units of Analysis)以及「解釋來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並批評華爾茲的結構主義把結構和層次混為一談，除了犯了過度簡化理論之嫌，還使得諸多學徒不重視其他兩項解釋來源，即「過程」(Process)和「互動力」(Interaction Capacity)。結果，結構主義者的研究嚴重缺乏動態向度。

分析單位，在本體論上，是指政治現象所發生之處，在知識論上，是指研究者認為因素所在發生之處。要注意，因素被觀察的地方不一定是因素生效的地方。舉例而言，中國將軍事擴張從經濟發展速度解脫開來，研究者從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行為反應，在體系和區域兩分析單位上，觀察到特定行為變化，但導致這結果的主導因素，是發生在國內分析單位上。嚴格而言，分析單位只是理論工具，事實上各層次同時互相影響。但使用分析單位幫助研究者區別觀察同一因素如何影響不同位置的行為者。

解釋來源，是指研究者按照因素的性質，對因素再度進行分類。這樣的分類要幫助研究者更細膩地描述國家之間互動模式。布贊區別：

（一）結構，是指一種描述性原則，是描述各國家在體系內如何被安排，在功能上被區別，在相對能力上如何發生關係的基本原則。

（二）過程，是指國家之間的互動模式、限制和動力。在特定互動水準上，國家形成什麼樣互動機制並受到的什麼樣動機的模式。

（三）互動力，是指影響國家在體系內發生互動的各種因素，如交通、溝通、組織化的程度。它牽涉到軍事科技、數位化、新資源發現、新安全威脅等等因素都影響國家之間的互動方式（Buzan 1995:205）。

表 4-5 層次分析架構表

分析單位 (Units of Analysis)	解釋來源 (Sources of Explanation)		
	結構 (Structure)	過程 (Process)	互動力 (Interaction Capacity)
體系 (System)			
區域 (Region)			
單元 / 國家 (Unit)			

資料：Buzan 1995

本論文認為，要有意義地回答「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必須以特定國家或區域為進行研究，因為（一）美國對世界不同國和不同區域的滲透力不一致；（二）制衡或不制衡美國霸權的意願和動機一定是不一樣的；（三）回應美國霸權制度所採取的方式和策略是不一樣的；（四）而且這個回應受到不同區域在權力分配、深層結構、敵友關係和地緣政治條件上的差異，影響各國制衡美國的限制或機遇不同，所以一定要考慮到體系、區域、國家三種層次的分析單位對於制衡不制衡所提供的不同解釋力。

在對中國未制衡美國的論點進行整理和加以分類之後，再度進行中美論點比較，把美國本土論述與研究結果作對比分析，目的是要從交叉分析找出雙方最敏感、最會影響制衡的關鍵。這樣我們也更能瞭解美國未遭制衡，不是奇蹟，而是中美共同迎接的機遇。



第三節

行為者誘因、雙邊互動類型及 行為者利益之互動性分析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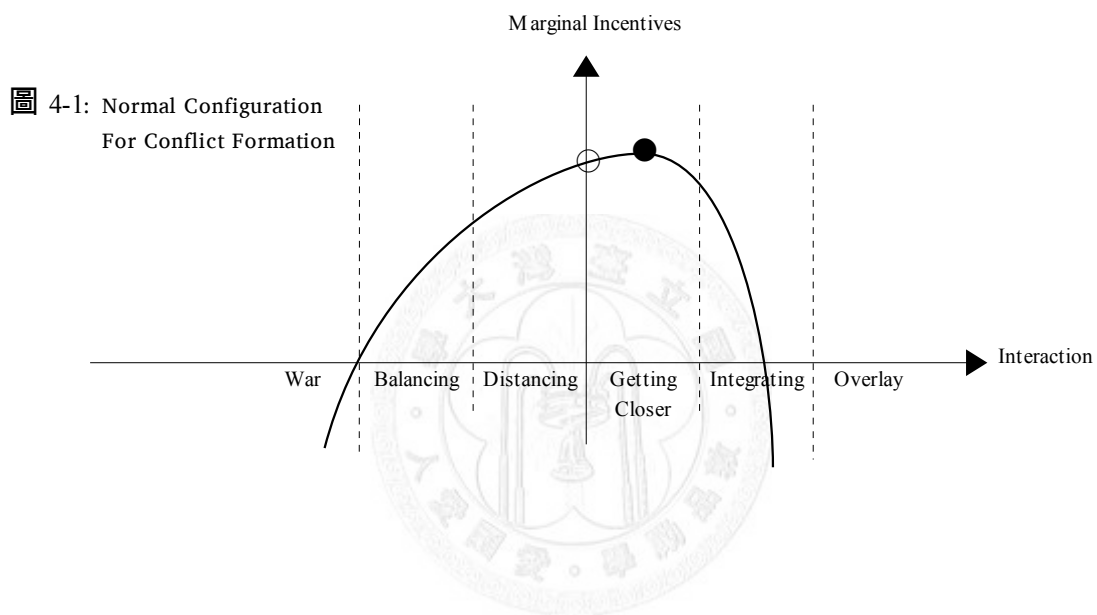
接下來，我以概念圖表的方式結合有關制衡和不制衡因素以及體系、區域及國內各三個層次之間的互動關係。首先我區別六種國家互動的類型，分別為：戰爭、制衡、保持距離、拉近距離、整合以及統一。這些行為代表各國家之間所有可能的互動類型。

「戰爭」(war)一方面是指局部或小規模的戰爭，為懲罰對手或達成新現狀。戰爭也可以指涉需耗損更多物資且承擔更多風險的大規模武力交涉。「制衡」(balancing)是一種威嚇，是指不發動戰爭的軍事制止，但不排除使用武力。這類雙方關係，除了克制對方和創造零和賽交易之外，沒有許多共同目標。「保持距離」(distancing)是指雙方關係有問題，但仍有共同討論的空間。「拉近距離」(getting closer)是指合作或協商達到特定限度，並且在許多問題上達到共識，但在許多面向上，雙方仍要保持獨立作為。當國家進行「整合」(integrating)的時候，會放棄單邊主義，並而更進一步與對方形成正式的共同組織，正如同歐盟一樣。「統一」(overlay)是指超強完全控制弱小的一方，或兩國自願地形成政治統合，成為一個新的國際行為者。

Y軸所要衡量的是與對方互動的邊際刺激(marginal incentives of interacting)。邊際刺激是指該國採取特定行為時所實際獲得的利益誘因，但也可以理解為該國預測的結構誘因。如果邊際刺激高，該國會受到強大結構誘因，而去採取某種行為，如果邊際刺激低、甚至呈現負向，那麼該國就會儘量迴避採取這種外交行為。

事實上，沒有單一指標能完整描述這種錯綜複雜的互動，但為了方便討論，我要在正確性和操作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並適度簡化模型。

在以下描述每一種情況時，如同圖表（4 - 1）表示，我將會從白點(○)開始，即代表出發時情況，黑點(●)則代表該特定國際社會型態下最高的邊際利益。國際社會型態產生結構誘因，使國家決策者往某一方向行動。



壹 結構誘因及結構限制

(1) 結構誘因

結構誘因分成變和不變兩種。不變的因素包含：（一）極數，形容國際社會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二）深層結構，包含無政府狀態或有秩序狀態；（三）安全結構，包含衝突矩陣、安全機制以及安全共同體；（四）社會結構，形容國際社會的敵友關係模式。

認定有變的因素包含：（一）安全化程度，形容特定區域內各國之間簽訂的雙邊和多邊安全約定和條約；（二）能力，包含硬權力和軟權力（三）威脅感受，形容意識型態和組織結構上的能力以及是否意願與對方進行協商；（四）與對方進行互動的邊際利益，形容國家之間的相對權力關係。

(2) 結構限制

剛剛談的是結構誘因，現在來介紹結構限制。結構限制同樣是一個互動概念，指的是甲國（譬如霸權）限制乙國（譬如新興強權）追求外交利益。結構限制與侵犯國家利益有關。結構限制的概念強調國家行為會受到不同層次的限制，為方便起見稱之為層次限制。而且在該層次上被限制的對象是利益，因此也可稱謂層次利益。這點跟我論文的第一假說有密切關係。

實際上，層次限制係指一種利益排序的概念。國家利益可以分成不同等級，若利益的追求受到霸權等國的反對或侵犯，被制止的國家將會依照被侵犯的利益的層次之不同，而出現不同等級的反應。某些行為特別容易引起制衡，某些較不會。而這個差別不僅與被侵犯的利益有關，更與此利益屬於何種層次有關。

舉例而言，與美國干涉中國領土完整的利益相比，美國反對中國對印度政策明顯不同，前者屬於最核心的國家利益，後者則是區域層次的利益，核心國家利益被侵犯會產生最嚴重的國家反動，但某一個區域政策受挫並不會產生如此大的反彈。至於霸權若反對新興強國的某一政策或利益，我則稱之為層次限制。

我在下一圖表（圖 4 - 3）中會用畫三條代表國家、區域、體系三層次的「層次限制」(level restraints)。層次上存在層次利益，而層次限制指的是超強限制或允許新興強權追求該利益，亦即超強對新興強權實現該利益採取抵制或開放的態度。超強之所以能夠採取抵制或開放的態度，是因為雙方之間存在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但隨著新興強權增長權力時，此種不對稱的權力關係越來越受到懷疑、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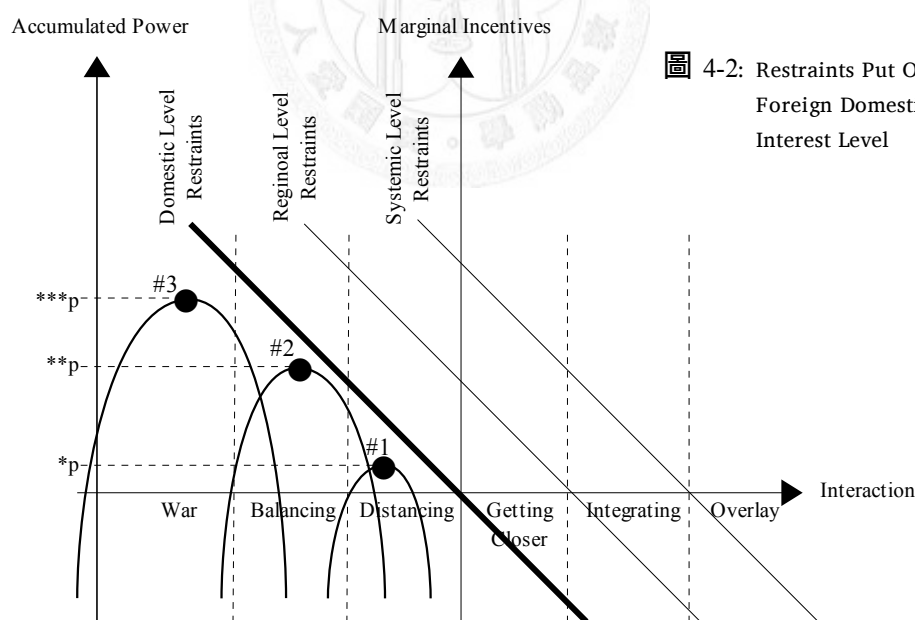


圖 4-2: Restraints Put On the Foreign Domestic Interest Le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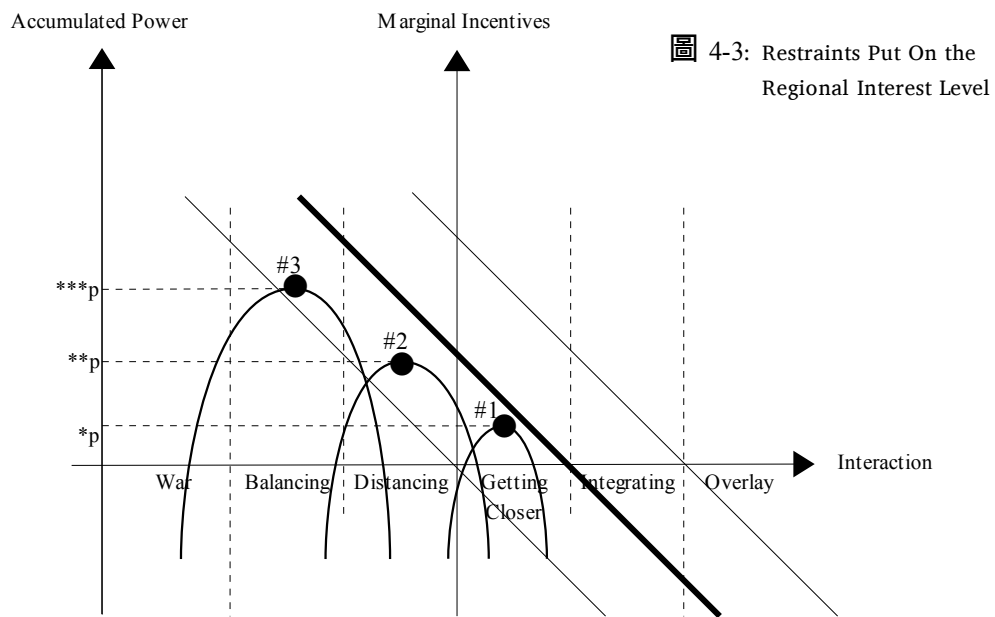
以上圖表顯示國內利益被侵犯的情況。與其他利益層次受侵犯相比，此情況最嚴重。可能是因為甲國家被不允許追求其國家利益，抑或因為其國內利益受侵

犯，在兩種情況下，甲國家都會頂到國內層次之限制。隨著能力增長(power accumulation)，該國會逐漸地往左上角移動。依據被侵犯國內利益的國家本身的權力增長，其反應選擇包含保持距離、制衡抑或戰爭。舉例而言，弱小國家被侵犯國內利益的話(如上表#1)，由於其軍事能力不足(*p)，它們無法啟動制衡機制，而最多會與加害國家保持距離。但有軍事能力的國家(如#2)，它們會為了維護國內利益全力以赴採取制衡政策，抵制加害者。更強大的國家如美國(如#3)，當其國內利益受侵犯時(如 911 恐怖事件)，立刻以最堅強的方式回應，為了確保國內利益連戰爭也不能排除。

上述情況不現實，但為了瞭解此理論可能性也得加以討論。當甲國反對乙國的國內政治制度，抑或其國家主權、國家領土完整等最核心的國家利益，那麼甲國與乙國完全沒有合作的可能性，因此結構限制會在拉近距離(getting closer)之處以前先穿過 0 點。也就是說，甲國與乙國的合作利益完全被限制在結構限制左邊的三角形區塊內，絕不可能超過右邊那條結構限制。

我們可以預測出，雙方會以保持距離甚至制衡的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也不排除戰爭的可能性。此種模式類似韓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只不過，由於當時中國軍事能力不足，無法對美實施全面制衡政策。

若霸權承認乙國的核心利益的話，雙方的合作利益可以如下一個圖表（4 - 3）發展。



由於霸權仍反對乙國追求區域利益，如建立區域經濟體、區域安全、區域軍事合作等，因此對有軍事能力的國家而言(如#2)，保持距離乃被視為最合理的對策，儘管謹慎地拉近距離也是一種可能政策。此模式大致是1970以降至冷戰結束以前的中美關係。但對強權而言，其區域利益被侵犯的話(如#3)，此舉牽涉到其作為強權的整個利益範圍，因此得以軍事手段回應，制衡甚至戰爭不排除其外。此模式大致是美國陷入第一個伊拉克戰爭的情況。

中國作為新興強國，會受到區域環境的機遇與限制，因此有必要介紹東亞區域的基本格局。東亞是一區多極、無政府狀態的衝突矩陣，由於過去東亞的歷史脈絡而呈現一種不容易改變的敵我分明的狀態。

我可以在理論上，為這樣的國際社會型態歸納出一些標準，並提出一些假說：

(一)毫無疑問，戰爭不排除在國家可能發生的行為之外；(二)統合是不可能發生的，東亞內沒有國家具備足夠的力量或誘引力形成區域統合；(三)現狀已經對大部分國家產生相當高的邊際利益（絕對的高度這裡暫時不重要），因此各

國繼續往拉近距離之方向移動的結構誘因存在但不甚大。不過，往保持距離和制衡移動的結構誘因更差，這是因為區域大國都嚴重地依賴經濟穩定，而且保持距離會提升對將來區域軍事發展的不確定性而提高風險；（四）由於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對各國至為重要，繼續往整合的方向發展的結構誘因微小，沒有國家願意為解決安全困境形成政治共同體。

貳 中國進入制衡局面

接下來將討論焦點放在中國進入不同制衡局面上。為了說明進入制衡是怎麼發生的，可以想像不同中美關係，中國隨而從許多不同路徑進入制衡狀態。這個想像世界的中美關係條件不完全與今日世界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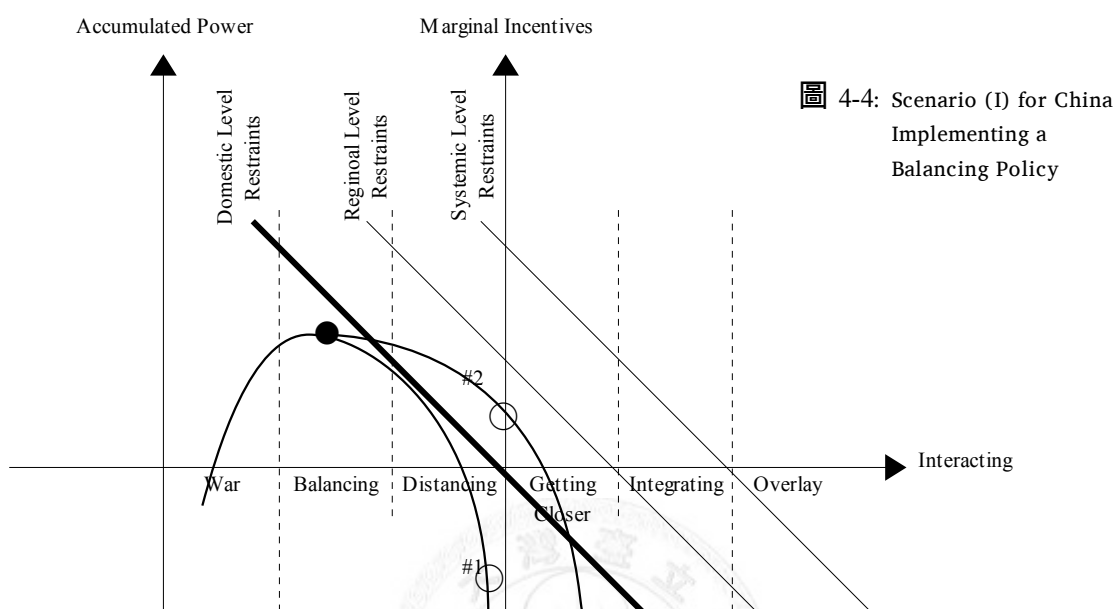
首先假設，中國和美國受到結構誘因的影響而幾乎不可避免彼此之間的制衡。假如一個嚴重對立的雙極區域體系已形成，可能是因為國際社會結構的敵友關係不利，抑或因為意識型態對峙，使得雙方不給予相互正當性承認，也反對對方具有政權正當性。如此一來，使得雙方只有藉由制衡、圍堵和軍事制止才能夠維持不戰的消極和平狀態，合作則相對不利。

上述的情況有兩種版本：

（一）最不利的情況，即雙方對立非常惡劣，互不容忍最核心的國家利益，如政權穩定、領土完整、意識型態等。拉近關係會立刻產生負面的邊際利益，政治上完全有合作刺激。可能因為意識型態及政治利益矛盾嚴厲，再加上具有可信的軍事威脅，使得雙方不得不採取制衡行為，以維護其基本國家利益(曲線#1)。

（二）情況二，即雙方維持恐怖平衡式的穩定狀態，可能因為雙方軍事力量平等，因此互相謹慎接觸，且因為相互不信任，因此容易受到其他制衡因素的影

響，使得整個局面岌岌可危。隨時有可能因為利益衝突，沒有互信而感到對方威脅。將來向保持距離和制衡的方向移動的結構誘因比拉近關係來得高(曲線#2)。



接下來要提出一種較特殊的情況，亦即因為霸權侵犯新興強國的關鍵利益而發生關係突變。基本上，侵犯利益的性質與受到威脅的情況不完全相同。威脅的原因，不少與國際社會敵友關係以及歷史脈絡有關，這種威脅對國家外交政策具有長期的結構性影響。相反地，侵犯利益是一個突發性且具體的危機情況。利益被侵犯與否，通常可以在具體的個案上發現。利益被侵犯後，既有國際社會敵友關係和威脅程度都會帶來增減威脅的影響。可以說，尊重利益與否以及受到威脅程度在某一種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

假設雙方原本具有潛在的政治衝突、利益分歧，但因採取務實外交而達到正面的合作刺激，謹慎地拉近距離，避免衝突(如○表示)。雙方原本的互動方式原本可以往比較好的方向發展(如#P₁及P₂)。然後假設外在或國內條件丕變、政壇失盤、霸權侵害新興強權的基本利益，這導致務實外交無法延續，各自回到原本的

基本利益衝突階段，也就是說彼此侵犯對方的國內利益(如#V表示, $V = \text{violating interests}$)。那麼，倘若這種惡劣的外在或國內條件維持不變，採取制衡便一定是最理性的外交行為。重點在於，新興強國隨著而且崛起過程和積累軍事力量的同時，也只得往制衡方向演變(如G表示, $G = \text{growth}$)，雙方隨後進入結構性的制衡關係。兩岸關係具有這種被壓抑的衝突特徵，與巴爾幹半島、菲律賓等地區的分離主義也類似。一國為了國家發展，採取軍事主義國家建設，並與鄰國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也屬於這類的互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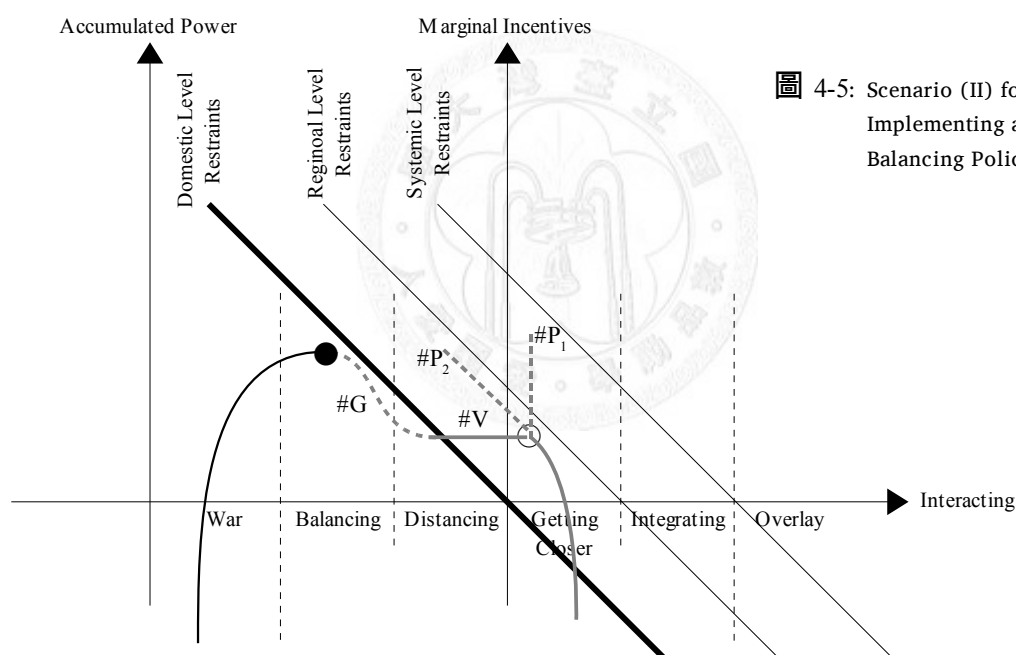


圖 4-5: Scenario (II) for China Implementing a Balancing Policy

參 中國未制衡局面

未制衡的情況可以有兩種解釋。首先從結構誘因來看，新興強國與霸權互動產生對雙方有利的情形，使新興強國的結構誘因朝向拉近距離、甚至整合的方向推進。這是理想的情況。再來從層次限制看，只要消除霸權對新興強國的體系限制(systemic level restraints)，使新興強國能夠追求全球國家利益，且霸權能長期不變此政策和利益保障，雙方便不會有問題。但要將結構誘因提高到如此程度，且讓霸權大方放棄自己單極體系的金鑰匙，都不是易事。

如文獻回顧談到，理論上，未制衡因素可分成幾種一般性和特定因素，只要這些因素可解釋為新興強國的國家利益，並對其加以層次分類，便能發現此一關鍵問題：霸權是否尊重新興國家的國家利益。以「中國從睦鄰外交獲得國際地位的提升，也獲得經濟榮景」這樣一個典型區域利益為例，美國若能接受中共追求此利益，那麼中共便得以突破區域性的層次限制(regional level restraints)，因此也夠提升其結構利益，也不會因提升結構利益而被逼往左邊，朝保持距離的方向移動，如此一來，中共也為更進一步遠離制衡政策。反之，若美國致力干涉中共獲得區域利益，中共無法從拉近與美距離中獲利，因此被結構限制逼迫退往保持距離、甚至制衡的行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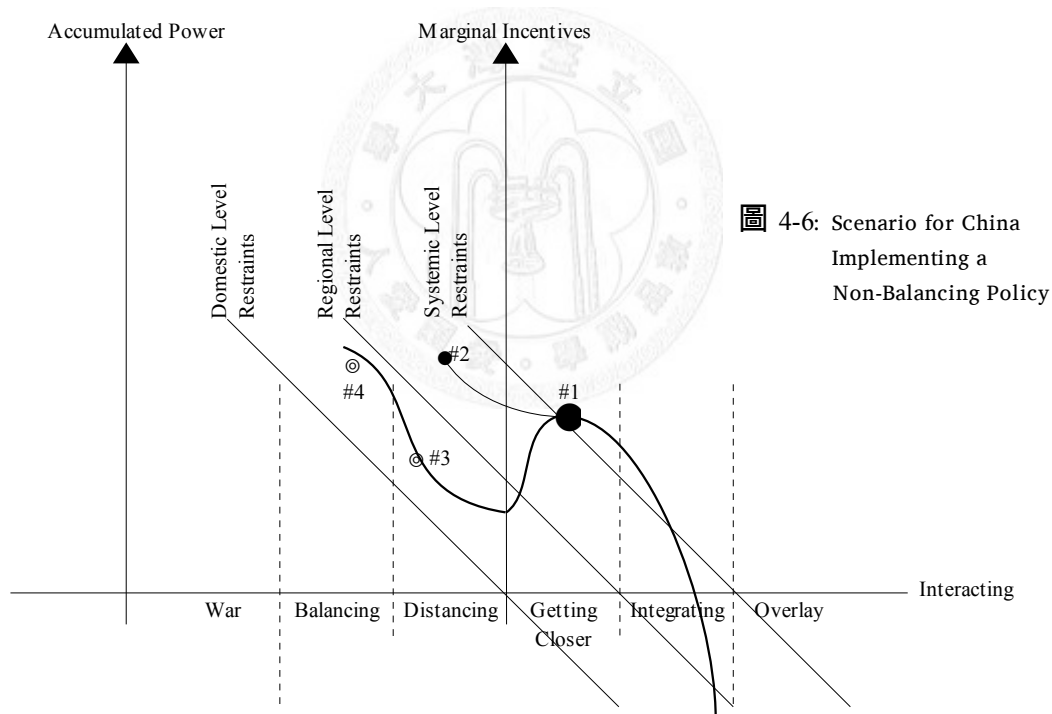
那麼，在以下的圖表中，我將討論兩種情形：一個新興強權如何提升其國際影響力，同時又如何迴避陷入制衡陷阱(#1 及 #2)。以東亞區域為背景而言，制衡不是沒有可能，但它有體系結構的條件，尤其是層次限制。

在上述的文獻回顧已看到，新興強權以迅速軍事現代化為首，經濟崛起為輔，達成國際地位之提升。關鍵在於，該新興強權如何將其軍事及經濟之崛起加以合理化或修飾，才能消除霸權對新興強權的懷疑。其崛起是為了爭取體系正義、

「糾正」體系格局，甚至挑戰霸權，還是一種應該的發展，歷史發展的難免結果，還是崛起對於區域、體系帶有具體的好處？

霸權若提出特定限制，新興強權的發展可能會因而受挫，此時是否會引起制衡，端看該挫折的嚴重性、時間的長短以及被解讀出的意圖。

許多人認為，只要美國反對中共的意識型態或國際地位的提升，就不可避免引起中共的反制衡。其實不然，美國若不反對中共在國際體系中追求其國家利益，固然最能確保中國不會制衡美國(#1)，但儘管美國反對，也要看美國採取何種方法(#2 或 #3)。



當霸權為了避免新興霸權為所欲為，而在體系層次上提出一個門檻條件，譬如基於人權問題採取包圍政策，或建立反新興強權的軍事同盟關係等手段，只要霸權不至侵犯下一層的區域層次設限，而讓新興強權在其區域發揮影響力，儘管有政治矛盾和利益分歧，但其實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出現(#2)。唯有在完全填滿區

域權力空間下，新興強權才會認為不跨越體系限制會對其發展造成障礙。也就是說，如果新興國家認為自己身為區域霸權，應有合理的往外擴張的權力，那麼體系終究應要開放體系限制，否則新興國家會往體系下一個利益高點發展：保持距離(#3)或制衡。



肆 中美關係之全球局面

接下來談中國和美國在體系層次上的互動效應。首先，體系層次屬於單極體系或稱謂一超多強，美國作為最重要的單一行為者，但並非唯一的重要行為者。美國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上，兼備軍事和經濟方面的相對優勢，但目前和未來仍無法轉變國際深層結構以形成世界霸權。霸權的特徵在於，它可以不允許任一國跨越其利益門檻，而不用害怕受反彈。美國顯然離這種能力還甚遠。即使美國能牽制中等和弱小國家，但對於超多強中的強國又仍束手無策。因此美國究竟能否限制中共往體系層次發展？

在文獻回顧部分已得知，即使許多美國保守派專家希望能對中共長期加以限制、包圍、施壓，但也曉得美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今日的世界與冷戰初期的世界截然不同了。而此差異也表現在雙方許多的利益重疊，無論是高層次的全球政治安全、全球金融穩定、反恐戰、核武擴散禁止，還是低層次的反走私、食品安全、流行病控制、貿易協調等方面，都需要雙方建立共同制度才能解決。所以，體系結構的基本趨勢顯示，邊際利益會隨著縮短距離、增加合作而提高，圖表上越往右走，代表邊際利益越高，一直到雙方的接觸會限制若干國家主權為止，大致來說就是接近整合的行為模式。

從全球角度看，由於美國擁有經濟、軍事、政治和軟權力的明顯優勢，美國在所有互動類別上都享受比中國更高的邊際利益。如果雙方採取拉近距離的政策，中國和美國或許都取得同樣高的邊際利益，但原因不同：

對美國而言，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推動了經濟上的合作，也有助於穩定整個政治體系，並免於美國被東亞軍事問題拉下水。

對中國而言，與美國拉近關係有助於建立合秩序性崛起的條件，方便中國往外滲透經濟市場和在海外取得石油等重要發展資源。

針對安全結構，必須強調的是，戰爭不能完全被排除，尤其在台灣海峽中特定小規模的武力交涉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則因為彼此之間的威嚇而變得較不可能。

中美雙方除了建立一些雙邊協議及危機熱線外，尚未發展出有效的安全建制。即便雙方都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在諸多國際組織上進行溝通和合作，但雙方也不樂於在任何問題上合作，畢竟有合作就有妥協、讓步、改變等高價成本。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體系的特徵就在於，美國欲迴避妥協、合作、讓步等不利成本，採取單邊主義復興，結果引起許多懷疑和反美聲浪。

國際社會結構是另一個不確定因素。兩個行為者都面臨利益重疊及目標互相矛盾的問題，但至少並非歷史上的宿敵。拉近距離對雙方均有利，但也僅限於建立自由貿易區，目前仍無整合的可能，畢竟中美都高度重視不干涉、獨立外交和國家主權。所以，如圖表所示，整合行為模式會快速減低各方的邊際利益。

相對於拉近距離，在目前結構誘因下，雙方會不想採取保持距離，在美國尊重中國國家和區域利益的條件下，中國比美國還更迴避保持距離。保持距離的方法包括逐步推出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並反對或不支持對方的一些國際政策，但尚未對對方採取軍事威脅。其經濟若脆弱，邊際利益將會快速遞減。由此可見，中國對於採取全球性的保持距離政策毫無準備，更何況保持距離與中共的一貫行為簡直南轅北輒。

但即使沒有結構誘因，只要違背中共的若干重要利益，就會發生跳層次保護利益的現象，上文討論進入制衡局面時已有所闡述。

如果雙方外交關係嚴重受挫，而軍事制衡是維持和平的唯一理性選擇時，美國制衡政策的負面結果，會稍微輕於中國，畢竟美國能在體系和區域層次上快速動員更多資源和同盟國，根據自己所具備的相關經驗、情報、正當性及國際支持，成功對中國採行制衡戰略。中共則較難找到同床同夢的伙伴，而且對制衡毫無經驗，因此只有兩種選擇：與自我撕裂的意識型態對戰，或者採取政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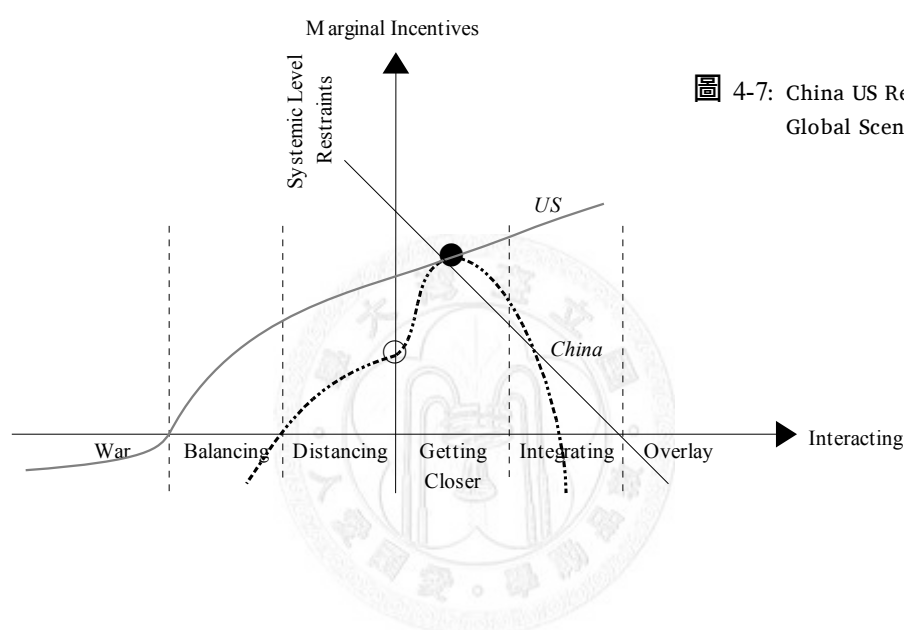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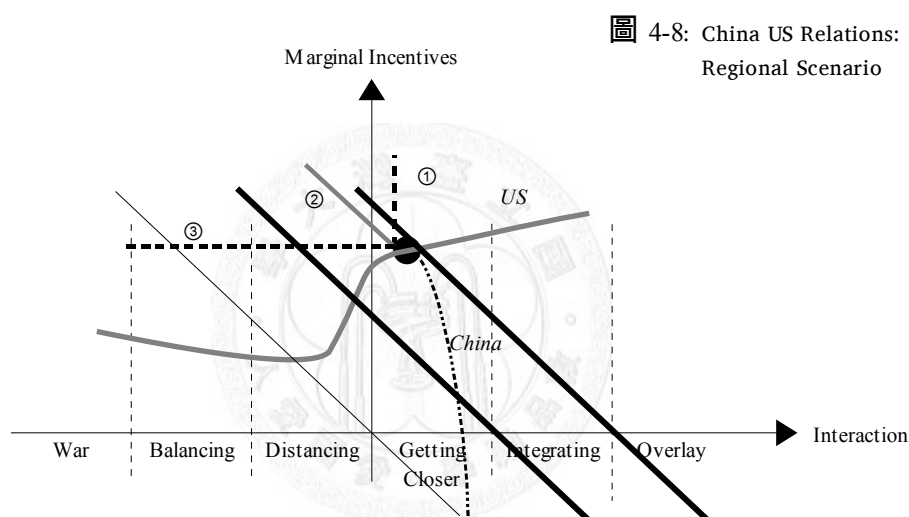
圖 4-7: China US Relations:
Global Scenario

伍 中美關係之區域局面

在東亞，美國不再是超強，而只是區域多極體系中的一個強權。軍事優勢仍然是重要因素，但美國在東亞缺乏領土，並且依賴盟友。不論好壞，美國是區域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定限制和機遇。

東亞是一個敵友關係模式相當明確的地區，不允許同盟成員快速變換。在某一程度上，此特徵可簡單用權力計算。但區域深層結構仍是無政府主義的衝突矩陣，沒有所謂區域性的有效安全機制。在特殊情況下，局部戰爭是有可能發生的。臨界點有二：一、美國是否違背中國的區域與核心利益；二、假定中國繼續快速崛起，美國是否會致力將中國鎖定在區域內，限制其向體系發展。

從分析角度來看，東亞中美關係的動態，主要取決於中美關係如何相互影響。中國將來的三種基本發展路線，都與美國對華政策對應。以圖表來看，一是美國開放體系門檻，給中國崛起並往外擴張的機會（①）；二是美國繼續用包圍政策，不開放體系門檻，將中國鎖定在區域內，但尊重其區域利益（②）；三是美國對華政策失盤，中共認為美國是故意且有系統地違背、阻礙其基本利益，於是採取保持距離或制衡的反應以維護其利益（③）。



第五章 從中國崛起思考美國未遭制衡

第一節 中國本土的制衡概念

柏楊問道：
「中國出了那麼多大儒，卻沒有一個能像西方的思想家那樣，
想出一套可行的制衡權力的辦法？」
黃天麟回應：
「因為統一帝王之下，
這一種大儒早已被誅九族，連歷史的記載也沒有了⁴³。」

中國人有沒有屬於自己本土的制衡概念？回顧近代歷史，清末人有「以夷制夷」的制衡政策，引進西方現代技術（尤其是軍事科技「中體西用」）抵抗帝國主義威脅，將此方法視為一種宏觀的國家發展藍圖。再往前回溯，在秦始皇統治下，中國很早便統一了，所以沒有機會發展出一套政治平衡概念。西方人提出制衡概念，都將制衡、平衡視為一種方法，藉由某些攸關政治利益的法理（特別是憲法）獲得保障。相對而言，過去的中國人不僅沒有憲法概念，更覺得要有一個力量來統一所有意見才算完美，制衡、分歧都是胡搞。西方人講制衡，是因為他們相信有比任何政治力量都更高的正義，亦即憲法。中國人則不講制衡，因為他們不相信人的權力欲望可被制衡，認為唯有借助最大霸權力量，才會有完美、長久且象徵性的「天下」統一。

今日中國人也講制衡，是因為讀了現實主義經典、看了歷史課本，才發現在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世界中，不講制衡反而是天真。而且，現代的制衡概念與中國人的世界觀，其實是可以順利接軌的。原因之一，從文化角度看，制衡是一種多極化，而多極化的概念又影射了中國式的制衡，如同太極圖、陰陽五行，是在

43 見於黃天麟，1997，《中國之興衰》，頁142。

自然之中已經有的力量，不需要人為操縱，這樣的制衡概念不是戰略或行為方針，而是世界觀⁴⁴。另一原因則是，就國際體系而言，制衡會降低美國霸權的影響力，中國人會認為是一種保護國家主權、國家完整的政治手段。也有人認為「反霸」更是為全球體系爭取正義，實現「仁」的政治理想。



44 感謝石之瑜老師提出這個概念。

壹 中國未制衡與現狀

中國採取的外交行為之所以有利其崛起，是因在增加軍事能力和戰略優勢的同時，仍能成功維持國際現狀。改革開放以降、後冷戰以來，中國從來不反對美國所代表的國際現狀⁴⁵。即使中國在 90 年代提出了反霸旗子，但這是共產黨推動的思想架構和宣傳口號⁴⁶，對外交工作沒實際作用。「反霸」旨在引起中國自我認知的心理作用，而非具體的外交方針，這也是西方專家往往忽略的重點。近三十年來，中國獲取了一系列的正當性象徵，如 1979 年獲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位。就連最敏感的台灣問題，更與美國簽了三個中美聯合公報⁴⁷，達成「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每逢新政府上任，美國對華外交工作的首要優先任務，便在於重新肯定「一個中國原則」，以換取中國對美國的友善承諾，好化解其他外交摩擦。中國在巴基斯坦核武化的角色，或是中日關係的歷史包袱，都不曾引致中美關係嚴重衝突。1978 年以來，中國成功加入超過 200 個國際條約和國際建制。冷戰結束後，中國針對「世界格局」始終抱持稍具批判性的態度，以現實主義的立場對待相對利益 (relevant-gains) 的外交政策。1997 年亞洲經濟危機爆發以後，中國領導人發現安全內涵有所變化，須更加重視經濟安全合作。亞洲經濟危機對於共產黨菁英而言是一重大打擊，因而才一改反多邊主義的一貫態度，轉而支持多邊主義⁴⁸。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間，世界體系並未發生任何變化。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全取決於國家政治因素。1997 年 12 月，中國於十五大中提出了新安全計劃，也立刻對東協國家揭示新的合作計畫，令其他國家領導人大開眼界，向

45 Wayne Bert, *The U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ecurity –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p. 135

46 譬如維持世界和平、平等互利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求得共同發展等等。

47 1972 年上海公報、1979 年中美建交公報、1982 年「八一七」公報。

48 中國反多邊主義及多邊主義兩者，被構成為不制衡策略。反多邊主義不應該視為制衡，原因不在程度之差，而是類型之差。此問題留待之後處理。

建立區域安全、經濟、政治等領域的合作建制大步邁進。

此變化令諸多國外分析家一頭霧水，畢竟崛起後，中國變得更為富裕、更富實力，其外交行為應會隨著崛起而病變，起而制衡美國。況且事實上，無論在體系或區域層次上，中國無疑已搖身而為當時的大國。無論中國是區域大國、體系大國，還是東亞大國，都是回歸於正當性的事實。倘若中國要制衡美國，國際社會勢必立刻視中國為反現狀主義者。但沒見過要推翻現狀的現狀國家，也沒見過接受現狀的反現狀國家。



第二節 中國未制衡之經濟面向

在討論個案以及結構誘因以前，此章節欲先從國際金融體系和經濟相互依賴切入討論中國未對美國制衡。

中國是第一個在廿一世紀崛起的強權，與歷史中的英美法德俄日六國的崛起相比，中國崛起的環境是一個歷史以來首次可稱謂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崛起不僅以軍事威脅為唯一的面向，它更牽涉到其他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際金融穩定。中國崛起首次作為一個全球人類密切觀查和研究、鼓勵和批評、歡迎和擔心的全球化過程。

當在 1989 年的時間點上，西方對中國未來的猜測，沒有一個猜到中國會成功崛起。在「一超多強」的新世界秩序中，西方學者不算中國在內。雖然美國結構主義派以往堅持冷戰結束後一個新興強權必然會出現，但他們心目中的新強權，無論是日本、歐盟或中國，一定與美國進入爭霸衝突。崛起被視為一個充滿著衝突的結構過程。到了 2000 年的時候，米爾斯海默、萊恩、華爾茲等結構派者都企盼中國崛起遲早改變國際體系結構，讓體系從目前單極體系拉回雙極，進而啟動新一輪的爭霸過程。

與其相比，全球化派研究全球建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伊肯貝里等人都企盼中國崛起正面回饋於既有的安全、金融和政治建制，並且中國的「合秩序性崛起」始終有助於穩定化中國崛起中的各種不均起伏。中國為了要取得體系「正當性」，因此更努力地與美國接軌加入國際建制。

單極體系變化成雙極體系，中國崛起是主流。可是新的中美雙極體系將來的面貌，與過去美蘇冷戰將截然不同。主要是因為相互依賴的重要性將來更為出色，

特別是國際金融市場對雙極的互動影響。中國擁有美國四分之一的公債，並作為美國最大的單一債權國，中國的美元外匯存量敗日本攻下世界第一，在金融海嘯之際則格外擔心美元將繼續走軟，侵食中國的出口優勢，但脫離美元更會拖垮國際金融市場，引起各國激烈反對。

壹 中國發展國家模式之特徵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發展模式具有以下四個特徵：一、國家獨立於社會之上，一黨專政；二、菁英對發展主義有高度的共識，經濟發展掛帥；三、官僚對社會的滲透無所不在，後集權主義；四、對應世界市場的產業政策，中國採取出口導向發展模式⁴⁹。上述的特徵使得中國領導人對國內經濟政策和對外貿易政策具有高度的操控能力。操控能力對內的絕對優勢表現於國有企業改革、產業改革、金融改革、匯率改革、勞動市場改革、原料市場改革等方面上。操控能力對外的影響力體現於匯率雙軌制政策、對美出口政策、對外資保持開放形政策、加入國際金融體系等方面上。

49 吳玉山，發展國家的沉浮

貳 中國闖進世界金融市場

中國闖進國際經濟體系經由 1985 年的《廣場協議》、1994 年的外匯改革以及 1997-98 年的東亞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清邁協議》以及於 2000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同美國因為抵抗日本經濟影響力擴張反對 1998 年的《新宮澤倡議》（New Miyazawa Plan），中國對東亞貨幣基金的構想則提出支持，並強性執行對外貿易的各種改革，都有助於提升中國在東亞的戰略性地位。

因為中美關係經過上述發展密切綁在一起，中國領導人近一兩年忽然發現一個弔詭的現象，亦即中國在對美外交上的政治操作能力雖然提高，但因為在經濟領域上中國對美元已形成結構性的依賴，卻減弱中國能夠爭霸的長期可能性。

《廣場協議》是美、日、英、法、西德五個工業發達國家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晤，為了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並使美元對日元、馬克逐步下調所簽署的。雖然針對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但因為隨後日圓戲劇性地升值並讓日本對外貿易挫折嚴重，結果決定了中國相對日本獲得了更明顯的長期貿易優勢。

在改革開放的前階段，中國經濟菁英仍不懂得運用貨幣和匯率以創造對自己出口有結構性優勢。從 1979 年到 1985 年中國維持一個很不智的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1.5 人民幣:1 美元），顯然不僅高估了自己的經濟規模，更阻礙了出口產業的發展。1985 年改革了人民幣對美元固定匯率，雖然維持固定匯率，但經常被更改，從 1985 年的 2.8 人民幣對 1 美元，一直到 1993 年年底的 5.72 人民幣對 1 美元。1994 年中國對外匯市場進行了很大的改革，包含大幅的貶值人民幣，不僅有助於中國對外出口，更對今日巨大外匯存款鋪了決定性基礎。

於東亞經濟危機中(1997-98 年)，中國維持人民幣不變，不貶值的決定獲得了

各國讚美，堅定了中國對東亞國家作為「誠實仲介人」(honest broker) 的不錯形象。東協國家加三(ASEAN+3) 在危機過後，針對區域各國的融資缺陷問題，在《清邁協議》架構下，中國支持所謂亞洲貨幣基金。它的設立對於避免或減輕東亞可能再度爆發金融危機、促進東亞地區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起到重大作用。到了2009年2月，東協加三決定將擴大清邁協議的基金，從原本800億美元到1,200億美元。總額的八成來自中日韓三國。

長期而言，中國要與他國建立交換建制(swap arrangement)，尤其與巴西、阿根廷、南韓、印尼、馬來西亞、白俄羅斯正在建立一種以人民幣和當地貨幣為主的貿易交易體系，要脫離美元而直接用人民幣做貿易⁵⁰。

參 外匯、匯率、債券

外匯是指一國所擁有的外幣資產，包含外國貨幣(外國發行的貨幣和外幣存款)、外幣票據(以外幣計值的匯票、支票和本票等票據)以及外國有價證券(包含外國公債、公司債、股票和金融債券)。一國向國外進口貨物或對外投資，大多必須以外匯來支付，如果外匯存底過少或不足，將不足以應付這些國際支付的需求，尤其是對開發中國家而言，由於其本國貨幣多非可兌換通貨，因此必須以外匯作為國際支付的工具，其外匯存底的多寡往往被視為評估其國際債信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購買美國的國債，主要的考量就是「安全性」，其他包括流動性與收益性。外匯儲備的使用也要考量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對總體經濟的刺激和維護作用。

50 Dyer, Geoff, "China has long way to go to dislodge dollar", Financial Times, 21.05. 2009

中國的外匯儲備去年底已高達 2 兆美元(72 兆台幣)，其結構以美元為主，美元的大幅貶值，將令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下降。這筆龐大的外匯儲備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義更讓人不敢輕忽中國的一舉一動。換言之，中國的外匯儲備不但具有實質的經濟意義，政治上的意義及其影響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領導人目前正在思索如何善用這種政治影響力以對美創造一個結構性槓桿，提升中國對重要政治議題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表 5-1 中國的外匯儲備五年綜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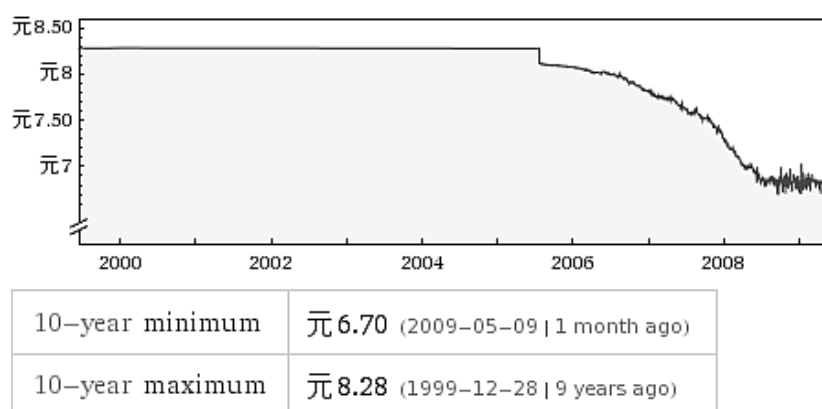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Wolfram|Alpha⁵¹

匯率是指兩種貨幣之間的兌換比率，匯率作為影響總體經濟表現的有效政經工具，可分成固定和自由變動兩種匯率制度。匯率影響兩國的貿易逆順差，因此近幾年成為中美兩邊學者強烈討論的議題之一。美方要求中國升值人民幣，希望這樣能降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1999 年 12 月 28 日，8.28 元人民幣兌 1 美元，一直到 2005 年 3 月底這個匯率不變，中國決定從 2005 年 4 月 1 日起讓人民幣逐漸對美元升值，2009 年 5 月 9 日變成 6.70 元人民幣兌 1 美元。

⁵¹ <http://www88.wolframalph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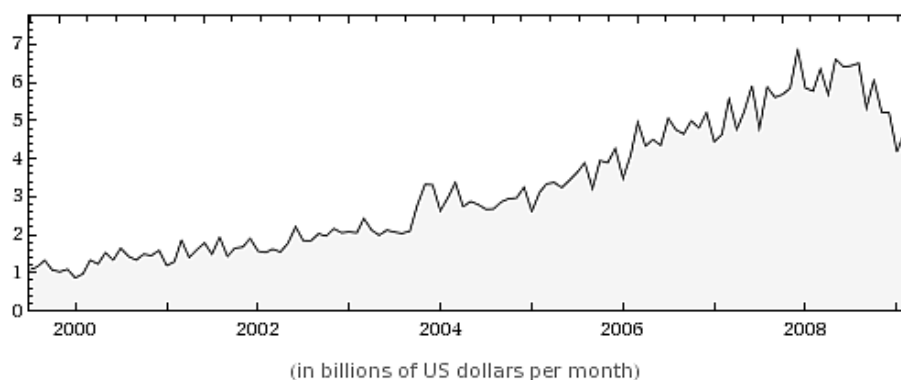
表 5-2 人民幣兌美元十年綜覽



資料來源：Wolfram|Alpha

同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嚴重惡化了。從 1999 年貿易逆差-68,677.1 百萬美元擴大到 2008 年-268,039.8 百萬美元。以月分為算，1999 年每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平均大約 1,000 百萬美元，到了 2008 年每月貿易逆差擴張到 5,000 到 6,000 左右百萬美元⁵²。

表 5-3 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十年綜覽



資料來源：Wolfram|Alpha

52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Data Dissemination Branch, Washington, D.C. 20233,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

要注意的是，中美雙方計算貿易逆差的方法不同，這樣產生計算數據有差異，從1995年起這種數據的差距快速擴大，引起雙方強烈討論，從1995年的244億美元擴大到2007年的957億美元⁵³。

中國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王東認為：「美方拿“逆差”與中國說事，藉口並不高明。而且據我推測，美方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還是逼人民幣升值，對此，那天蒂莫西先生直言不諱，說得清楚。而我的回應是，人民幣升值不僅對中國不利，對美國也不利，是兩敗俱傷。不錯，人民幣升值會減少中國對美的出口，但整體看，不可能改善美國的逆差。因為中國對美出口，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這些產業美國並無優勢，美國不從中國進口就得從別國進口。終歸是要進口，美國的逆差當然不會改善⁵⁴。」

國債是凍結流動性的一種方式，購買了國債的銀行、企業手中的現金會因此而凍結，而政府回購國債，意味著向市場上投放等量的流動性。這種方法的好處遠遠大過直接向市場內投放現金，因為後者會造成通貨膨脹。中國現在處於進退兩難之中，亦即如果從美國債券抽身，美元就會受到更厲害的貶值壓力，然而中國自己在美國的資產價值將大大縮水。另外，中國在美國的積極投入是某種形式的交易，中國以購買美國債券的形式資助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美國為此購買中國的產品。

美國國債的債權者以美國聯邦儲備系統(49.37%)以及外國債權者(27.90%)為最多。外國債權者之中，中國擁有最多的美國國債(24.07%)等價7,396億美元，

53 Yanchun Liu, Matthew M. Kemper, Dr. Patrick Magrath “Hong Kong entrepôt effects and roundtripping Chinese capital”, <http://www.faircurrency.org/pdfs/China%27s%20Global%20Trade%20Balance%20Discrepancy.pdf>

54 http://big5.ec.com.cn/gate/big5/tguide.ec.com.cn/article/wmsx/200905/878544_1.html

超過日本的 20.66%或 6,346 億美元。中日兩國幾乎等於擁有所有其他國家對美國國債的總數⁵⁵。

如此巨大的國債債權等於中國的國家財產已經密切與美國的經濟興衰掛勾了。美國總體經濟長期衰退的話，美元會繼續貶值，對中國出口產生壓力，更減少中國財產。一個窮國家如中國為何借出這麼多錢給世界第一強國美國？



55 <http://www.treas.gov/tic/mfh.txt>

肆 中國發展模式、美元陷阱與中國對美政策

中國發展模式以出口導向為主，結果中國相似於 1960 至 1980 年代的台灣，對美國出口創造非常大的貿易順差。為了維持出口優勢，中共堅持不升值人民幣。當時 1985 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強迫日本和台灣激烈升值對美元升值，但今日的中國卻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可以抵抗美國對中國提出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今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累積了到二兆美元的外匯貯存，高踞世界第一。因為堅持不升值人民幣，中國必需換一個方法處理其巨大外匯貯存，不讓豐厚的外匯產生國內通貨膨脹，因此買進美國債券成為最通順的方法。如此一來，中國已擁有美國四分之一的國債，2008 年超過日本變成美國最大的單一債權國。

買進美國債券也是因為美國債券市場夠大，可以受得了大量的需求，恰好近一兩年，美國進入金融危機，政府要大量向外借錢以支撐對國內經濟的補助。

買進美國債券也等於借錢給美國並融資美國繼續買進中國的出口品。許多人疑問，一個發展中國家為何要借如此大筆錢給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解答在於，中國外匯存款和美元國債使得中國高度與美元聯繫關係，並且使得中國敏感於美國經濟整體的穩定，可以說中美兩國的經濟相互依賴已經發展到一個明顯影響到雙邊外交政策的程度。

一方面，中國要長期地支持美元，不讓美元走弱，因為中國的美元貯存太多，軟弱的美元會減少中國自己的財力，也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外交政策不再僅以體系格局和軍事實力為唯一的考量，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對外經濟政策成為日益重要的外交因素，迫使中國持續對美國採取友好外交關係，即所謂拉近距離的外交政策。中國將要獲得強權的正當性地位，恐怕軍事力量只具有次要重要性，如何在發展模式和中美貿易逆差關係上拿捏出一個平衡，

才是當名副其實強權的最高標準。

有足夠的證據讓我們認為，中國已進入美元陷阱，亦即因為與美元靠攏太近，現在反而無法採取爭霸的外交行為。中國被美元陷阱馴服了。

中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發展模式，使得中國積累大量外匯存款，但同時加深對美元的結構性依賴，因此產生一種「陷阱」。美元軟弱，就減少中國貯存。但同時，中國也很難減少其美元債券，因為如此影響通貨膨脹。那麼，快速換歐元或日幣作為外匯存款，國際金融體系將面臨衝擊。

中國對美元的依賴有利弊，溫家寶於2008年3月18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對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十分關注，而且深感憂慮⁵⁶。」

但中國不能迅速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因為賣掉大量的美元會產生全球金融體系的驚慌。所以，中國只有一條路：逐步的多元化其外國債券。但這樣美國會提出意見。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於2009年2月下旬訪華時表示，美國希望中國能夠繼續購買美國債券，這能幫助美國經濟重回正軌，並刺激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進口。柯林頓說：「通過繼續支持美國債券，中國正在加強兩國之間的聯繫。我們將會一起同甘共苦」。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債券，對奧巴馬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的資金來源是至關重要的⁵⁷。

中國高度且結構性的依賴國際貨幣美元，一方面產生中美雙邊經濟體的密切互相滲透（美方對中國高度外資，中國對美出銷廉價產品），但由於中美兩國經濟屬於不同發展階段，中國才有辦法如此順利掛上美國市場，提供美國所需要的廉價產品。相互依賴也產生了一種弔詭的政治現象，亦即因為中國購買巨大量的

56 http://news.southcn.com/china/china05/2008lh/news/content/2008-03/18/content_4355298.htm

57 中國商報，<http://www.chinesebiznews.com/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43-cytd/4692-2009-02-23-06-29-35.html>

美國國債，因此中國在對美外交上的政治操作能力逐漸提高，但同時因為在經濟領域上中國對美元已形成結構性的依賴，卻減弱中國能夠「爭霸」的可能性。

伍 相互依賴與制衡

西方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在國際體系上，「每當一國權力增長可能影響到極（polarity）與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變化時，其他國家會單獨或聯合起來共同制止該國，針對挑戰者改變現狀（status quo）的企圖加以制衡（balancing）」（Kenneth Waltz, 1979）。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使得國際格局改變了，中國無疑被視為最有可能與美國爭霸的新興強權。

但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發生了許多令人難於在現實主義架構上解釋的現象，尤其中國究竟何時開始與美國爭霸？從軍事及政治角度看，中國仍然採取儘量迴避衝突的智慧政策。針對此問題，西方學者認為因為美國霸權力量太大，即中國不敢反對（William Wohlforth），抑或美國是個善良霸權，即對其他強權絕無傷害意圖（Stephen Walt），抑或中國正在進行「軟制衡」（soft balancing），即雖然不動武，但中國仍企圖於不確定未來內與美國爭霸（Robert Pape），抑或認為中國為經濟發展一切意識型態置之不理，採取務實外交（David Shambaugh），抑或認為因為美國不違背中國核心利益，因此中國不認為美國軍事力量成為大問題，進而願意雙方在國際政治上拉近距離。

總而言之，此章節試圖補充另外一個中國為何不與美國發生衝突的一點想法，亦即中國似乎已陷入其向外開放及「經濟對美一邊倒」的陷阱，中國發展模式以出口導為主早已經決定中國的總經濟無論好壞都緊緊擁抱著美國經濟，同甘共苦。

中國於 1994 年後改革匯率制度，讓人民幣貶值，因此使得中國能夠在短期內累積巨大外匯存款，但為了維持低度匯率優勢，又得購買大量美國國債，進而在國際政經結構上，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結構性掛勾。中國為了保護其豐厚外匯存款，產生了一種弔詭的政治現象，亦即因為中國購買巨大量的美國國債，因此中國在對美外交上的政治操作能力逐漸提高，但同時因為在經濟領域上中國對美元已形成結構性的依賴，卻減弱中國能夠「爭霸」的可能性。



第三節

中國受到各種制衡誘因卻不制衡

(驗證第二個假說)

*The ideal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y,
in terms of the other games the state is playing, cost too much.
States may cooperate as well as compete,
and even when the competi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an cooperation
their domestic aims may mitigate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 among them.*⁵⁸
—Kenneth N. Waltz

第二假說：未制衡乃取決於威脅程度和尊重利益

過去中國外交有一些危險個案，其共通情況在於，中國原有諸多個理由來制衡美國，卻不採取制衡。探討這些案件或許能顯示出中國敏感於哪些威脅和利益。

譬如，美國挑釁中國時，不僅違犯中國外交原則、損及中國基本利益，還威脅到中國的安全，在此情況，中國應有充分理由，用以牙還牙的制衡態度與美國進行嚴厲的外交對抗。但事實上，中國沒有這樣做。藉由研究這種「並未制衡」的個案，有助於瞭解後冷戰的中國如何處理國際壓力，如何定義自身的國際利益、美國的霸權和中美關係。

58 Kenneth N. Waltz.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06

壹 案件一：北京天安門事件及其國際後果（1989 June 5）

（1）案件背景

趙紫陽於1989年6月24日遭政治常委會及中央軍事委員會排擠；江澤民被選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新核心；胡啟立宣傳部被迫下台，代表政府與學生協商的閻明復，以及芮杏文皆從秘書處皆被開除；新加入秘書處的委員包含：江澤民、宋平、李瑞環、丁關根。鄧小平於1989年11月，從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退任，以完成新老交替。

天安門事件發生之際，美國盡可能避免誤會中國，也避免中國誤解美國的反應。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將軍，於1989年7月密訪北京當局，表示「為了強調美國對天安門事件感到驚訝與遺憾。」同時，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會晤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10月間，為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代表美國政府訪問中國，鄧小平請他轉告老布希總統：「結束嚴峻的中美關係要由美國採取主動⁵⁹。」斯考克羅夫於12月正式重訪北京，會見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強調：「力圖就經濟、政治及戰略各方面，促進並推動中美雙邊關係之發展，找出雙方妥協辦法⁶⁰。」

美國眾議院代表團於1990年11月首次訪問中國。美國外交部長貝克(James Baker)於1991年11月赴中國訪問，美國經貿部長弗蘭克林(Barbara Franklin)於1992年12月16至19日也赴北京。1993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在西雅圖

59 張歷歷，《當代中國外交簡史》，頁257。

60 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在美國政治事務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陪同下，於12月9至10日出訪北京，並與許多高官及鄧小平等領導人進行訪談。美國眾議員對此訪談提出批評，認為美國總統老布希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才發布與高官會談的禁令，如今卻過早廢除。

(Seattle) 舉行首腦會議。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美國總統柯林頓進行了 90 分鐘的會晤，開啟天安門事件以來首次中美最高領袖會晤。江澤民強調：「中美兩個大國是有影響的國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有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間增加信任，可以在國際上發揮積極作用。雙方都認為，中美關係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雙邊關係問題，而且應該把它放在世界範圍和未來來看。雙方要以過去更坦率的態度商討和解決存在的問題⁶¹。」此次會晤是兩國關係的一大轉折，此後雙方來往明顯恢復、日益頻繁，關係進展顯著。

中國軍事壓抑國內民主運動，立即引起國際上各民主國家的強烈抗議。這些國家祭出第一懲罰手段：停止高層政治互訪，立刻禁止對中國販售軍事設備⁶²。儘管如此，美國和其盟友也對中國釋出善意。美國不僅貸款予中國助其發展，也決定繼續與中國維持經濟合作關係，甚至賦予中國優惠國地位⁶³。

儘管被處以這些懲罰，中國也從中記取了經驗與教訓，從此竭力控制外交損害、維持現狀，以持續表達善意。中國採取兩項措施，於 1992 年 3 月簽了不擴散制度的條約⁶⁴，也參加亞太解軍會議 (Pacific disarmament conference)⁶⁵。外界認為，此二項舉動是中國邁向東亞軍事穩定與安全的重要步伐，意味中國在冷戰初期階

61 錢其琛，《為了世界更美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37-39。

62 於 6 月 5 日記者招待會上，美國總統老布希宣布暫停所有政府之間售貨及商務性的武器出口到中國。老布希也宣布停止美國及中國資深互訪，並提供中國學生延續駐美的簽證。6 月 20 日老布希宣布停止所有政府交流，並強調希望國際機構對於貸款予中國之一事，能再予三思。美國眾議院於 6 月 29 日通過一套對中國嚴厲制裁的政策。按此政策規定，美國總統老布希可對中國制裁，停止贊助中國之貿易和投資計畫，禁止向中國售出核武科技，暫停美國對中國售出衛星科技，以及禁止政府支持私人在中國投資。

63 有些觀察者認為，這項對華決策證明了美國總統老布希對北京當局的態度。美國總統老布希實施制裁，在國內不斷地受到批評，被指對華政策過度柔軟，但於 5 月 24 日他又建議無條件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使其他國家也繼續減輕或撤銷對華的各種制裁手段。日本於 1990 年 11 月 2 日宣布對中國發展重新提供貸款之計畫。德國於 1990 年 10 月 30 日宣布重啟對中國援助。

64 中國於 1992 年 3 月 10 日簽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65 1992 年 8 月 17 至 19 日，在上海舉辦前所未有的亞太軍備控制與裁軍會議。參與國包含美國、俄國、中國、印度、北韓及南韓。參與者討論朝鮮半島核武化的風險，並建議設立一個集體區域安全論壇，以有助於建立信心。

段選擇接受新現狀。

中國加入國際建制為何可視為接受現狀？這是由於從歷史來看，不接受現狀的新興軍事大國通常都退出國際建制，尤其是要求軍事監督或限制國家主權的組織⁶⁶。中國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目的，應是要消弭中國朝向極端軍事主義發展的懷疑。儘管如此，天安門事件過後，中國國際形象長期受損，在西方觀察者眼裡，中國成了一個暴力、惡意、反民主的政府，這也促發了中國威脅論的誕生。

江澤民與其新的領導團隊，成功鞏固了政權並恢復了社會秩序，但其經濟與外交政策卻受到天安門事件嚴重影響。一方面，左派批評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中國菁英被蘇聯瓦解，國亡黨亡，上下癱瘓。因此當時最迫切的政治議題，便是如何維繫領導階層。冷戰後國際體系的重整，因而也備受觀察。鄧小平於1992年南巡時，特別強調中共為了維持改革開放，必須與美國的建立良好關係。

對於中共拉近關係的訊號，美國予以正面回應。這點由美國繼續賦予中共經貿優惠國的地位，便可窺知一二。眾議院原透過一個法律，要求總統要把這個優惠國地位的給予與中共維護人權、武器售貨和貿易逆差等要求連結起來。但美國總統老布希反對眾議院的法律，認為如果對中國提出這樣的條件：「到頭來會損害中共與西方的關係，且可能助長中共壓抑民主的氣勢。」於1992年3月，中共外貿部長對美國總統老布希的否決票讚美有加，認為：「是非常明智的決定，對延續中美關係發展一定非常有幫助。」

66 但1992年9月15日於中東舉辦的軍備控制與裁軍會議，中國並未停止參與。

(2) 討論

天安門事件的由來屬於國內社會範疇，在此不多贅述。中國自定主權從未受損，其對台灣和西藏所堅持的領土完整性及主權（territorial sovereignty）也從未受到懷疑。獲悉北京當局對學生活動的暴力干涉之際，諸多西方政府慮及人權侵犯問題，立刻對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命其禁止軍購，採取所謂保持距離的政策，但從不質疑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和現狀。美國也快速恢復低層次政務官互訪習慣，似乎深信胡蘿蔔加大棒的軟硬兼施政策（carrot-and-stick policy），總比孤立政策來得奏效，更何況孤立政策說不定還會致使中美關係惡化。

對中方領導人而言，維持現狀、採取不制衡政策，有其國家因素。改革開放影響及政治改革，但由於主要政治力量反對，國內不安定氣氛讓關鍵人物處理對外政策時，更加謹慎處理，以避免擴大整體不確定性。另外，十四大即將於1992年開幕，江澤民及其團隊動用所有支援來滿足保守派，以取得其暫時的政治支持。國際關係上，德國和美國於1992年迅速取消軍購制裁，對北京當局有一定打氣作用，是年美國便對中國販售軍事用品，重新與中國確立互信。

採取不制衡的另外一套理由，則全屬於國家因素，中國外交政策受限於和平共處五原則⁶⁷、基本路線⁶⁸、中共的國防戰略思想⁶⁹、中共的國防政策⁷⁰、中共對美

67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和平共處五原則首先是由周恩來提出。當時中共針對西藏問題與印度談判時，周恩來指出：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互等互利、和平共處

68 一個中心（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四項堅持）、基本方針（二十字）

69 中共的國防戰略指導原則：一、確保國際和周邊環境之和平；二、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三、軍隊實施兩種轉變（就軍事鬥爭準備而言，由原先僅應付一般條件的局部戰爭，轉而發展現代技術，旨在打贏以高技術為條件之局部戰爭。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轉變為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轉向為科技密集型）。

70 一、鞏固國防，抵抗侵略，制止武裝顛覆，保衛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二、獨立自主，自立更生建設和鞏固國防。三、貫徹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四、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五、實行軍民結合，全民自衛。六、國防建設服從和服膺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七、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擴張。

國的基本政策⁷¹，以及更廣泛的發展方針，即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⁷²；若要打破上列原則，必定要付出黨內激烈鬥爭的高昂代價，畢竟鄧小平的影響力和群眾支撐，超越任何黨內外的權力力量。

第三，美國再度強調中美經濟關係的重要性。一方面，在政治領域內，使用經濟制裁的「大棒」為後盾，批評中國人權侵害，另一方面又以「胡蘿蔔」清楚強調經貿關係。如此作法，美國以為能加速軍事圍堵中國，同時又促使中國朝民主方向邁進。因此，對中國菁英而言，面臨美國胡蘿蔔加大棒政策，制衡根本不是適當的戰略回應。

最後一點，美國反應的程度和態度呈現幾個特點：相當自我克制、語言清晰、目標清楚。批判內容針對侵犯人權問題。懲罰手段相當不過度，並迅速取消。美國官方反對中國對民主的殘忍鎮壓。但在此同時，中國在經濟轉型和政治改革的一切努力，又深獲美國激賞，畢竟依照自由理論，既然有如此龐大的社會轉型，不可免會牽涉到民主運動和社會動盪不安的複雜過程，況且當時美國對中國民主化仍保持謹慎的樂觀。

其他因素不變下，要憑藉單一事件的影響力，使中國整體政治結構由不制衡，轉而為制衡，是相當困難的。惟有美國對中國的威脅增強，國際環境愈趨艱難，不易中國生存，中國才有可能對美採取長久制衡政策。

71 一、中共欲在後冷戰時期填補前蘇聯在亞太地區的霸權真空。二、中共要求美國尊重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謀求「遏制」與孤立中共。

72 在維持國際和平環境的基本條件下，只要對於國內「改革開放」和「共產黨一黨專政」有幫助的方法，都可以試試看。這點的結果就是：「中共外交包含了似乎難以協調的諸多外交原則立場，而所謂社會主義的內容也不斷地發生修正，這種多重道德系統的共存，或有助於平撫外交原則間的矛盾表象，讓中共可以在批扎判國際秩序與接受國際現狀的兩難中自處得宜。多種政治原則的共存，協助中共在不同場合輪流表達各種立場，而不顧及旁觀者心目中是否認為最些原則彼此之不一致，致西方學者力圖釐清中共外交政策優先次序的努力，可能徒勞無功。」參見於：石之瑜，〈中共對外關係〉，《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頁10-48。

貳 案件二：美國誤炸中共駐南使館（1999 May 7）

（1）案件背景

中美關係緊張，雙方關注議題主要在於人權爭議及貿易逆差。美國禁止向中國售賣衛星技術、且宣布在東亞（日本、韓國等）建立反戰區導彈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美國懷疑中國間諜從美國核武研究室偷竊核武技術的相關秘密。美國誤炸中國駐南大使館以前，中國反對北約對南斯拉夫軍隊在科索沃開戰。

美國誤炸中國駐南大使館之事件，於中國引起強烈抗議，官方組織了大規模的大眾游行，5月9日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也發表電視演說，表明：「中國政府將堅持不移地舉行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5月10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提出道歉：「我已向江澤民主席和中國人民表示了道歉。我要再次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說，我對此表示道歉和遺憾。同時，我要重申，我們將致力加強美中兩國之間的關係。」

中國官方於同日緊急約見美國駐華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和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行為」，並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表示中國反對以美國為主的北約在南斯拉夫採取「軍艦外交」（absolute gunboat diplomacy）。

(2) 中國的要求

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向美國駐華大使尚慕杰提出三合要求：一、公開、正式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中國受害者家屬道歉；二、對北約用導彈西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之事件，進行全面而徹底的調查；三、迅速公布調查的詳細結果；四、嚴懲肇事者。

中國宣布暫止中美外交關係中的一些項目，包含軍事交流、裁軍對話以及人權對話。中國立刻派專機前往貝爾格萊德（Belgrad）接回中國有關人員，並聲明中國政府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美國 The Financial Times 5 月 12 日報導，一位江澤民的資深顧問表示，希望看到「美國在軍事、貿易和外交議題上做出明顯讓步（significant concessions），以確保中美關係回溫」。

張歷歷認為，美國故意炸掉中國大使館，理由有四：一是打擊中國伸張正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以大使館作為特定轟炸目標，來威嚇中國政府；二是貶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以利美國頂著「我連你大使館也敢炸，你又能怎樣？」的旗幟，四處招搖；三是擾亂中國對外開放的外交方針和基本國策；四是破壞中國的國際環境，美國近年來極力推行單極體系、獨霸世界的戰略，想在破壞世界和平的同時，也破壞中國的國際發展環境。他也提出深層理由，認為：「美國越來越迷信自己的力量，迷信於美國的軍事技術和它的唯一超級大國的霸權威力，並且肆意踐踏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法，繞開聯合國倚靠在冷戰期間建立起來的軍事聯盟為推行強權政治的工具⁷³。」

當時，中國反美聲浪、愛國主義四起，於 1999 年 10 月又逢中華人民共和國

73 張歷歷，《當代中國外交簡史》，頁 272—273。

成立 50 周年，這都醞釀了普遍反美的氣氛。中共軍隊高度警惕，為鞏固政治領導的穩定「軍威振、國力壯」的心態，實不難產生動武的內部誘因。中國若伺機制衡美國，此背景似乎再適當不過。以往保持距離方向發展，至少暫時有高度可能性。

官方之所以保持理性，不僅是基於雙方重要經濟利益之考量，更由於中國當時正致力申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⁷⁴。況且自從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更加著重多邊外交，此轉變可說大有助於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制衡心態。

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反應受某些體系限制，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柯林頓政府極力表明對該事件的責任和遺憾，並承諾將徹底釐清來龍去脈，不少程度上讓步於中國。美國總統柯林頓向中國承認該事件是悲慘的錯誤（a tragic mistake）。在美國前副國務卿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的領導下，美國外交團隊於 1999 年 6 月 16-17 日赴美提出一個官方說明。即使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拒絕美國的說法，要求美國人嚴厲懲罰嫌犯，但形式上應承認美國的努力和誠意。事件本身仍懸而未結。

每年五六份美國決定是否繼續給予中國優惠國的地位⁷⁵。事件發生有一個月內，於 1999 年 6 月 3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告知要續給中國新名稱正常貿易關係（Normal Trade Relation, or NTR）地位一年。柯林頓附加說明，表示希望能與中國達成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理由是，若不這麼做，反而只會鼓勵那些反開放、反自由的中國人士⁷⁶。

1999 年 11 月 15 日，朱鎔基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74 朱鎔基於 1999 年 4 月赴美協商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的問題。因尚未獲得解決中方表示失望。觀察者認為柯林頓拒絕協議的理由在於眾議院反中共聲浪甚大，柯林頓無法提出中美貿易協議的和諧方案。但雙方達意致力於年底前處理好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的問題。

75 美國柯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更名為正常貿易關係(Normal Trade Relation status)。

76 該此同時，一名中國人在美國核武研究室涉嫌偷竊秘密資料，使中美緊張關係雪上加霜。受到國內壓力使然，美國總統改變其原先對華的柔性政策。

Barshefsky) 達成雙邊條約，以處理中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事宜。《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決定》於 2001 年 11 月 10 日獲得通過。自 1986 以來，中美進行超過 13 年的入會談判。中美雙方期望透過參加世貿組，解決逆差貿易等棘手的各類國際貿易問題。

(3) 案件討論

此事件有兩個不同之處，第一美國清楚被認定為衝擊者，第二中國更依賴開放經濟。

中共駐南使館造成的緊張關係，並未足以影響中國政策循序的重整。儘管北京當局視誤炸事件視為一種侮辱中國的野蠻行為，但下列因素有助於打通險峻的外交渠道：第一，誤炸事件發生於海外遠地，並非在中國聖地上；第二，戰爭行為針對第三者（南斯拉夫）；第三，美國受北約委託，並非單獨行動；第四，事件發生後，美國立刻以低調態度，透過外交渠道盡量闡明軍事情報部門誤判之原因和過程。雖然中方拒絕誤炸事件的「意外說」⁷⁷，但由於正要申請入會國際貿易組織（WTO），不願因過度反應而衍生入會困難。台灣政府也提出類似說法⁷⁸。

(4) 是經濟相互依賴壓制了中國的惡性反應？

研究中美相互依賴關係的學者，大部分都認為，相互依賴的確有助於減少高

77 事後唐家璇認為「中國注意到、也重視美國在轟炸事件後，為恢復中美關係已經做的、以及將要做的努力」 [http://chinastar.muzi.com/cc/fanti/25071,19931.shtml?](http://chinastar.muzi.com/cc/fanti/25071,19931.shtml?q=36876&cc=29241&a=on)

[q=36876&cc=29241&a=on](http://chinastar.muzi.com/cc/fanti/25071,19931.shtml?q=36876&cc=29241&a=on)

78 中華民國於 2002 年國防報告書對誤炸中共駐南使館的看法是：「近期以來，中共與美國因人權、貿易、政治獻金、科技間諜、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及北約「誤炸中共駐南使館」事件，使雙方關係陷入低潮，所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受到考驗。不過，中共基於整體戰略考量及國內經濟發展需要，認為與美國維持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較符合其利益。」

度軍事衝突的可能性⁷⁹，但經濟相互依賴本身並不適於解釋衝突的因果關係。儘管貿易關係研究都強調相互依賴會提升衝突成本的概念，這點雖站得住腳，但由此我得到的教訓極為矛盾：所有參與者相互依賴，一方面能加強懲罰手段，另一方面又能減弱防守能力。另外一個結論是，雙方關係雖因相互依賴而更形重要，但不因此而較易預測。

就本論文第二假說而言，關鍵在於雙方高度相互依賴的情況，以及其不對稱政策偏好。中國需長期面對負面環境，若美國顯露敵意，嚴重侵犯中國的國家利益，如干涉領土主權，或直接支持台灣獨立等，中國才會大幅更改其大戰略，採取類似反現狀態度。



79 在理論部分將仔細討論相互依賴理論與中國制衡的問題。

參 案件三：美國間諜飛機事件（2001 April 1）

（1）案件背景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Navy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aircraft，EP-3 Aries II）在中國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海域上空，對中國進行偵察時，撞毀對其進行跟蹤監視的中方殲八飛機一架，致使飛行員王偉罹難。兩架飛機碰撞的真相，目前仍未能釐清。美國間諜飛機在受損後迅速落地，中國軍隊旋即登機並扣留24名美國軍隊隊員。2001年4月2日，美國總統布希要求中方迅速釋放隊員、歸還飛機，並重申該架飛機屬美國領土，警告中方切勿登機。

中國官方拒絕美方的說法，堅持要求美國解釋三項疑點：一、間諜飛機為何在空中突然改變方向，而與中國的戰鬥機碰撞；二、間諜飛機為何侵略中國領海；三、間諜飛機為何在尚未取得允許前，擅自降落於中國土地。

截至4月3日，中方拒絕美國外交人士與被扣留的美國軍人聯絡，且考慮起訴駕駛間諜飛機的軍人。4月3日，美國外交部長鮑爾表示遺憾，接著美國總統布希於4月6日也發表了總統府的遺憾書。中國外交部的回應是：美國必須承認全部的責任並向中國人民道歉，而且美國必須採取誠心且有效的手段以避免重蹈覆轍。

4月11日中美達成共識，中國於12日釋放美國隊員；又過了三個月，直到7月3日，才將間諜飛機歸還美國政府。中國同時向美國政府提出高達一百萬美元的帳單，作為中國照顧美國團隊及飛機之補償。碰撞事件過後三個禮拜，美方不巧於4月24日居然決定對台售貨武器，似乎火上澆油。

(2) 討論

類似於上述誤炸南使館事件，中國官方迅速指控美國為攻擊者。然而，此個案亦為中國制衡美國的方便藉口，則不然。西方學者發現，這次中國官方並未強烈鼓吹愛國主義活動，官方媒體亦相當低調，這種危機處理態度是否比上次進步？但也有人認為中國態度產生不良後果⁸⁰。中方延遲了間諜飛機歸還時間，外交上被理解為對美國的懲罰手段，美國則以軍售給台灣作為回應⁸¹。以牙還牙⁸²。案件完畢。

中國的外交決策者在回應美國的不公平對待時，表露出明顯自我克制：簡單明瞭給予懲罰，適當提出批評警告，同時又不改基本立場，有助於互相瞭解利益界限，達成務實外交。雙方共同定義、維持、代表現狀。但個案無法推翻大戰略。

美國受國際體系影響，對外發動軍事行動，但中國為了整體發展的考量，秉持「責任大國」的形象，實行迴避制衡的政策，有意識不因外交個案，而使自己掉入制衡陷阱。我可說，就國際體系而言，美國霸權確實對中國造成某程度威脅，但中國卻展露智慧，為了自身安全、發展的考量而抵抗誘因。換句話說，目前國際體系出現了一種特殊情況，亦即「不必制衡即能崛起」。這種特徵難以證明，畢竟證明的邏輯是以「有」證明「無」的弔詭方式來進行。本論文的關鍵在於，中國的未制衡行為，與沒有生存威脅的國際體系環境是有所關連的。

80 Dennis C. Blair, David V. Bonfili 在其論文總論認為「中國官方反應過遲並損害關係的，尤其因為官方在第一時間之際，對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來電並沒回應。當中方了解事件的重要性後則改變立場，並接受美國的道歉。」見於“The April 2001 EP-3 Incident: The U.S. Point of View.” in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Swaine et al. ed.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p. 377-391.

81 美國總統布希提供台灣價位 40 億美元（4 billion US\$）武器禮盒，是 1992 年以來價值最高、武器設備最完整的軍售案，包含四艘能擊沉導航飛彈的紀德級驅逐艦、十數架 P-3 獵戶座反潛機，以及八艘北京視為攻擊性武器的柴油潛艦，另外還有數架掃雷直昇機、兩棲突擊載具、潛射魚雷及水面艦艇發射魚雷。（http://www.pbs.org/newshour/bb/eastasia/jan-june01/Taiwan_arms.html）

82 間諜飛機事件及給台灣軍售的因果關係，並非基於官方立場。

肆 案件四：因台灣而引起的對美國宣示批評

(一) 美國宣布軍售予台灣 150 架 F-16 戰鬥機 (1992 年)

(二) 李登輝訪問美國 (1995-1996 年)

(1) 美國宣布售予台灣戰鬥機的個案背景

1992 年 9 月 2 日美國宣布對台出售 150 架 F-16A 型和 F-16B 型戰鬥機，價格 60 億美元，之後更進一步宣布出售 12 架 SH-2F 直升機，總價 1 億 6 千 1 百萬美元。此舉意味著，《八一七公報》之軍售限制實際上已取消。《八一七公報》係美國於 1982 年所簽訂，明文指出軍售限制，明令未來十年之軍售「質與量上皆不可超過近年之軍售」。美國願意逐漸減少對台提供軍事支援，但也提出了「權力平衡」的概念作為辯駁，認為俄國賣給中共 27 架高科技戰鬥機 Su 27，已嚴重改變台灣海峽的軍事均勢，美國基於《與台灣關係法》不得不建議兩岸維持現狀。

(2) 中共反應

中國以往常抱怨美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如今美國對台出售武器，不意外也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1992 年 9 月 3 日，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向駐華美國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提出：「美國的決定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也嚴重干涉了中國和平統一大業⁸³。」

由於在貿易領域較具優勢，中國試圖以經濟懲罰來回應美國軍事威脅。除了較具可信性外，經濟懲罰手段也比軍事行動更有可行性，再者，貿易戰也是較有

83 <http://www.fmprc.gov.cn/eng/topics/3713/3715/t19064.htm>

利雙方的解決方案。

因此，中國於1992年9月10日揚言禁止美國進口小麥。多年來，中國均為美國小麥的最大買家，中國占美國小麥市場的10%。此舉引起美國反抗。美方要求中國解除美國進入中國市場的貿易堡壘，否則美國將懲以39億美元處分。中國的回應是，美方若設貿易障礙，中國罰金提高為40億美元。雙方於9月14至16日進行貿易談判，並達成共識，不採取貿易障礙或貿易懲罰手段。9月29日，美國總統老布希否決了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加以掛勾此一項法案。

但問題仍未解決，1993年5月28日，老布希宣布延長中國1993年最惠國待遇，國會則施壓，對此加上人權條件，以決定最惠國待遇是否延長至1994年度，這也是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的首次正式結合。然而，國會所通過的此議案，到了9月時仍為老布希否決。

(3) 李登輝訪問美國的個案背景

1994年4月，李登輝原有意停留夏威夷，但不滿歡迎禮儀等級而拒下飛機。9月7日，美國安全委員會及眾議院發佈一則有關中美關係的政策建議報告，旨在減輕台灣官員到美國旅行的手續規定。

1995年初，在眾議院得多數的共和黨，批評美國總統柯林頓對台政策，逼迫他發放簽證予李登輝，使其得以於1995年6月到美國拜訪母校。1995年5月，美國眾議院、參議院都通過了一項沒有約束力的決議，建議美國總統柯林頓為李登輝發放簽證。眼見美國政府正式決定核發李登輝簽證，中共立刻強烈提出抗議。

中國與美國截斷關係，撤回駐美大使一個月，稱李登輝為分裂主義者。中國

於6月在中南海進行軍事演習，7月底在80至90海里範圍內發射三枚飛彈，以示抗議。

1995年7月美國前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在汶萊會見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克里斯多福轉呈美國總統柯林頓的信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接著，美國重申邀請江澤民於10月25日赴美訪問。美方以為這些舉動或有助於遏止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到了11月，中國竟再度進行軍事演習，並啟動一個非正式的解放台灣安全制度。

1996年1月，美國軍事專家獲悉中國威脅美國，以核武妨害台灣宣布獨立。美方迅速召開高官軍事專家的危機會議，並預備於3月8日與中方劉華秋協商。於原訂協商日的前三天，中國宣布台灣海峽有25至30海哩寬的範圍屬其特殊軍用，禁止任何航船及飛機進入。

與劉華秋協商當天，中方明確指出中國軍方決不登陸台灣⁸⁴。然而，美國仍考慮到所有可能性及防守手段。儘管中國確保不攻擊台灣，但中國於3月8日當天開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文攻武嚇，目的便是影響3月20日台灣首次的總統民選。中共的軍事演習分為三階段，3月8日至15日、12日至20日及18日至25日。總統選舉結束後，美國下令撤回派遣往台灣海峽進行監督的航空母艦。

(4) 間接外交後果

中俄在「策略性關係」架構下，在江澤民與俄國總統葉利欽之間設立熱線。

84 美國與中國在2月交換政府間意見，美國解釋其危機處理方案，並於3月安排一場中美軍事官方危機處理討論會，安排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萊克(Anthony Lake)與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會見交換意見。

一方面，由於與美關係惡化，江澤民備受國內壓力，俄國總統葉利欽則感於6月份選舉壓力，希望做一些有象徵性的外交。但中俄策略性關係並未動用世界格局，只是將一些非正式且看不見的外交以書面化呈現，不足以解除中俄之間關係既有的矛盾。在總共13份的協議中，只有一些有助於鞏固中俄關係。

於1996年5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也表明不願就中共是否將核武科技賣給巴基斯坦一事，而與中共爭執不下。美國放棄對中國施以懲罰手段。

一個月後，雙邊於6月17日達成避免貿易制裁的後續協議。

探討中國威脅的論述，往往忽略一個關鍵：中共對台政策一清二楚⁸⁵，利益界定無任何存疑空間，三方（中美台）政策循序不僅一目了然，中美也經常就這些利益與立場進行溝通。謝淑麗也認為台海危機會讓雙方認清彼此立場的底線⁸⁶。雙方其實很難因政策不確定性，而被捲入海峽兩岸的衝突。美國對台有防守態度，可行的外交手段比中共來得多樣。相較於美國，中共對台的利益顯得敏感，外交手段也因而受限，這點雙方也清清楚楚。利益排序的不對稱，頗有助於迴避軍事衝突。

台灣若往獨立的方向邁進，無論或實或虛，均會立刻遭受大陸的嚴苛反對，這點不言而喻。美國讓李登輝辦簽證，會引起中共的抗議，也是料想得到的結果，儘管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因面臨強而有力的內部政治壓力，逼不得已才走了這一步。對中共而言，這是民主制度對外交工作造成干擾的案例。

美國發放李登輝簽證後，雖面臨中共抗議，仍不服從中共的意願，乃因怕

85 中方對台政策，即反台獨政策，早已成為「一個中國」架構上，中國外交政策不可更改的部分，因此中方在此案子裡頭無外交左右空間。美國卻有讓步的空間，此現象稱為不對稱的政策偏好。一般認為有助於找到妥協方案。

86 謝淑麗，2008，《脆弱的強權》，台北：遠流，頁235。

「丟臉」，這在外交上又形成一種信賴度（credibility）的問題⁸⁷。美國若不嚴格履行其於「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明定的承諾，美國的信賴度勢必會蒙受嚴重減損⁸⁸，甚至會給予中共決策者「美國柔軟」的錯誤訊息。

從此角度而論，美國派遣兩艘核子動力航空母艦⁸⁹赴台灣海峽，雖部分反映出美國實際的擔憂，但更重要之處在於，此舉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明示負責作用」，對台灣及其他美國的亞洲盟友，致上美國的關心和誠意。

有趣的是，對於自己國內的政治市場，中共也有類似的信任困惑。由於經貿制裁的媒體效能（media-effective）不彰，激烈抗議仍被視為唯一的適當外交手段，因此中國領導菁英選擇了極誇張的抗議手段：軍事演習。

值得注意的是，雙方瞭解對方外交手段的宣示功能，也努力避免負面後果。不過，由於雙方屈服於自己的權力來源，美國獲得國際信任，中共則獲得國家信任。此案件的政治性意義，遠勝於軍事意義。宣傳了彼此的利益後，雙方透過外交渠道解決具體的問題。不久後，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共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改變了中共安全觀念，對外放棄威嚇手段⁹⁰。

87 David Ross 在其著名的分析中提到類似的想法，可參考 David Ross. 2000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 87-123

88 美國優勢不僅建立在軍事硬體的威力上，而是更建立在信任上，能夠以非軍事壓力說服其他國家接受美國意願，這種軟權力的產生，主要在於美國能夠透過長期合作的記錄，呈現其信任度。

89 其中一艘未進入台灣海峽。

90 中共於 2005 年 3 月 14 日宣布的「反分裂國家法」，事實上進一步降低了中共對台灣突襲的機率，也是第一次針對中共使用武力提出清楚的條件。對台灣海峽的穩定有一定的幫助。

伍 案件五：針對美國霸權的硬批評付之闕如

(1) 案件背景

中國在許多場合上並未強烈批評美國霸權的外交作為，此可視為缺乏硬批評的一種現象。

鄧小平提出所謂「韜光養晦」政策是指，中國應對某些國際事態保持「超脫」，才能成功實現「中國崛起」的政治工程。1989年南斯拉夫政變、波海三國獨立、蘇聯八一九政變、伊拉克侵科威特事件發生時，中國領導人秉持低調做法，就是所謂的「超脫」⁹¹。對於美國的霸權外交，如兩次伊拉克戰爭（1991、2003）、對南斯拉夫轟炸攻擊（1999）、侵占阿富汗（2001），以及軍事預算的大幅增長（2001-2008），中國皆維持了「超脫」態度。

後冷戰初期，中國官方仍忙於瞭解新狀況，同時又受國家民主運動和經濟問題的嚴重挑戰，對外選擇謹慎觀察的被動態度。當時的政治菁英正逢權力轉移的過程，新領導團隊的國家外力量仍薄弱。經濟改革是唯一獲政府肯定的改革，政治改革則被否決了。國際各國皆質疑，中國將來是否會支持美國霸權單一結構的安排，或者變為反現狀主義者。以中國侵犯人權和反對政治改革來看，「中國威脅論」確實直接反映了此擔憂。

中國內政危機以及經濟發展脆弱性，部分可解釋為何中國在後冷戰初期，保持了謹慎被動的態度。要繼續推動經濟改革，維持現狀是唯一道路。發展與美關係更成為其首要外交任務。聯合國安理會上，中國甚少投否決票⁹²。迴避制衡於是成為避免嶄露頭角的基本外交定調。

91 參考 張鄧及，《建構中國 - 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

92 戴穎、邢悅，〈中國未在聯合國對美國軟制衡〉，《國際政治科學》，11期，2007。

除了缺乏制衡，中國於冷戰後的對美關係，也缺乏嚴厲批評的色彩。對於許多懷疑中國意圖和長期戰略的人士而言，這點恐怕相當難以理解。



第四節

中國受到不同層次的制衡侷限

(驗證第一個假說)

第一個假說： 未制衡取決於國家層次，但彰顯於區域層次。

在上一部分，我解釋了中國為何在過去 30 年內，即便身處不利的外交個案，也判定其國家利益受損，面臨諸多制衡之刺激，卻始終未制衡美國，反而是追求一套維持現狀的政策。

實際上，這些制衡誘因皆為個案，個案之間沒有政治連結，也沒有對中國崛起形成有系統的阻礙。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環境，雖然美國對中國保持不完全放心的態度，起碼對中國不構成嚴重的發展障礙。

無論好壞，中美關係如何演變起伏，在經濟安全成為相互依賴的基石上，這些個案皆未侵犯中國的根本利益和政策循序，因此有助於減低外交不確定性，尤其對台灣，中共終究未失去吞併的最終期盼。在中共駐南使館誤炸事件中，中共國家利益並未受損，間諜飛機的事件似乎也只侵害了中國的象徵性利益，長期影響不足為道。

由這些個案研究可知，制衡似乎不是容易發生的機制。只有在充斥強烈敵意的國際環境中，才可能採取制衡。權力分配本身不足構成充分條件。更進一步說，制衡機制的充分條件，除了「權力分配」和「敵意威脅」這兩因素之外，還要補充一個「尊重利益」，由此三條件構成的一套獨立變數才可以視為充分條件。亦即，當其中一個條件未被滿足時，便不會啟動制衡。如果還加上施韋勒整理出的

國內制衡失敗的因素加以共同參考，便能對制衡機制做出更細膩的描述和預測。

「尊重利益」作為一個有用的理論補充，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是，在今日國際關係上，權力分配不容易衡量，尤其是因為權力概念多元化了，真正提升國家影響力的因素，恐怕不僅有軍事權力而已。另外，權力大小不再能如同以前那樣直接與威脅聯結起來。一方面是因為當代的威脅意涵改變了，另外以經濟和軟權力為主要內涵的權力其實起著諸多正面的制度作用，不完全可以等同威脅。既然權力大小和分配不完全構成威脅，其他國家為何要以制衡回應？

二是，威脅除了軍事方面外，更是一個決策團體的主觀概念，它牽涉到很複雜的個案過程以呈現出對方是否有誠信抑或居心叵測。今日的中國，諸多學者似乎無法清楚描述其為現狀國家或反對現狀國家，對中國崛起加以類型化的困難事實上在理論上導致學者難於使用威脅概念描述中國所受到的制衡誘因。

三是，尊重利益的好處是，此概念簡單易明。利益又通常由政府部門清楚宣示，因此也具備客觀面向。當某些核心利益透過國內立法程序獲得了法律效力的話，利益更被提升為國家法，其他國家違背該利益的後果將不言而喻。

中國外交最令人訝異的是，儘管美國對中國或明或暗採取了圍堵政策，中國仍致力發展中美關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對於中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只有美國才能賦予中國夢寐以求的正當性。

美國霸權是國際體系最具影響力、最長久也最有體系根源的國家，其在結構中佔據主要位置，不僅能決定對自己有利益的內容，對於分享體系利益的他國更有舉足輕重的否決權。身為國際體系「保鏢」的美國，是強國中的強國，這也是中國不制衡美國的重要因素。

壹 體系層次中國實力（軍事能力、軟權力、策略優勢）的侷限

根據最保守的軍事智庫之一位於英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的資料，中國國防預算從 2002 年 515 億美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1,218.7 億美元，軍事預算對國內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DP)的比例分別為 2002 年的 4%和 2006 年的 1.3%。下以圖表比較中美等重要國家的軍事預算，作為參考。

表 6-1 主要國家軍事預算比較簡表

	百萬美元			軍事預算/人			GDP 百分比		
	2002	2004	2006	2002	2004	2006	2002	2004	2006
中國	51,159	87,150	121,872	39	20	27	4.0	1.4	1.3
美國	348,555	455,908	535,943	1,211	1,556	1,796	3.3	3.9	4.0
英國	38,140	50,120	55,444	636	832	915	2.4	2.3	2.3
日本	39,200	45,152	41,144	308	355	323	1.0	1.0	0.9
德國	29,403	38,263	37,775	357	464	458	1.4	1.4	1.3

資料來源：IISS

有關中國國防預算，各個研究部門和政府官方的看法不同，譬如中共官方的數字是 2006 年的軍事預算為 38.49 百萬美元，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認為大約是 52.19 百萬美元，美國國防部則認為在大約 86 - 124 百萬美元之間。其他研究部門計算其他數字。

但無論正確的數字如何，中國整體缺乏把兵力投射於整個體系層次的能力，使其擴張主義或反現狀意圖受到侷限⁹³。專家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是複雜而矛盾的⁹⁴。

93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8。

94 有關中國 軍事現代化，可參見 Michael D. Swaine, "China Regional Military Posture", in "Power Shift", ed. David Shambaugh;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首先，專家探索了中國軍事硬體的實際規模，但根據沃爾弗斯的主張⁹⁵，人們在詮釋這些研究結果時，容易將「能力的發展趨勢」與「現有的實際能力」混為一談（"conflate power trends with existing relationships"）。譬如看到中國軍事預算的百分比增長時，非軍事專家便尤其容易感到害怕。中國官方對軍事議題又往往緘默其口，堅持維繫不確定性與不透明性。這也是為何，中國預算的透明性經常受懷疑⁹⁶。

其次，有關中國軍事能力的討論，不少也牽扯到菁英意圖，但不見得有利於找到真相。純粹從軍事硬體角度而看，中國軍事能力幾乎等於英國⁹⁷，但由於中國的軍事服務人口規模比英國大 20 倍，保護的領土比英國大 40 倍，因此其實不足以對世界體系穩定構成威脅。然而一旦質疑菁英意圖，人們便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勢必要推翻美國單極體系，就好像軍事現代化必然深具敵意，而非正常發展之結果。

第三，文化、意識型態及政治制度上的距離，使軍事議題更加複雜。冷戰後的西方專家，似乎基於歷史實證以及道德義務，厭棄所有非民主政體。人們有關中國的理論探討，會受這種世界觀的干擾。

除此之外，中國也缺乏軟權力。中國之所以擁有「事實正當性」，只因取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以及參與數百個國際建制。但中國缺乏制度魅力、意識型

and prospects"; David Shambaugh, 2005.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making steady and surprising progress", in "Strategic Asia 2005-06: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Ashley J. Tellis [et al.]; Keith Crane... [et al.],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Ng, Ka-po, "Interpreting China's Military power doctrine makes readiness"; Godwin, Paul h. B. 1997. "Uncertainty, Insecurity and China's Military Power," *Current History* 96(611).

95 可參見 William Wohlforth.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5-41.

96 可參見 Rawski, CER, 12 (2001): 347-354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http://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

97 IISS

態信用和合作經驗，因此採取任一外交行動時，都必須重新證明其態度是正確的。

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印象，往往都是些慘不忍睹的事情，如毛時代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後來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存在至今的人權鎮壓。

中國缺少軍事能力和軟權力，外交手段備受限制。除非為了經濟利益，其他國家鮮少與中國展開外交合作。



貳 中國建構和改變其區域環境

近幾年以來，中國似乎一改其被動、不願意參與國際社會的態度，逐漸邁向更有自信、更有主見的階段。

對制衡理論深信不疑的學者，均認為中國除了制衡，別無他法。亦即，他們相信中國遲早會不惜後果制衡美國。但他們之所以作此主張，乃因為他們苦找不到證據，只能把中美衝突的不可避免性想像於未來。

某些情況下，這些擔憂起源於權力邏輯的論述、中共的霸權意圖、現實主義悲觀世界觀⁹⁸，但大部分可歸咎於政治成見。

(1) 上合組

擔心中國區域行為會否以對抗美國為最後目標的研究，都是這樣停筆的：沒錯，上合組（上海合作組織）顯然被中國視為排美（或「去美國」）的區域安全工具，不可能真的帶來安全。確實，中國長期目標無疑是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東亞。但有個關鍵卻飽受忽略：條條大道通羅馬。這裡共有三條大道，第一條是制衡，第二條是等待美國自然衰退，第三條則是建構所謂替代性的安全建制，以補充或更替美國在東亞的安全功能。然而，第一條，不見得真能到達羅馬，也有可能直達地獄；第二條若繞得太久，這輩子應該看不到結果；第三條，替代美國安全角色的道路，看在中共領導人眼裡，則成了中庸之道。如此構想也反映在上合

98 若只進行體系結構分析，基於理論精簡的考量，只重視極、權力分配、軍事能力等因素等層次因素，便可能誤以為政府直接將體系誘因轉換成外交行為，或期望政府將體系誘因視為最理性而不可避免的政策趨勢。許多學者斷然認為，體系結構誘因與國家戰略及意圖之間，存在一種直接對應關係，卻忽略了各國內部提倡外交政策的制度局限性。應該說，結構誘因必須先透過區域和國家內部兩層的過濾，才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回應。在輸出的過程中，政策行為也會先滲透到國內外外交機構及區域結構，才會對體系層次發生影響。同樣政策在不同層次上，可能使政府的反應失控。

組的建立。

對於上合組的構想，中俄似乎同床異夢。「中國著重於上合組的政治與經濟面相，目的是建立一個安全區域、推廣上合組模式的多邊主義，美國顯然被排除在外。反之，俄國之所以發展上合組，則是希望能成立一個遵守莫斯科議程的安全及軍事聯盟，以面對俄國邊界的軍事和政治威脅⁹⁹。」

即便雙方顯然均致力於加強區域內基本建設、推廣長期中俄合作，然而以上提到的中俄差異，其實也反映出各自戰略的不同。撥開表面，可看到一個微妙的中亞雙極化結構的輪廓，為若干勢力薄弱的中亞國家，提供長期的安全替代方案。提供安全替代方案以避免直接制衡的噩夢成真，不僅能避免直接制衡，更是避免被制衡的智策。中國採取的方法，似乎是以經濟合作作為誘餌，拉近與經濟落後的中亞國家的關係。上合組並非以直接制衡美國為目標，美國也不認為上合組對它構成威脅。美國對於上合組的存在置若罔聞，就是最佳證明¹⁰⁰。

作為中國「新安全計劃」的主要實施單位，上合組強調合作互利、信任建設、不結盟的理念¹⁰¹。因此，上合組才與中國的不制衡外交政策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99 Zdzisław Śliwa, Yulin O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ecurity or Insecurity for central Asia?", *Kwartalnik Bellona*, Nr 2, 2008.

100在阿富汗戰爭及反恐戰爭之際，美國試圖預先與中亞各國簽雙邊條約，以處理軍事基地的租約（leasing of bases）及低空飛行權（flyover rights），此過程中，美國沒有事先與上合組秘書處聯絡。自從1918-1922年的俄國內戰以來，俄國第一次默認美國在中亞駐軍、動軍。美國於2001年後快速在漢納巴德（烏茲別克斯坦）及馬納斯（吉爾吉斯斯坦）建蓋兩座空軍軍地，此舉又被評為上合組的政治弱勢。儘管中國反對美國長期在中亞，但中國並沒有因此增加其在中亞的軍事存在，作為制衡美國的手段。其實，中國解放軍（PLA）提出在吉爾吉斯斯坦設新軍地的建議，但遭中國外交部拒絕。

101 Marc Lanteigne,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ume 79, No 4, Winter 2006-2007.

參 在東亞的中美關係

無論是上合組或是東協加中國，其實都往經濟合作、安全區域的方向邁進，若從理論角度看，中國似乎有意採取區域制衡的翻版，採行不同區域之間的制衡，而非區域內部的制衡。這種既非結盟又非區域霸權的行為，非常值得玩味。

如上所述，近幾年來中國對其區域環境的影響力大幅提升，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上合組的建立。除此之外，中國在其他既有區域組織的影響力也舉足輕重，尤其是「東協加中國」、「東協區域論壇」以及「六方會談」等建制。

特別要注意的是，中國雖欲在東亞建立一個替代權力中心，但鄰國是否選擇參與中國的建制，或與美國建立雙邊安全關係，中國並不予以干預。不可否認，中國外交在這點上很有彈性，認知到實力薄弱鄰國的戰略困境，尤其也考量到，這些鄰國往往不願在中美間作一個非此即彼的戰略選擇。對東亞和中亞國家而言，雙重安全（中與美）比單邊主義（中或美）更有安全保障。相較於冷戰時代美蘇互斥的安全結構，目前中美的外交互動已摒棄以往態度，相互襯托特色。與若干鄰國建立雙重安全架構，也有助於中美相互學習、互信。又因鄰國試圖平衡中美各方的利益，他們或明或暗扮演了另一種微妙的「制衡角色」，使得中美區域政策日益相互依賴、共同聚集、減少矛盾。這點值得日後觀察。

這種矛盾行為（在區域內排美、與美國合作、建立新安全建構），也令國際學者深感頭痛。這種國際行為會產生一慣性的不確定狀態，確實有所創新¹⁰²；中國領導人也深知，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缺乏廣泛吸引能力，不僅使人難以放

102 蕭全政對此矛盾的評論是：「中共卻以中華文明為基礎，主張各國文明『和而不同』的多元化，而且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人權觀，故應透過聯合國和大國外交的多邊主義，及『新安全觀』式的獨立自主與互信互利的合作方式，以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並且發展公正、合理的國際政經新秩序。中共的這些主張，都是以顛覆美國霸權所主導的單邊主義和全球主義為目的；她其實是以『反霸』為名，而建構其『爭霸』戰略。」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第22期，頁24。

心信任中國，也可能導致美國制衡中國，因此中國也絞盡腦汁，希望能找出對策，以降低美國對華的制衡誘因，避免遭受美國制衡的危險。策略性合作便成為最佳選擇。

與其直接對抗，中國期望藉由建構新經濟和策略建制，為亞洲國家提供長期替代美國的制度選擇。這個構想十分聰敏，一來符合中國宏觀發展戰略，二來有助於獲得其他國家的制度信任。一旦中國在具體、技術方面的政治問題表現出善良態度，按照溢出理論，不僅有助於降低整個區域的緊張氣氛、減少美國的軍事困惑，也能增加亞洲各國與中國合作的意願，並且加深中國合制度性現狀的國際認知。中國不能強硬地反對美國，反而要視美國為主要說服對像，以爭取維護現狀的地位。只要美國買了「中國是現狀主義者」的帳，中國就能明哲保身。至於中國新建制之制度的吸引能力，則取決於其經濟效應和競爭優勢。

結構主義者認為，中國目前雖未對美國採取軍事對抗，但未來不見得必然如此。他們主張，中國在提升自身國際地位的過程中，只要「時間到」，便有可能提出更強勢、更積極的外交政策。有沒有這個可能性？解答是：肯定。然而，中國於未來所提出更積極的外交政策，很可能並不主張反美，而是更強調中國中心的特徵。兩者差別甚大。我個人認為，中國即便提出所謂更積極的外交政策，也不得妄斷將會引發中美衝突。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會繼續採取的對美外交方針如下：

- 在美國能夠容忍的範圍內，建立新的國際建制，堅持提升中國自身影響力。
- 若此種行產生過大抵抗，試圖更改既有國際建制的運作原則。
- 強調中國利益。更改國際建制之行動若受到過大壓力，能讓步就讓步，調整自身的邊際利益期望，抱持不對抗態度，維持低調形象。

四 中國未制衡的法理因素

本章節的目的在於列出中國對外宣傳國家利益的幾點重要法律文獻。關鍵不在於討論這些法律的好壞長短，而只是以最簡明的列表方式點出中國在何種文獻以何種方式界定其國內利益。

中國的國家利益可以分成安全利益和發展利益。安全利益主要體現在保持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及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上。發展利益建立在安全利益受到充分保障的基礎之上。

安全穩定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基本利益，是生存的基本條件和國家的基本目標，而發展是每個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最高目標¹⁰³。

中國在諸多場合表明其關鍵利益，包含領導人發表演說、官方媒體新聞、學者專書和分析等等，然而對本研究最重要的是表明中國國家利益的來源便是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等重要國家雙邊締約的內容。

(1) 針對美國界定中國國家利益

中國在冷戰前後與美國和日本簽署了幾項重要的雙邊條約以界定其關鍵國家利益。與美國簽約的三個公報，被視為中共跟美國關係正常化的依據，並維持責任式的安全關係。

以下以列點方式點出各條約最重要的內容：

103韓玉貴，《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第62頁

(1) 《上海公報》1972 年

- 中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
-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
-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不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 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 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

(2) 《建交公報》1979 年

- 中國默認美國根據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由美國政府通知台灣在一年之後失效；卡特總統在宣讀《中美建交公報》的同時，單方面聲明“美國繼續關心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
-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3) 《八一七公報》1982 年

-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是指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
- 中國政府重申，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 為了使美國售台武器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最終得到解決，兩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採取措施，創造條件，以利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中國分別與 1994 年和 1997 年針對美國高層領導人表明了雙方互動的

幾點重要指導原則。其內容如下：

(4) 1994 年 11 月，江澤民主席在雅加達同柯林頓總統會晤時，提出指導兩國關係的五項原則：

- 第一，雙方都著眼於世界大局和廿一世紀，從更廣泛的範圍和長遠的觀點處理中美關係；
- 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國情和選擇，擺脫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差異對兩國關係的影響，以友好的精神處理相互間的一切問題；
- 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經濟的優勢和特點，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推動兩國經濟合作全面發展；
- 第四，加強兩國在國際事務和國際組織中的磋商與合作，在解決世界熱點、環境保護、反恐怖等問題上開展合作；
- 第五，增進相互間的來往和交流，特別是高層互訪和接觸。

(5) 1997 年 3 月，江澤民主席在會見美國副總統戈爾時提出了發展中美關係的三個原則：

- 始終把握兩國間的共同利益；
- 處理中美關係要站得高些，看得遠些；
- 切實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妥善處理台灣問題。

(2) 針對日本界定中國國家利益

中國在冷戰前後與日本簽約了幾部重要的雙邊條約以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牽涉到國家領土、政權正當性、經濟發展、歷史問題的釐清等關鍵議題。

以下列出各文獻最重要的內容：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1972 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 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 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1978 年)

- 締約雙方應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根據上述各項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締約雙方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 締約雙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3) 日本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面向二十一世紀環境合作聯合公報(1998 年)

- 雙方確認，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以及《聯合國憲章》的準則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 雙方主張，徹底銷毀核武器，反對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擴散。
- 雙方認為，冷戰後，亞洲地區形勢繼續走向穩定，維護地區和平、促進地區發展是兩國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雙方不在本地區謀求霸權，不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主張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糾紛。
- 雙方將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內各種多邊活動並開展協調與合作，支持一切有利於增進了解，加強信任的措施。

- 兩國領導人每年交替互訪；在北京和東京建立中日政府間熱線電話；加強兩國各個層次和級別，特別是肩負兩國未來發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間的交流。

(4) 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2003 年)

- (一)貿易與投資合作；(二)信息通信產業合作；(三)環境保護合作；(四)防災治災合作；(五)能源合作；(六)金融領域合作；(七)科技合作；(八)旅遊合作；(九)漁業資源保護。

(5)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2006 年)

- 中日雙方一致認為，邦交正常化 34 年來，中日兩國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不斷拓展和深化，相互依存進一步加深，中日關係成為兩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雙方同意，努力構築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實現中日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崇高目標。
- 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中國將同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 雙方確認，為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應堅持對話協商，妥善解決有關分歧。

(3) 針對台灣問題界定國家利益

另外，中國於 2005 年發布了所謂《反分裂國家法》，進一步對國家領土完整此利益進行歷史以來最完整也最清楚的界定。該法律幾點重要內容如下：

第二條

-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第三條

-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
-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

第八條

- “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第五節 中國未制衡美國的綜觀

中國的崛起主要表現在國內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兩方面上。自從東亞爆發泡沫經濟危機後，中共顯然也開始呈現出往外擴張的趨勢，擴張方向與範圍以東亞區域權力範圍為主。中國仍然拒當全球霸權，因此還未有往全體系擴張的問題。中國能在擴張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的同時，又能相當穩定地布局東亞，一方面托美國之福，另一方面是因中共忙於提供經濟發展條件，藉以迴避衝突政策。

我之所以說是托美國之福，是因為美國從 1980 年代後，逐步且謹慎地允許中共在東亞扮演自己的角色，對中共經濟改革保持樂觀且支持的態度。儘管中美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但美國給予中共領導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亦即區域限制已被消除了：為了追求東亞利益，中共基本上不需與美國爭奪發展權力。這個承諾緩解了不少壓力，也鋪設了中共和平崛起的可能。即使東亞仍然是衝突性社會結構的格局，但美日安保（美國與其他國家所建立）等單邊主義安全建制，都不會直接阻止中共與日本、韓國、東協各國等國家進行安全對話，更不反對中共與這些國家建立密切的貿易網絡。因此，中共的區域擴張之所以不成問題，也是因為距離體系限制被突破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短期而言並非急迫問題。

至於提到中共忙於提供經濟發展條件，藉以迴避衝突政策，我的意思是指，中共領導人一直到經濟泡沫危機發生後，才真正瞭解到中共與東亞區域之間的錯縱複雜關係，也才瞭解中國經濟能力有助於拉攏原本對中共懷疑的鄰國，包含美國的同盟在內。金融危機後中共對東亞區域更為積極，採取新安全策略，將東亞繁榮與中國繁榮視為相輔相成的關係。經濟穩定有助於政治穩定，這個發展因此備受大家肯定。

我在上階段進行了個案研究，由於這些個案都反映出特定層次限制，也就是測試這些限制的開放性。如果不開放，且中共無法跨越該結構限制的話，領導人便被逼迫退步而朝保持距離的方向發展，這對中美關係非常不利。譬如，美國若侵犯中共國家層次限制，且干涉中國領土完整此一核心利益，那麼按我假設，會產生嚴重的衝突。

以圖表而看，假設中美關係的邊際合作刺激位於#1點，然後核心利益突然遭受侵害，中共便被逼迫退回最左邊的國家限制(#2)，為維持同樣高度的國家實力、維護其核心利益，所進而採取的理性行為就是制衡。

舉例而言，美國柯林頓給予李登輝訪美簽證之同時，李氏卻選錯時機，提出「兩國論」，於是爆發了冷戰以來最嚴重的中美衝突，即1996年的台灣海峽危機。中共海軍演習可被視為一種制衡嘗試，雖主要是有象徵性意義的制衡，但若美國選擇不理睬中共的國家利益作為回應，在此可能會改變中美關係。結果，中共演習成功地產生了對美嚇阻效應，美國讓步且對台灣施壓，重新提出「新三不」政策，即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而致力與中共建立互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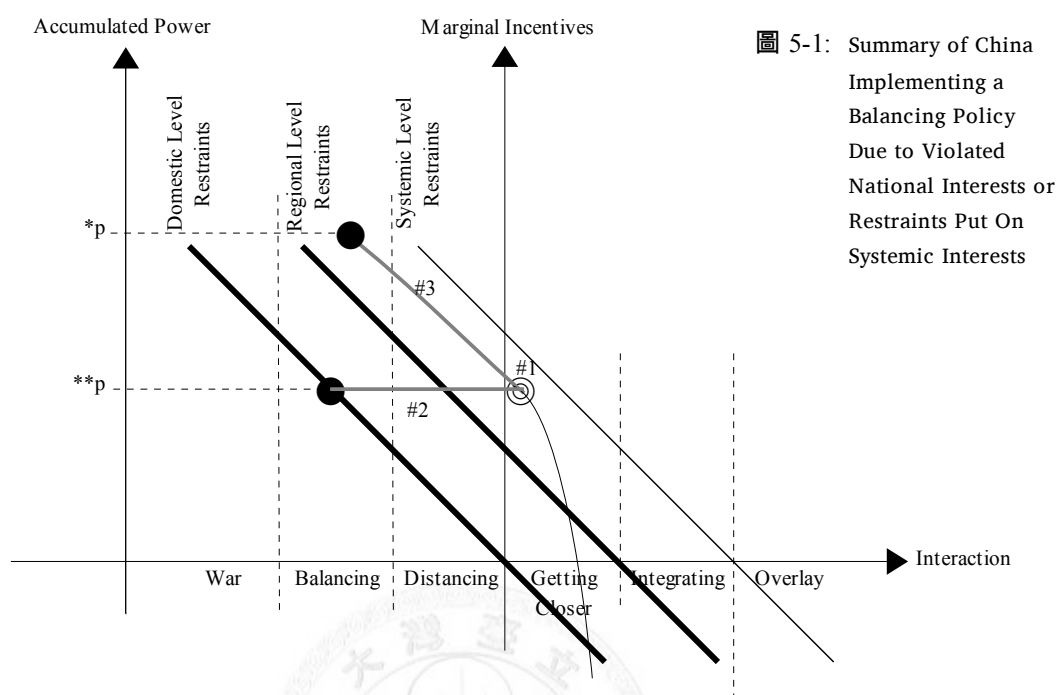
從上述多則個案研究可見，冷戰後發生過的若干衝突事件和利益分歧，都沒有系統性而長期違背中共的國家利益和區域利益，因此不足於構成發展障礙，更不足於逼迫中共對美國進行制衡。儘管衝突的種子仍在，但中美相當有默契地迴避這些衝突。美國不僅在法理上，也具體地對中共承諾區域限制的開放性，所以中共得在不直接違背美國利益下追求東亞區域內任何利益。按照中國的軍事經濟發展來看，至少要等到未來20至30年後，才可能有擴張至全球體系的急迫議題產生。

中國制衡美國，從層次限制來看有兩種情形。一、美國或明或暗反對中國跨越體系層次限制，原因可能在於防止中共在對美國有戰略價值的地方，栽培反美同盟、建立反美聯盟，使美國在這些地方難以爭取政治支持、經濟利益或發展資源。但目前而言，這樣的中美關係政策不太實際。唯有在中共發生嚴重的國內政治退步，才可能構成這些條件。

二、美國收回已給予中共的利益承諾，尤其是對中共有關主權、領土、台灣問題、西藏問題、經濟發展等最核心利益採取不理睬的基本立場承諾。即使美國這樣做非常不智，但這是理論上的制衡條件。

從圖表中可看出層次對制衡的影響。一個新興強權被允許追求區域利益與否，直接決定了該國的制衡誘因。假設霸權不允許新興強權跨越體系層次，並在#1點上發生霸權對新興國家的政策評估，那麼如果霸權領導人決定，新興強權對區域發展有幫助，可以繼續追求區域利益的話，新興國家會持續累積國家能力直到*p點，而在*p點才會進入制衡狀態。但如果霸權採取更嚴苛的反應，反對新興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區域利益，且擔心該國對區域的影響，那麼新興強權就會被迫在維持現有國家能力(**p)之時，直接進入制衡狀態(#2)。

這意味著三件事：一、對霸權而言，如果真的要制衡，要早一點、快一點、狠一點下手，不讓新興國家增加太多國家能力。二、對新興國家而言，自己所累積的國家能力到最後可能變成開門金鑰匙，這對霸權也有嚇阻作用。三、弱小國家容易被欺負，畢竟國家權力不大，即使國家利益被侵犯，也還不至於選擇距離制衡或戰爭行為。反之，權力大的國家，只要區域甚至體系利益(核心利益更不用說了)被侵犯，他們的行為選擇就會落在保持距離或制衡上。



第六章 結論

即聖人亦有不知不能，
在我們則只有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¹⁰⁴

— 錢穆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 假說二之驗證

按照本文案例分析的邏輯次序，在此先歸納假說二的研究發現。

假說二針對制衡誘因提出假說，認為只要中國在關鍵利益上不受到美國的挑戰以及只要美國沒有對中國產生其他緊迫脅(主要是政經發展和正當性的威脅)，那麼中國不會受到強烈的制衡誘因，因而不會制衡美國，無論美國的軍事力量多大或兩國之間有何種社會建構。

案例分析確證(confirm)第二個假說。在中美關係近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利益衝突中，中國對美國態度不會隨著美國軍事力量的增加而發生根本變化，並且美國始終遵守中國的核心利益，並沒有對中國國家主權、中國領土完整、共產黨專政、政權正當性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提出嚴厲的反抗、異論或否定。

在分析五件案件中，本研究發現，美方主要針對民主打壓、人權侵犯、經貿逆差等議題提出批評，但無論雙方關係不悅的原因如何，美方在外交上仍然對中國儘量保持接觸、瞭解、對話的態度。美方從未公開對中國共產黨專政露出厭煩、抵抗或嚴重批評的言詞，也從未針對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提出三個公報範圍以外

¹⁰⁴錢穆，2004，〈有關學問之道與術〉，《新亞遺鐸》，北京：三聯書店，頁411。

的異論。

在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內，尚未觀察美國侵犯中國核心利益而因此啟動制衡機制，這樣的因果關係。但本研究發現，在雙方多年外交接觸以來，國內核心利益是最受到雙方的關心和維護，也是每當發生衝突時最常溝通和最常確認的利益，以確保雙方具有共同利益基礎。例如，中方期待每當美國新任總統第一次對中國表態時，一定要針對一個中國原則提出肯定。但由於從未發生美國總統對一個中國原則保留未定或不接受的態度，因此本研究只能間接推論中國核心利益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在最嚴謹的邏輯上，假說二目前屬於尚未被否定的狀態。我們需要至少一個因為利益被侵犯而發生制衡的例子，才得更有把握地說此假說是受確證的。

貳 假說一之驗證

假說一針對制衡誘因的層次提出假說，認為制衡的主要誘因位於國內利益層次上，並且由於中國尚未成為體系強權，因此中國最大範圍的國際行為仍屬於區域層次而不在於整個體系層次上，因此區域層次的利益目前作為最高層次的中國利益。體系利益只是宣傳口號。

案例分析確證了此第一個假說。本研究分別從軍事力量、經貿關係、區域合作和國內利益等方面分析，並發現中國仍缺乏把軍事力量投射於整個體系的強大軍事力量，因此認為中國仍並非作為體系強權。中國在經濟上也結構性地依賴美國，不能夠在全球經濟上脫離美國成為一個抗美陣營。在區域層次上，即使中國努力於構成獨立於美國的政經網絡，但因為種種原因，其並不與美國進行直接對

抗，反而發展出合作多於抵抗的務實外交。只有在國家核心利益上，中國才採取一個強硬不讓步的態度，包括對台灣和西藏領土糾紛，對於迴避政治改革和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等方面的堅持。

對於利益加以層次化不完全純屬於經驗性內容，一部分也牽涉到分析架構的設計。所以，當我們對於上述的各種利益加以分析和層次化後，因為分析結果合乎分析架構和歷史經驗，因此認為這樣的分析相當妥當。但不能排除其他分析架構的可能性。

參 針對研究問題的回應

第一個研究問題為：中國是如何成功地在增加其經濟、軍事及政治力量的同時，不啟動制衡反應，即不陷入制衡陷阱，避免制衡美國，也迴避被美國制衡？據本研究發現，可以如下試提解答：制衡作為動員規模最廣、時間最長、耗減國內資源最大的外交政策，其啟動機制因素至少牽涉到四項：一是、自己或對方進行快速軍事擴張，二是、對於對方產生具體軍事威脅，三是、雙方之間的社會建構有競爭對抗的歷史脈絡，四是、一方嚴重侵犯另外一方的核心利益。

對於上述制衡機制可以得到結論如下：一是、制衡機制本身並非容易可以啟動的。二是，由於制衡的預期成本遠超過預期獲利，再加上因為蘇聯制衡美國遭遇國家瓦解，因此中國對於制衡美國特別感到警惕。三是，在雙方不需要藉由威脅對方抑或違背對方核心利益以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之上，保證制衡是不會發生的。

因此，與其說中國避免制衡美國，不如說中國不需要制衡美國仍可以確保和

維護自己國內核心利益，尤其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政權穩定、經濟發展和區域參與。

第二個研究問題為：未制衡條件在不同層次上究竟起何種功能？明顯，制衡與利益層次有顯著的關係。國內層次的利益受侵犯，最容易產生制衡誘因。並且隨著國家整體能力的增加，區域層次的利益和體系層次的利益也越來越成為重要因素。但只有在新興強權成為全球性強權後，區域層次的侵犯甚至體系層次的侵犯才會提高制衡的可能性。中國目前僅作為區域強權，尚未提升為全球強權，因此即使侵犯中國的體系利益也只得引起中國對該國保持距離。

第二節 本文之整體解釋邏輯及其理論意涵

為了解釋制衡現象，即使傳統理論著重於結構與區域變數例如軍事力量、威脅以及區域社會建構，它們卻不重視外國勢力抑制國家核心利益對於制衡的影響。結果，它們無法提供一個令人滿足的解釋，無法說明中國為何只面對制衡美國的輕微誘因，即使在中美關係因軍事和經貿議題可能引起爭執。關鍵在於，既有並非將區域層次和國家層次納入考量之中，也並非考量到國家利益對於制衡政策的重要性。

為了解決此理論缺陷，本論文在解釋制衡的傳統變數中，一方面補充第四種變數，即利益變數，另一方面補充利益層次的概念，方便檢討利益、威脅等概念對於國家行為，有甚是制衡政策，有什麼樣的影響，因此讓我們對制衡行為的解釋更為圓滿。做了補充後，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只要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制度、

菁英和國家整體不構成具體的軍事威脅，以及只要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受到侵犯時，中國將不會制衡美國，無論美國的軍事力量多大或兩國之間有何種社會建構。

為了更清晰地凸顯本文的這種理論補充作用，在此將本文的整體解釋性邏輯進行一個綜合性的統整，此一整體邏輯內各組成要素之特性與彼此間的關係，都更具體呈現出其分別針對現有各相關理論，產生哪些實質性對話。

缺乏制衡的理由並不能直接構成未制衡的理由。無論是傳統現實主義或結構主義，以往都認為「每當一國權力增長可能影響到極（polarity）與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的變化時，其他國家會單獨或聯合起來共同制止該國，針對挑戰者改變現狀（status quo）的企圖加以制衡（balancing）」（Waltz, 1979），尤其是快速崛起的新興強權，必然會與既有的強權陷入衝突。但當代中國崛起似乎不符合「增加權力必然發生衝突」的邏輯。我們也不能因為沒有觀察到制衡，便輕易否定權力對制衡的實質作用。權力和制衡之間有可能存在別的連結因素。

此未知的連結因素，後來由沃爾特的威脅平衡理論而得到補充。他認為快速崛起的新興強權通常會引起一種威脅，且此威脅會引起制衡。但沃爾特也表示，某些國家的崛起之所以未必引起制衡，或許是因為這些新興強權本質上仍屬未完成的強權，歐盟即為一例。或許是因為新興強權與既有霸權之間，在文化或制度上存有某種共同點，使霸權的政治菁英和人民會普遍認為，新興強權「就像我們一樣」，譬如巴西、印度等新興大國均為民主國家。

威脅平衡理論炙手可熱，主要是因為「威脅」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容易與其他概念結合，可共同解釋未制衡現象。譬如有些學者認為美國單極體系之所以未遭制衡，是因美國持有善意意圖（intention）或者慈善性（benignity）及自由主義（liberalism），抑或因為美國代表現狀（status quo）和正當性（legitimacy），或者較

具有軟權力(soft power)和文化上的吸引力(cultural attractiveness)。

但從此角度談起未制衡，在論述上彷彿發生主客換位，似乎又扯遠了。以前我們認為霸權一如體系管理者，能站在體系結構的最高點，謹慎觀察所有其他行為者。若出現了一個新興強權，霸權便會按照所評估的威脅來判斷其反應和對策。此架構裡，新興強權被視為制衡的第一原因，而霸權只是對此做出反應。

但當討論離開以「崛起產生制衡」為主的邏輯論述，大家將焦點轉移到霸權上，認為制衡產生的原因，是基於「抱怨效應」或所謂的「壓迫反應」。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一切行動，若不會引發其他國家抱怨，那麼其結果均為不制衡。因此，制衡的第一理由為霸權的行動，若霸權為善，其他國家不會制衡霸權。

一般人無法接受上述如此簡單化的制衡邏輯，是因為制衡理論僅注意體系層次，忽略掉其他層次。普遍認為，超強主要的行為層次是體系層次，而且僅限於體系層次。其他層次(區域和國內層次)均被視為隸屬於體系層次，抑或霸權在區域和國內層次的行為反應，皆透過體系層次演繹出來。

然而，據布贊和施韋勒最近的研究顯示，僅考慮體系層次會嚴重扭曲整個畫面。超強等任何國家，通常會受區域環境及國內層次的莫大影響。超強的行為並不限於最高的體系層次，而是牽涉到所有層次，同時也得到所有層次的回應。

當我們將區域和國內層次加入考量，將大幅豐富化理論可能性空間(possibility space)。如此一來，我們能夠把國家行為連結起來，譬如將制衡，以及軍事威脅、戰爭次數(亦即友善性)、經濟威力等體系因素連結起來。若再考量到其他層次的話，則可將制衡與主權(sovereignty)、領土完整性(territoriality)、政權穩定(regime stability)和脆弱性(regime vulnerability)、意識型態(ideology)、發展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菁英共識(elite consensus)、內聚程度(elite cohesion)、和社會內聚程度(social

cohesion)等因素連結起來。

在現代歐洲的形成過程中，軍事威脅和領土佔領，都是體系中各國格外關心的事務。當時，權力平衡確實被委以維持各國安全和區域穩定的使命，若體系中二至五個主要國家均能維持相當程度的軍事能力，權力平衡便被視為有發揮作用。

假定國際關係中的最大威脅，是敵人企圖佔領對方的領土，那麼軍事力量、準備就緒和聯盟關係便成為最佳的對應策略。但在當代高度複雜化的國際關係中，何謂威脅並無單一答案，會因國家、區域和發展模式而異。

國際經貿、經濟發展模式、環境和衛生相關的議題，以及國際恐怖和核武擴散，都成為各國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但這些威脅似乎均不適合透過制衡來解決。但如先前論述所說，不能因為沒有觀察到制衡，就認為沒有威脅。隨著威脅本質的改變，面對威脅的政治工具也因而改變。

那麼，制衡有何好處？今日的国家還需要制衡嗎？答案理論上是肯定的。本研究中，我認為制衡是國際體系中的一種行為類型。當國家遭到嚴重的威脅，或其核心利益遭受嚴厲的侵犯，且又無法立刻準備打仗時，國家便被迫採取制衡政策。原因可能如施韋勒所提出的國內理由，或者因為區域環境具有高度危險，亦即受威脅的國家基於體系內主要國家的軍事力量的相對強弱和敵友關係的考量而暫時放棄打戰。

相較於保持距離，制衡屬於更為嚴重的外交政策。作為一種行為類型，制衡的特徵在於維持不變並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不是一個突發性或非出於強制的反應。另外，制衡形成領導階層對威脅來源的意識，並會為針對處理威脅而設立的國家機關帶來改變。一旦國家採取制衡，國家對於造成威脅的國家將縮小其行為空間。

舉例而言，北韓對美政策幾乎可稱為典型的制衡政策。北韓軍事力量不足，戰爭並非可行之行為，但由於長期對抗美國，北韓所有對外政治機關都受到影響且被扭曲，且為確保北韓國家安全，必須展開抵抗行動。

本論文發展出六種國際關係的行為類型，目的是要提供一個清楚的類型架構，並相對於其他行為類型，對制衡加以界定、類型化和說明。在此類型架構中，制衡的相反是「整合」(integrating)。但整合不得與「未制衡」或「不制衡」混為一談。要注意的是，給定結構誘因的話，類型架構得以區別不同類型的國家行為或反應。但是，要解釋「未制衡」或「不制衡」就得提出疑問：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那些結構誘因在制衡行為上降低？

那麼，當我們試問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時，我們其實是在問：為何沒有一個強權為了確保國家安全，而不得不藉由維持反美外交政策，並對其國家機構施以功能性改變，以消滅美國威脅和影響？

由於中國通常被視為最可能且最有能力制衡美國的新興強權，因此本研究主要討論中國崛起與制衡美國的相互作用。當我們試問中國為何未制衡美國時，我們事實上問道：為何中國不願意或不能夠藉由增長軍事能力，以維護其國家安全、對抗美國威脅，或抵制美國侵犯中國國內、區域和體系利益？如此問道，可以提出諸多個答案如下：

1. 絕對優勢。美國的軍事能力具有絕對優勢。中國若要以軍事方式超越或制衡美國，則必須投注大量時間、成本來發展軍事現代計畫。

2. 聯盟。美國本身不僅具有優越的軍事能力，更建立並經營了一套無所不在的「樞紐輪輻系統」(hubs-and-spokes system)，此聯盟系統能在必要時候，引發強而有力的反措施，以提高軍事交往的門檻。屆時，中國將面臨的反抗，將是一個

以美國為主導的軍事聯盟，旗下國家包括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澳洲、紐西蘭、泰國等。

3. 沒有威脅。美國對中國不構成威脅。至少不是透過傳統制衡方式便能有效抵抗的威脅。的確，美國是一個剛強競爭者，不僅追求政治影響力、爭取發展能源、利用貿易和經濟優勢、積極進行外交和軍事策略，也強迫形成後冷戰新世界秩序。不過，制衡可說並不是因應這些競爭和挑戰的最佳方式。相反地，制衡可能會適而其反，阻撓中國整體的發展前途。

4. 合作。對中國來說，美國不僅不構成緊迫威脅，中美關係也存在著許多合作誘因，畢竟美國為了治理國際關係，建立也經營了全球建制，使其他國家得以從中獲利，同時也降低他國對美的反抗。透過美國軟權力，也彰顯了美國硬權力如何轉換成可行、可接受的國際建制。

5. 隔岸平衡。主張缺乏威脅的論述，有時能輔以地緣政治的論點來補充。因為美國地理上遠離世界糾紛地區，也遠離其他新興強權，因此有能力也有責擔任所謂強而有力的隔岸平衡者之角色。對其他地區過度干預，反而會破壞美國友善可信的國際形象，也有損美國自稱不干預、愛和平的悠久傳統。

6. 經濟與貿易。中美雙方具有密不可分的經貿關係，使得中國以軍事手段制衡美國的意願被有效抑制。經貿關係不僅產生習以為常的相互依賴的現象，更在中國內部產生對美國市場的莫大依賴。因此，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美國市場經濟產生了結構性連結。中國持有世界大量的美元外匯和美國債券，因此任何軍事上的衝突，都會立刻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後果。

本研究針對美國為何未遭制衡之說，補充另一論點：

尊重利益。美國尊重中國最核心的國內和區域利益。有鑑於這些利益保障，中國

不大擔憂美國軍事力量，畢竟這些軍事力量對中國利益並不構成緊迫威脅。本研究認為，只要美國願意溝通、瞭解並尊重中國的最核心利益，中國終究不會制衡美國。但假如美國有一天開始不理睬中國所宣傳的國家利益，尤其是中國最關心的國內利益，那麼極有可能引起中方最強硬的回應，包含採取制衡甚至發動戰爭。

中共於 2005 年 3 月 14 日宣布的「反分裂國家法」，諸多學者和一般民眾都深感擔憂，認為中國暴力、野蠻。不過，本研究採取一個很簡單的立場，我認為「反分裂國家法」的宣布，事實上進一步降低了中美關係發生意外的機率，也是中共第一次清楚界定自己使用武力的條件和範圍，這對台灣海峽的穩定有一定之幫助。

制衡因素除了權力增長、威脅程度和國際環境的敵友關係外，本論文也補充另一論點，亦即競爭者之間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也可能是制衡因素。為進一步探討此論點，本論文探討國內、區域和體系層次、國家利益對於國家行為的影響，並對此進行個案研究。本研究主軸放在此一特殊案件上：即使受到美國壓力，中國卻仍不對美國採取制衡的反應。

本論文研究中國未制衡美國的特殊案件，而做出如下的結論：

1. 軍事力量仍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在當代國家關係中，軍事力量必須與其他因素連接，才能起特定方向的作用。

2. 威脅仍然是權力和制衡間極重要的連結因素。威脅也能作為載體，將任何因素轉換成制衡的動機，例如，恐怖主義以威脅作為制衡因素，對發展能源的掌控也藉由威脅作為制衡因素等等。

3. 經濟相互依賴並不能單獨構成一個制衡或不制衡的因素，而僅能提升雙方對彼此懲罰的槓桿能量，但同時也降低雙方對彼此懲罰手段的防守能力。只有高

度不對稱的相互依賴才會構成單方向的優勢。中美關係不存在高度不對稱的優勢。

4. 即使中美關係隱藏諸多意識型態、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但雙方至少能持續溝通，且能尊重對方的核心國內和區域利益。

本研究結論在於，雙方相互溝通、尊重對方的國內和區域利益，是制衡理論上極為重要的因素，唯至今仍少有人注意。國內和區域利益之所以不受關注，原因可能在於國家利益分散於國內、區域和體系各三個層次上，只注意國際層次的結構主義，較不易在其架構上處理這種棘手問題。

以往咸認為，超強主要關心的是其全球體系的利益。不過，若將美國所受到的兩種利益威脅加以比較，即將北韓的核武擴散和 911 恐怖事件相為對照，不難發現，美國在維護其國內利益，即保護本土人民安全時更為積極，對於較抽象和遙遠的核武擴散問題則較不積極。國內利益，舉凡本土安全、政權穩定、社會安定和均勢、經濟發展等因素，均是任何國家最關心的重大問題。

中國的核心利益，除了剛才提到利益之外，有些屬於宣傳性質，有些是具體的，有的藉由立法程序而具有法律效力，有的則被視為基本共識。

1. 領土完整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之一。從中國官方立場看來，台灣與西藏均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並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範圍。任何有關領土主權的爭議和干預，在中國領導人眼裡，均是極為嚴重的利益侵犯。領土完整的利益對中國而言如此重要，中國甚至於 2005 年 3 月以「反分裂國家法」的名目成為了法律，對中國處理領土爭議具有一定程度的領導作用，更具有對外宣傳和警告的作用。

2. 經濟發展的權利，包含選擇國家發展模式和指導思想的自由，均被視為國家利益。

3. 政權穩定與有別於西方價值的非民主政治制度，即使是不幸歷史產物，卻仍與中國發展模式和對外立場有密切關係，因此被人民視為自己獨有的，應該受肯定的國家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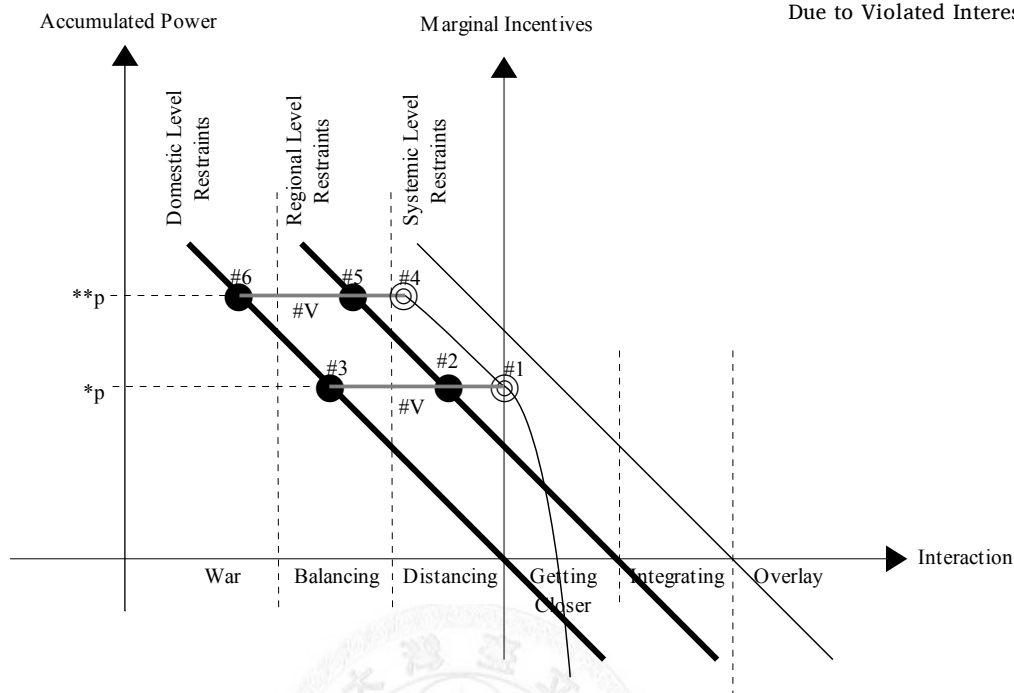
4. 軍事現代化是一個關鍵國家利益。由中國領土大小及人口多寡和區域重要性來看，中國現代化確實有可能長久繼續發展。中國近代史的殘酷回憶和半殖民化的政治路徑，均留給中國人民一個永久的烙印。因此為確保國家主權、安全與尊重，中國把軍事現代化視為一個無庸置疑的國家利益。幸好，中國的核武化早在 60 年代已完成，否則中國核武化勢必會加重中美關係緊張。

在制衡邏輯上，倘若超強侵犯新興強權的區域利益，有可能引起保持距離，甚至制衡的反應。正如以下圖表表示，假定新興強權位於原本位置(#1)，當新興強權遭到區域利益侵犯時(#V, V = violating interest)，該國家得歸到區域層次以維護其區域利益(#2)，而在此處最適當的行為便是保持距離。譬如美國干預中國與東協各國的合作計畫，抑或美國過度支持日本爭取與開發海地石油，抑或美國對北韓政策不理睬中國的意見，抑或在中亞國家擴大軍事存在等等。至於這樣的利益侵犯會產生何種行為反應，則端看中國此時的軍事力量和區域格局。

但假如中國已獲得了相當可觀的軍事力量的話，中國該時的位置則在於更高的地方(#4)，此時區域利益遭到侵犯的話，中國得一樣回歸區域層次維護其區域利益(#5)，然而此時最佳反應便是制衡。換句話說，新興強權的利益遭到侵犯時，要端看該國當時的軍事力量(*p 抑或 *p)來判斷其應能選擇何種反措施。

在制衡邏輯上，倘若超強侵犯新興強權的利益屬於國內利益，則必然引起制衡抑或戰爭。從國內利益遭到侵犯，到了國家依照自身軍事力量而選擇以制衡或戰爭方式回應並維護其國內利益，其邏輯與上述類似。

圖 6-1: Summary of Balancing
Due to Violated Interests



一旦國家利益遭受侵犯，軍事力量、威脅程度、區域社會結構、利益層次此四種因素，皆可視為引起制衡的關鍵因素。加總起來，這些因素構成了制衡的充分條件。但我們也得反過來說：對一個崛起強權來說，若國內利益未遭受侵犯，也未遭受其他需以軍事手段來因應的嚴重威脅，無論對方的軍事力量多大、區域社會結構如何，結果將會是「不制衡」。

綜合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可將理論總結為一套制衡因素和一套不制衡因素。制衡因素重要者有四，包含軍事力量、威脅程度、區域社會結構、被侵犯的利益層次。在制衡邏輯上，這些因素都必須同時為真(存在)，才能夠產生制衡。不制衡因素包含威脅程度和被侵犯的利益層次此兩項因素。在制衡邏輯上，此兩項因素若同時為否(不存在)，便能構成不制衡的條件，也就是說，在此二因素同時為否時，即便軍事力量和區域社會結構等因素皆存在，也將無法產生制衡。

圖 6-2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Balanc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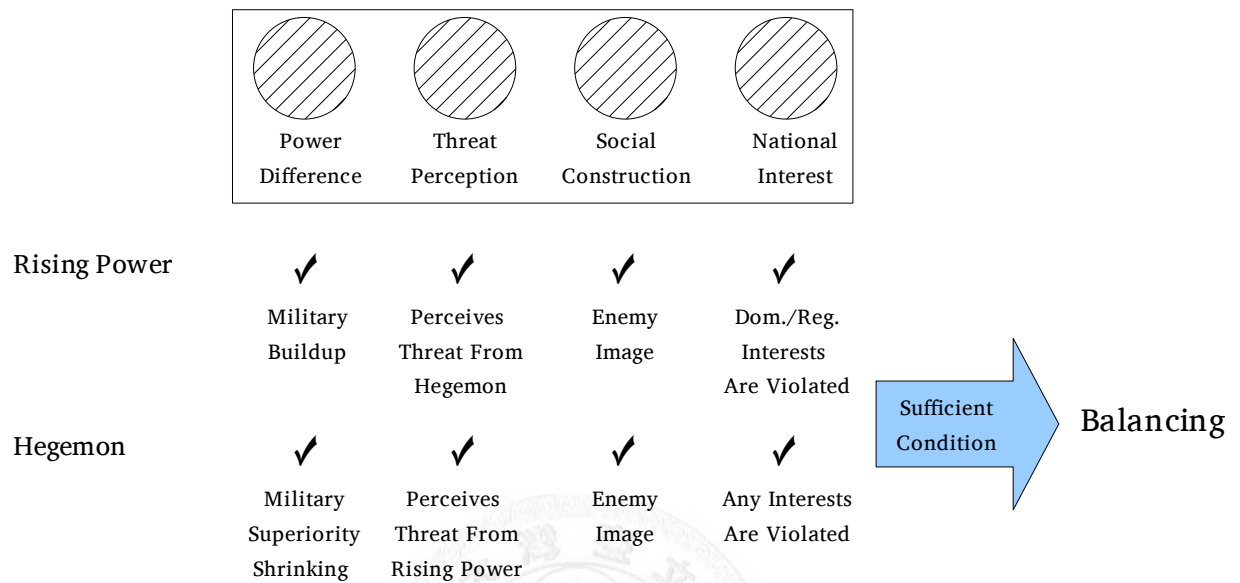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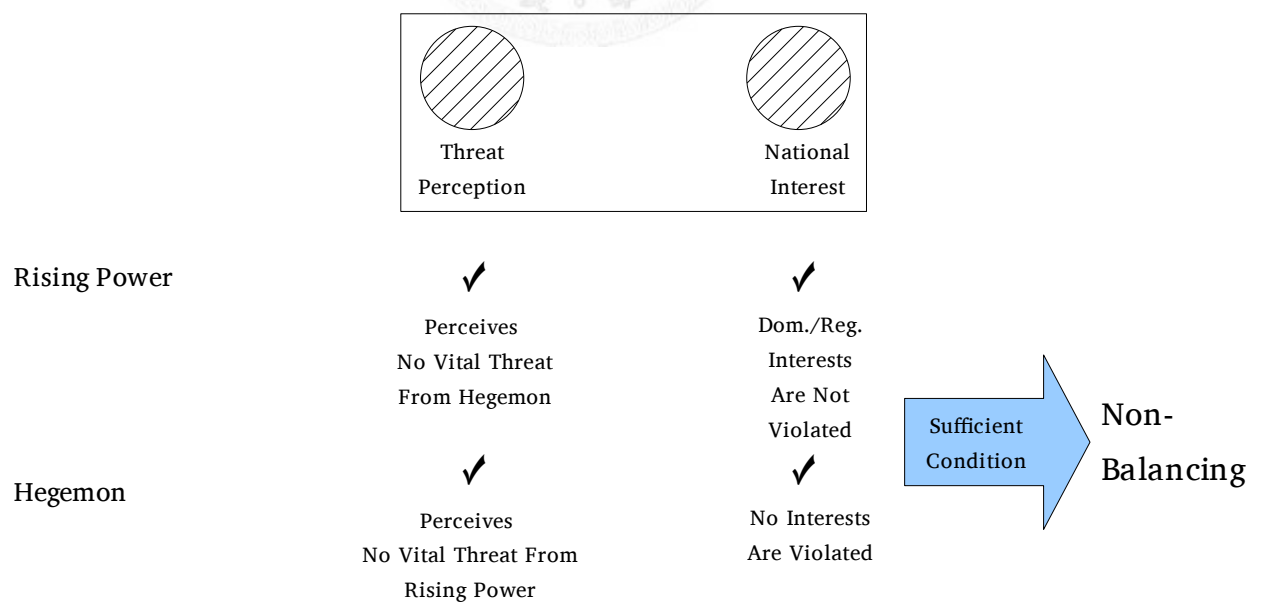


圖 6-3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Non-Balancing



第七章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丁偉等，2007，《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台北市：五南。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本書編寫組著，2009，《中國1978-2008》，北京：中央文獻。
- 牛震，2000，〈關於霸權穩定論及其評價〉，《世界經濟與政治》(10): 22-27。
- 王良能，2002，《中共的世界觀》，台北：唐山。
- 王軍，但興悟，2008，《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編譯。
- 王逸舟，2003，《全球政治與中國外交：探尋新的視角與解釋》，北京：世界知識。
- 王義桅，2008，《超越均勢：全球治理與大國合作》，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王緝思，2003，〈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3):3-11。
- 王緝思等著，2001，《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台北市：生智。
- 甘逸驊，2005，〈歐盟與美國：『柔性平衡』或『硬性平衡』？〉，《歐盟與全球政治》，台北市，頁1-20。
- 石之瑜，2005，《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台北市：台大。
- 朱光磊，2008，《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2002，〈中共對外關係〉，《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頁10-48。
- 但興悟，王軍，2008，《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編譯。
- 吳玉山，2009，《發展國家的沉浮》，未出版。
- 吳征宇，2007，〈結構理論、地理政治與大戰略〉，《國際觀察》(5):22-28。
- 宋偉，2003，〈國際秩序：理論、實踐與反思〉，《太平洋學報》(2):71-77。
- 宋曉軍等著，2009，《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
- 李光大，〈戰略思想的倫理意涵—和平研究〉，《第十七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http://www.waou.com.mo/detail.asp?id=30889>。
- 李建民，2007，《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史》，北京：中國經濟。
- 李根信，滕建群，2008，《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北京：世界知識。
- 周桂銀，2007，〈中國國際政治研究中的議題和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4): 86-95。
- 明居正，2002，〈面向12世紀的中共外交戰略：認知與對策〉，《21世紀中國》，台北：政大國關中心，頁217-253。
- 俞新天，2008，《國際體系中的中國角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 胡鞍鋼，2004，《中國：新發展觀》，杭州：浙江人民。
- 郝雨凡，林甦，2007，《中國外交決策：開放與多元的社會因素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韋宗友，2003，〈制衡、追隨與冷戰後國際政治〉，中國國關線上，<http://staffweb.ncnu.edu.tw/hdcheng/articles/postcoldwar.htm>。
- 柳惠千，2008，《21世紀美軍在東亞的戰略部署》，台北：高手專業。

- 徐斯儉，吳玉山編，2007，《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台北：五南。
- 秦治來，2006〈霸權・制度・戰略：賣『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國際觀察》(5):76-79。
- 郭樹勇，2008，《戰略與探索》，北京：世界知識。
- 陳奕平，2006，《冷戰後東盟國家對美國戰略研究》，北京：世界知識。
- 寇健文，2004，《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
- 張沱生，(美)史文編，2007，《對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機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識。
- 張登及，2003，《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文化。
- 張歷歷，2008，《當代中國外交簡史》，上海：上海人民。
- 張麟徵，2002，《近代國際關係史》，台北市：揚智文化。
- 極目編，《中共政局大破解：17大最新觀察》，畫北縣新店市：新來文化。
- 黃天麟，1997，《中國之興衰》，台北。
- 葉自成，2000，〈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色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1):5-10。
- 楊光斌李月軍等著，2007，《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對外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趙懷普，2003，〈均勢、霸權與國際穩定——兼論“單極”與“多極”的矛盾〉，《太平洋學報》(2): 45-51。
- 鄧永昌，2008，《中國和平發展與西方的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閻學通，2005，《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
- ，2005，《國際關係》，<http://www.weekmag.com/html/2365.htm>。
- 劉鳴，2007，〈美國霸權實力何以能持久延續？〉，《社會科學》(11): 43-53。
- 戴曉東，2003，〈單極世界的變數：對單極穩定論的一種批判〉，《國際觀察》(1): 37-43。
- 戴穎、邢悅，2007，〈中國未在聯合國對美國軟制衡〉，《國際政治科學》(11): 19-51。
- 韓召穎，2007，〈美國霸權、均勢與美國大戰略：『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評介〉，《美國研究》(2):129-143。
- 韓玉貴，2007，《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叢鵬，2004，《大國安全觀比較》，北京：時事。
- 嚴家祺，2006，《霸權論》，Hong Kong: Thinkers Publishing。
- 蘇長和，2007，〈中國的軟權力〉，《國際觀察》(2): 27-35。
- 龐中英，2004，《中國與亞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顧立民，2008，〈新世紀中共國家安全戰略〉，載於國防大學編，《97年「國防事務專案研究暨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頁 347-367。
- 蕭全政，2004，〈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23): 1-30。
- 韋宗友，2003，〈制衡、追隨與冷戰後國際政治〉，《現代國際關係》(3): 56-62。

譯本

- 布熱津斯坦・茲比格紐 (Zbigniew Brzezinski)，2008 (2007)，《第二次機遇》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譯者：
陳東曉，上海：上海人民。
- 布贊・巴里 (Barry Buzan)，2007 (2004)，《美國和諸大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譯者：劉永濤，上海：上海人民。
- 阿特・羅伯特 (Robert Art)，2005 (2003)，《美國大戰略》(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譯者：郭樹勇，北京：北京大學。
- 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2007 (2005)，《地區構成的世界》(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譯者：秦亞青，
魏玲，北京：北京大學。
- 杰維斯 (Robert Jervis)，2008 (1997)，《系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複雜
性》(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譯者：李少軍，
楊小華，官志雄，上海：上海人民。
- 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2007，《大國崛起：相對論》，台北：青林國際。
- 馬克・里歐納德 (Mark Leonard)，2008 (2008)，《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譯者：林雨蓓，台北：行人。
- 喬飛・約瑟夫 (Josef Joffe)，2007 (2006)，《美國的帝國誘惑》(Überpower:
The Imperial Temptation of America)，譯者：蔡東杰，台北市：博雅書屋。
- 斐魯忒 (Lucian Pye)，1988 (1968)，《中國人的政治心理》(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譯
者：艾思明，台北：洞察。
- 維尼・伯特 (Wayne Bert)，林芳燕譯者，2005 (2003)，《孰者勝出：美國與中
國在東南亞之爭》(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
Changing of the Guard?)，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謝淑麗 (Susan Shirk)，2008 (2007)，《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China -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譯者：溫洽溢，台北市：遠流。

英文部分

- Aldred, Ken, and Smith, Martin A. 1999. *Superpower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2008.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
- Art, Robert J., Brooks, Stephen G., Wohlforth, William C., Liebers, Keir A., and Alexander, Gerard. 2005.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3):177-196.
- Brooks, Stephen G. 1997.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3):445-477.
- Blair, Dennis C., and Bonfili, David V. 2006. "The April 2001 EP-3 Incident: The U.S. Point of View." in *Managing Sino-American Crise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Swaine, Michael et al. ed.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p. 377-391.
- Brooks, Stephen G., and Wohlforth, William C. 2005.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 Buzan, Barry. 1995.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ed. Booth and Smith. Oxford: Polity Press.
- . 2004.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uzan, Barry, and Wæver, Ole.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eron, Frazer. 2005.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Global hegemon or reluctant sheriff?*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Carleton, William G. 1947. "Ideology or Balance of Power?" In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ed. Robert A. Goldw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 Edward H., 1954.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 Co.
- Cheng, T. J., and Hsu, S. Philip. "Between Power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Rethinking the Post-Cold War East Asia." in *Rethinking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U.S., China and Taiwan*. 2004. Ed. I Yu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p. 425-460
- Chomsky, Noam. 2003. *Hegemony or Survival*.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Calomiris, Charles W. ed. 2007.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oran, Charles F. 1999. "Why Forecasts Fail: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s of 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2):11-41.
- . 2003. "Economic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Single Dynamic" of Power Cycle Theory: Expectations, Competition, and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4 (1):13-49.
- Dyer, Geoff. 2009. "China has long way to go to dislodge dollar", *Financial Times* 21.05. 2009.
- Eckstein, Harry. 1975.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ed. Pye, Lucian W.

- Friedberg, Aaron L. 2005.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 7-45.
- Friedmann, Thomas. 2008. "Imbalances of Power." In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Henning, C. Randall. 2006. "The Exchange-Rate Weapon and Macroeconomic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ed. Andrews, David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17-138.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The Myth of Post-Cold War Chao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ed. Ikenberry. New York: Longman.
- . 2003. "Is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in Declin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 (3):533-550.
- . 2004. "Liberal Hegemony or Empire?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In *American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Koenig-Archibugi: polity.
- . 2005. "Power and liberal order: America's postwar world order in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5 (2):133-152.
- Kagan, Robert. 2002.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113.
- . 2004. "A Tougher War For the U.S. Is One Of Legitimacy." In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 . 2007. "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 *Policy Review* 144.
- Kaplan, Morton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 1966. "Som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ies: An Anthology*.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 Kapstein, Ethan B. 1999. "Does Unipolarity Have a Future?" In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ed. Kapstein and Mastandu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upchan, Charles. 1994.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nteigne, Marc.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acific Affairs* 79(4)
- Layne, Christopher.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4):5-51.
- . 1997.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1):86-124.
- . 2006.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2):7-41.
- Lieber, Keir A., and Alexander, Gerard.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109-139.
- Linklater, Andrew. 1995. "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ed. Booth and Smit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ittle, Richard. 200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st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ttle, Richard, and Smith, Michael. 1991.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a reader*. 2nd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Liu, Yanchun, Kemper, Matthew M., Magrath, Dr. Patrick. 2008. "China's global trade balance discrepancy: Hong Kong entrepôt effects and roundtripping Chinese capital." <http://www.faircurrency.org/pdfs/China%27s%20Global%20Trade%20Balance%20Discrepancy.pdf>
- Mansfield, Edward D. 1994.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standuno, Michael.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4):49-88.
- Mastanduno, Michael, and Kapstein, Ethan B. 1999.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In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ed. Kapstein and Mastandu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5-56.
- . 1995.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82-93.
- .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Norton.
- Mearsheimer, John J., and Walt, Stephen M. 2003. "An Unnecessary War." *Foreign Policy* 134:50-59.
- Molloy, Seán. 2006. *The hidden history of realism: a genealogy of power politics*. 1st e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orgenthau, Hans J. 1973.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rev., reset ed. New York: Knopf :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 Nolte, Detlef. 2006. "Macht und Machthierarchien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Ein Analysekonzept für die Forschung über regionale Führungsmächte."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http://ideas.repec.org/p/gig/wpaper/29.html>
- Organski, A.F.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 Owen, John M. IV. 2001.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3):117-152.
- Pape, Robert A. 2003. "Soft Balancing: How the World will Respond to US Preventive War on Iraq." In *Oak Park Coalition for Truth and Justice*. <http://www.opctj.org/articles/robert-a-pape-university-of-chicago-02-21-2003-004443.html>
- .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 Paul, T.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1).
- Rawski, Thomas G. 2001.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ER*, 12:347-354 <http://www.pitt.edu/~tgrawski/papers2001/gdp912f.pdf>
- Rosenau, James N. 1980.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Rev. and enl. ed ed. London: Frances Pinter.
- Ross, Robert. 2000.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2):87-123.

- .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355-395.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2.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44 (2):235-269.
- . 1999.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In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ed. Kapstein and Mastandun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06. *Unanswered Threa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andall L., and Priess, David. 1997. "A Tale of Two Realisms: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 (1):1-32.
- Schweller, Randall L., and Wohlforth, William C. 2000.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9 (3):60-107.
- Shambaugh, David. 2005. *Power Shift -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05. China's New Diplomacy in Asia.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May), 30-38.
- Sheehan, Michael. 1996.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Sheetz, Mark S., and Mastanduno, Michael. 1997. "Debating the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3):168-174.
- Śliwa, Zdzisław, and Ong, Yulin. 2008.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ecurity or Insecurity for central Asia?", *Kwartalnik Bellona Quarterly* 2:81-89.
- Smith, Steve. 2002. "The End of the Unipolar Moment? September 11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 (2):171-183.
- Snyder, Glenn H. 1996. "Process Variables in Neorealist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5 (3):167-192.
- . 2002. "Mearsheimer's World -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1):149-173.
- Spykman, Nicholas J. 1942.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Thompson,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1999.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 (2):109-140.
-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Data Dissemination Branch. 2009. "U.S. Trade in Goods (Imports, Exports and Balance) by Country."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
- Walt, Stephen M. 2006. *Taming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pp. 3-43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 . 1959. *The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ener, Jarrod. 1995. "'Hegemonic' Leadership: Naked Emperor or the Worship of False G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2):219-243.

- William C. Wohlforth, Stuart J. Kaufmann, Richard Little. 2007. Introduction: Balance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ed. Stuart J. Kaufman.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Wohlforth, William C. 1994.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91-129.
- .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5-41.
- . 2002.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ed. Ikenber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a Hard Case for Idea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2):165-173.
- Wright, Thomas J. 2005. "How States Contain Perceived Threats From Other States; Explaining the Absence of Balanc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ISA 2005 Conference*. Hawaii, USA.
- Wu Xingzuo. 2007. "The Current State of Global Military Security." *CIR* Nov./Dec. 2007:58-77
- Zhang, Gaiyan. 2007.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s: challenges from WTO membership*, eds. Kam C. Chan, Hung-gay Fung, and Qingfeng 'Wilson' Liu.



關鍵詞索引

911 恐怖事件.....50, 57, 61, 64, 72, 93, 170

一畫

一中一台.....157
一個中國.....41, 47, 107, 119, 151, 155
一般性的路徑.....81

二畫

人民幣.....111-113, 115, 117, 120
——升值.....115, 117
——貶值.....120
人權.....99, 124-128, 135, 139, 145
八一七公報.....48, 134, 151

三畫

三個公報.....71, 150
上合組.....53
上海公報.....48, 151
大國外交.....21, 62, 64

四畫

中共
——的國防政策.....125
——的國防戰略思想.....125
——對美國.....125, 157
中東.....7, 10, 39, 47
中美關係. 4, 46, 54, 72, 93-95, 101, 103, 104,
107, 111, 120-122, 124, 127, 128, 134-
136, 141, 142, 148, 151, 152, 157, 158,
168-171
——回溫.....128
——惡化.....124
中國——外交政策.....54, 55, 107, 125
——威脅論.....63, 123, 139
——崛起. 2, 16, 20, 45, 50, 63, 83, 104,
105, 109, 139, 141, 142, 164, 167, 176
中國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
言.....51
互動力.....86, 87
互動的邊際刺激.....89
互補互斥關係.....46
以夷制夷.....105

分析架構.....4, 80, 81, 87, 89
分析單位.....86, 87
反分裂國家法.....155, 169, 170
反民主.....123
反恐戰爭.....48
反戰區導彈系統.....127
反霸.....62, 64, 72, 106, 107
反霸權主義.....62
天下.....105
天安門事件.....121-124, 145
弔詭現象.....20
文化上的吸引力.....165
日本 10, 14, 45, 47-50, 62, 71, 72, 78, 109-
111, 116, 117, 127, 143, 150, 152-154,
156, 168, 171
王逸舟.....53
不支持台灣獨立.....157
不可避免.....34, 46, 95, 99, 146
不安全.....24
不完整霸權.....23
不制衡. 3, 5, 6, 14, 15, 23, 24, 26, 31, 36, 43,
46, 49, 53, 54, 59, 61, 62, 66, 69, 70,
72, 76, 77, 79, 81, 87, 89, 121, 124-126,
142, 147, 165, 167, 169, 172
——政策.....3, 14, 36, 70, 124
不對稱的不完整性.....45
不對稱戰略.....48
六方會談.....51, 52, 148

五畫

世界帝國.....8
世界體系.....18, 30, 57, 63, 107, 144
世貿組.....130
主權 20, 35, 44, 50, 58, 75, 76, 83, 93, 95,
101, 102, 106, 123, 124, 127, 131, 150,
151, 153, 155, 158, 165, 170, 171
出口優勢.....110, 117
印度.....10, 25, 44, 45, 49, 50, 57, 58, 62, 92,
164
可能性空間.....81, 85, 165
台獨.....155
台灣. 6, 20, 41, 47-49, 58, 64, 71, 72, 79, 83,
102, 107, 117, 124, 130, 131, 133-138,

141, 151-153, 155, 157, 158, 168-170
 ——海峽危機.....157
 ——問題. .41, 47, 72, 79, 107, 151, 152,
 155, 158
 ——與台灣關係法.....48
 外匯110-113, 117, 118, 120, 168
 ——改革.....111
 外資35, 110, 118
 布贊(Barry Buzan). .2, 17, 31, 81, 86, 87, 165,
 176
未制衡...4-7, 13-15, 59, 72, 73, 76, 77, 81-83,
 88, 98, 107, 109, 121, 133, 141, 150,
 156, 164, 165, 167, 169
 ——條件.....5, 6, 73
 本土61, 63, 88, 105, 170
 正常貿易關係.....129
正當性...13, 16, 29, 31, 36-38, 40, 41, 45, 46,
 60, 64, 68, 69, 71, 73, 79, 83, 95, 103,
 107-109, 117, 124, 142, 144, 152, 164
 ——威脅.....79
 正當崛起.....16
 正當強權.....46
 北約(NATO).....53

六畫

伊肯貝里(G. John Ikenberry)....2, 11, 12, 17,
 24, 30-33, 47, 56, 109
 伊拉克戰爭.....19, 37, 38, 48, 94, 139
 先發制人原則.....57
 全球化.....19, 39, 42, 54, 109, 117
 全球建制.....29-31, 33, 36, 37, 56, 109, 168
 全球治理.....47, 54
 共同防禦條約.....151
 共產黨專政.....79
 合秩序性崛起.....109
 合秩序性發展.....5, 6, 16
 地緣政治.....26, 87, 168
 多極體系.....41, 103
 多邊安全.....52, 91
 多邊經貿合作.....53
 多邊戰略.....65
安全7, 9-12, 15, 18, 20, 24, 27, 28, 32, 33,
 41-44, 47-54, 57, 63-66, 68, 71, 72, 75,
 78, 87, 91, 94, 95, 97, 101-103, 107-
 109, 112, 121-123, 133, 135, 136, 138,
 141, 146-148, 150, 156, 166, 167, 170,

171
 ——共同體.....44, 53, 54, 91
 ——困境.....24, 54, 95, 97
 ——建制 43, 44, 47, 48, 50, 52, 57, 102,
 146, 156
 ——承諾.....47
 ——網絡.....47
 江澤民. .51, 121-123, 125, 127, 128, 136, 152
 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1, 17, 27,
 109
 自由主義.....29, 38-40, 53, 62, 164
 自助原則.....20, 49
 自我形象.....63
 自然規律.....63
 防守型的現實主義.....43

七畫

低度制衡.....13, 15, 49, 66, 67, 69, 70, 73
 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136
 均勢1, 10-13, 15, 18, 19, 21, 22, 134, 170
 改革開放.....51, 69, 107, 111, 119, 124
 攻擊型現實主義.....43
 沃爾弗斯(William Wohlforth)....2, 17, 27, 39,
 73, 144
 沃爾特(Stephen Walt)....17, 26, 27, 56-59, 73,
 164
 沙特(Robert G. Sutter).....2, 53, 54, 61
 社會內聚程度.....67-69, 165
 社會主義.....21, 62
 走出去.....20
 阿富汗戰爭.....38, 48
冷戰 ...2-5, 7, 8, 14, 18-20, 22, 23, 30, 33, 34,
 39, 40, 42-44, 46, 48-51, 53, 59, 62, 70,
 71, 94, 101, 102, 107, 109, 121, 123,
 124, 128, 139, 140, 144, 148, 150, 152,
 153, 157, 168
 ——後.....2, 3, 5, 7, 8, 23, 46, 48-51, 62,
 124, 140, 144, 157
 利益承諾.....158
 利益衝突.....52, 76, 96, 97
 李登輝.....134, 135, 137, 157
 里斯(Thomas Risse).....35, 52, 136

八畫

- 亞太主義.....64
 亞太解軍會議.....123
 佩浦(Robert Pape).....2, 38
 具備類型特徵的研究途徑.....80
 制度結構.....30
 制裁.....125, 137, 138
制衡 1-8, 12-15, 17-19, 22-26, 29-33, 36, 38-46, 49, 51-54, 56-59, 61-64, 66, 67, 69-73, 75-79, 81-83, 86-89, 91, 93-100, 102-109, 119, 121, 124-126, 129, 133, 139-142, 146-150, 156-158, 164-172
 ——反應.....1, 6, 46, 57, 59, 82
 ——失敗.....15, 61, 66, 82, 142
 ——因素.....24, 72, 77, 89, 95, 98, 169, 172
 ——門檻.....8, 17, 18, 22
 ——局限.....141
 ——條件.....5, 6, 13, 71, 73, 75, 158
 ——誘因.....121, 141, 158
和平 2, 6, 9, 12, 14, 16, 17, 21, 31, 41, 62-64, 76, 95, 103, 125, 127, 128, 134, 143, 151, 153-156, 168
 ——友好條約.....153
 ——共處.....62, 125, 153, 154
 ——共處五原則.....125
 ——崛起.....16, 63, 64, 76, 156
 孤立政策.....124
 建交公報.....48, 151
 明顯讓步.....128
 東北亞.....5-7, 10, 44, 50
東亞 ..5, 14, 20, 33, 34, 36, 44-53, 57-59, 62-65, 67, 70, 72, 77, 78, 83, 94, 98, 101, 103, 104, 108, 111, 112, 123, 127, 138, 146, 148, 156, 157
 ——貨幣基金.....111
 東協(ASEAN). 48, 62, 107, 112, 148, 156, 171
 東南亞.....7, 10, 44, 48-50
 東南亞共同防禦條約.....48
 東盟.....44-46, 48-51, 153
 爭霸.....14, 19, 63, 64, 72, 109, 111, 118-120
 表層結構.....61
 限制 ..5, 6, 10, 24, 48, 51, 60, 61, 71, 78, 84, 87, 91-94, 98-101, 103, 123, 129, 134, 145, 156-158
 非洲.....7, 9, 39

- 金融危機.....49, 112, 117, 138, 156
 金融體系.....109, 110, 118
 拉近友好關係.....53
 拉近距離.....72, 89, 93-96, 98, 101, 102, 117, 119
 兩個中國.....157
 兩國論.....157

九畫

- 俄國 ..9, 14, 23, 24, 26, 33, 34, 45, 51-53, 57, 58, 134, 136, 147
 保守派.....101, 125
 保持距離.....57, 72, 89, 93-96, 98, 100, 102, 104, 124, 129, 157, 158, 166, 171
 保羅(T.V. Paul).....2, 17, 40, 58, 66
 信賴度.....137, 138
 南沙群島.....44, 50, 51
 南亞.....7, 10, 44, 48-50, 63
 南美洲.....7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51
 南斯拉夫.....127, 128, 130, 139
 南韓.....44, 47, 49, 112, 168
 城鄉差距.....68
威脅 1, 9, 12-15, 23, 24, 26-29, 40, 42-44, 46, 49, 51, 56-61, 63-67, 69, 71-73, 78, 79, 81, 83, 87, 91, 95, 96, 102, 105, 109, 121, 123, 126, 133, 134, 136, 137, 139, 141, 142, 144, 147, 153, 164-170, 172
 ——平衡理論.....164
 ——感受.....59, 91
 威嚇.....89, 102, 128, 138
帝國 ..8, 23, 38, 62, 105, 176
 ——秩序.....23
 挑戰1, 17, 20, 21, 23, 24, 37, 81, 119, 164
 施羅德(Paul W. Schroeder).....1, 66
 政治腐化.....68
 政治套利的策略選擇.....48
 政經威脅.....79
 政經發展.....68
 政權脆弱性.....68
 政權穩定.....95, 165, 170, 171
 施韋勒(Randall Schweller).....1, 27, 57, 66, 67, 73, 82, 141, 165, 166
 柯林頓(Bill Clinton).....118, 122, 127, 129, 135-137, 157
 相互依賴33, 35, 36, 45, 46, 53, 58, 65, 71,

- 72, 109, 117, 118, 130, 131, 141, 148,
168-170
- 相對利益.....107
- 研究方法.....75, 80, 84, 86
- 研究假說.....75
- 約束力.....23, 31, 34, 35, 51, 52, 71, 135
- 約束衣.....22, 23,
- 美日安保.....48, 156
- 美國**
- 未遭制衡.....1, 56, 75, 77, 88, 105
- 柔軟.....138
- 單邊主義.....64
- 優勢.....58
- 霸權.....2, 7, 8, 27, 30, 33, 39, 64, 87,
106, 119, 133, 139, 142
- 美菲協防條約.....47
- 美澳紐協防條約.....47
- 美韓共同防禦條約.....48
- 胡蘿蔔加大棒.....71, 72, 124, 126
- 負責大國.....20, 21, 34, 35
- 軍事**
- 主義.....97, 123
- 存在.....22, 44, 46, 50, 51, 171
- 威脅.....1, 13, 29, 61, 95, 102, 109,
134, 165, 166
- 發展速度.....46
- 預算.....23, 61, 72, 139, 143, 144
- 實力.....5, 6, 9, 13, 20, 24, 45, 47, 52,
71, 73, 76-78, 117
- 練習.....48, 50
- 競賽.....14, 42, 49, 58, 61
- 軍艦外交.....127
- 迴避衝突政策.....156
- 追隨(bandwagoning)....1-3, 21, 46, 50, 67, 76
- 逆差.....113-115, 117

十畫

- 務實外交.....50, 59, 96, 119, 133
- 弱肉強食.....20, 105
- 恐怖主義.....48
- 核心利益.....75, 76, 78, 83, 103, 119, 142, 157,
158, 166, 169, 170
- 核武** 14, 18, 22, 26, 28, 42, 47, 49, 52, 58,
101, 107, 123, 127, 136, 137, 153, 166,
170, 171
- 器擴散.....153
- 秩序 3, 5, 6, 11, 12, 16, 20, 21, 23, 27, 31,

- 32, 34, 39, 40, 45, 46, 53, 54, 69, 73,
75-77, 79, 91, 102, 109, 123, 168
- 缺乏制衡.....2, 140, 164
- 缺乏威脅.....56, 168
- 通貨膨脹.....115, 118
- 陷阱.....5, 6, 98, 117-119, 133
- 華爾茲(Kenneth N. Waltz) 1, 2, 19, 66, 73, 86,
109
- 馬來西亞.....50, 112
- 連結因素.....164, 169

十一畫

- 假說產生.....4, 80, 84, 85
- 偵察機.....132
- 區域**
- 大國.....7, 10, 33, 45, 51, 95, 108
- 性的層次限制.....98
- 極.....7, 10, 44, 47
- 結構.....71
- 環境.....72, 94, 146, 148, 165, 166
- 霸權.....27, 100, 148
- 國內因素.....15, 24, 42, 59, 61, 66, 72, 82
- 國內層次.....82, 93, 165
- 國家**
- 利益....9, 13, 20, 29, 71, 75, 78, 91-
93, 95, 98, 99, 131, 141, 150, 152, 155,
157, 158, 169-172
- 能力.....75, 158
- 意圖.....71
- 層次.....61, 75-77, 141, 157
- 國債.....112, 115-120, 168
- 國際**
- 法.....30, 63, 128
- 金融市場.....110
- 金融穩定.....109
- 秩序.....12, 16, 20, 39, 73
- 組織.....30, 33, 35, 54, 55, 64, 102,
152
- 基本利益.....54, 81, 96, 97, 104, 121, 150
- 基本路線.....125
- 基石方法.....84
- 張登及.....2, 6, 9, 12, 14, 16, 17, 21, 31, 41, 62-
64, 76, 95, 103, 125, 127, 128, 134,
143, 151, 153-156, 168
- 強手途徑.....72
- 強國崛起途徑.....46
- 強權 1, 2, 5, 7-9, 12, 15, 16, 20, 23, 26, 27,

30, 31, 33, 36, 37, 41, 45, 46, 51, 57,
58, 63, 66, 69, 75-77, 79, 82, 91, 92, 94,
96, 98-100, 103, 105, 109, 117-119,
127, 128, 158, 164, 165, 167, 168, 171,
172, 176
推翻現狀.....41, 82, 108
深層結構.....44, 87, 91, 101, 103
清邁協議.....111, 112
現狀 1, 5, 11, 13, 14, 16, 17, 20, 21, 29, 38-
41, 45, 47, 57, 59, 63, 64, 69, 72, 78,
82, 89, 94, 107, 108, 119, 123, 124,
131, 133, 134, 139, 141-143, 149, 164
第一個假說.....76, 141
第二個假說.....121
第二意向回歸.....66
菁英內聚程度.....67
菁英共識.....67, 165
菲律賓.....47, 48, 50, 78, 97, 168
萊恩(Christopher Layne).....2, 27, 109
貧富差距.....68
貨幣.....111-113, 118
軟性制衡.....2, 13, 15, 119
軟權力.....9, 10, 23, 24, 29-33, 38, 40, 41, 73,
83, 91, 101, 142-145, 165, 168
進入制衡.....95, 102, 158
異途同歸.....81, 82

十二畫

善良霸權.....2, 73, 119
喬飛(Joseph Joffe).....23, 176
單極的瞬間.....2
單極體系 4, 5, 7, 8, 19, 41, 57, 59, 86, 87, 98,
101-103, 109, 128, 141, 144, 164, 167
圍堵戰略.....72
尊重利益.....77, 96, 121, 141, 142, 168
朝鮮半島.....52
無政府狀態.....12, 20, 44, 49, 50, 91, 94, 101
發展模式...110, 117-119, 165, 166, 168, 170,
171
策略性關係.....136, 137
結構
——主義.....2, 7, 18, 27, 56, 67, 71, 86,
109, 149, 164, 170
——限制.....91, 93, 98, 157
——刺激.....75, 77, 98, 102
——慣性.....14

——誘因...75, 77, 78, 89-91, 95, 96, 98,
102, 109, 167
統一.....89, 105, 134, 155
補充 2, 6, 9, 12, 14, 16, 17, 21, 31, 41, 62-64,
76, 95, 103, 125, 127, 128, 134, 143,
151, 153-156, 168
超強 .7-9, 22-24, 39, 73, 76, 89, 92, 103, 165,
170, 171
超脫.....139
越南.....44, 50
集體安全.....52, 53
葉利欽(Boris N. Yeltsin).....136

十三畫

債券.....112, 115, 117, 118
匯率.....110
匯率雙軌制.....110
意外說.....130
意圖 13, 15, 38, 47, 54, 56, 57, 59-61, 63, 66,
69, 71, 99, 119, 140, 143, 144, 146, 164
意識型態 11-13, 39, 48, 50, 51, 56, 57, 59,
67, 68, 71, 72, 91, 95, 103, 144, 148,
170
愛國主義.....128, 133
慈善性.....29, 38-40, 164
摸著石頭過河.....125
新三不.....157
新宮澤倡議.....111
新現實主義.....19, 62, 81
新興強權...36, 37, 75-77, 91, 92, 96, 98-100,
109, 119, 158, 164, 165, 167, 168, 171
溢出效應.....43
溫家寶.....118
睦鄰.....46, 50, 63, 64, 70, 72, 78, 98
睦鄰外交.....46, 50, 63, 72, 98
綏靖效應.....35, 36
經貿優惠國.....124
經濟 44-46, 69-72, 77-79, 107-113, 115-120,
122-126, 129-131, 147-150, 156-158,
168-170
——危機.....48, 49, 65, 107, 111, 156
——成長.....79
——泡沫危機.....156
——發展..1, 5, 6, 15, 51, 54, 58, 62, 69,
70, 75, 78, 86, 110, 119, 139, 152, 156-
158, 166, 168, 170

解釋

- 力.....87
- 來源.....86, 87
- 變數.....24
- 誠實捐客.....33, 57

十四畫

- 廣場協議.....111, 117
- 鄧小平.....64, 121, 122, 124, 125, 139
- 問學通.....16
- 領導階層.....29, 71, 72, 124, 166

十五畫

- 彈道飛彈防禦體系.....72
- 德國.....10, 14, 38, 49, 52, 71, 125, 143
- 敵友關係.....87, 91, 95, 96, 103, 166, 169
- 歐洲.....7, 9, 12, 19, 26, 33, 39, 44, 166
- 澳洲.....10, 47-49, 168
- 衝突.....3, 12-14, 34, 35, 39, 44, 46, 48, 52, 54, 59, 60, 63, 69, 76, 78, 91, 94, 96, 97, 103, 107, 109, 119, 131, 137, 146, 149, 151, 156, 157, 164, 168
- 矩陣.....44, 91, 94, 103
- 駐外部隊.....22, 26
- 駐南大使館.....127

十六畫

- 戰略.....14-16, 42-44, 58-66, 147-149
- 整合.....1, 89, 95, 98, 101, 102, 167
- 積極制衡.....64
- 避免啟動制衡機制.....46
- 避險戰略.....62

十七畫

- 優勢地位.....22
- 擴張主義.....63, 72, 143
- 聯合**
 - 公報.....107, 152, 153
 - 宣言.....51, 154
 - 國....30, 45, 64, 102, 107, 127, 128, 139, 144, 153
 - 新聞公報.....154
- 聯車(bandwagoning) [= 追隨].....48, 57
- 聯盟 18, 19, 22, 23, 30, 33, 45, 52, 56-58, 78,

82, 128, 147, 158, 166-168

十八畫

- 雙極體系.....41, 103
- 離岸平衡者.....8, 27, 43, 57

十九畫

- 懲罰.....22, 36, 70, 89, 123, 126, 129, 131, 133-135, 137, 169
- 蘇聯.....8, 14, 19, 59, 124, 139
- 瓦解.....8, 59, 124
- 韜光養晦.....21, 64, 65, 139
- 類型.....4, 21, 35, 80-84, 89, 142, 166, 167
- 化架構.....80, 82-84
- 理論.....35, 80-83

二十畫以上**權力**

- 分配 8, 9, 11, 12, 18, 19, 31, 32, 40, 73, 87, 91, 141, 142
- 分配漸漸.....18
- 平衡. 1, 5, 11, 12, 19, 23, 46, 48-50, 53, 54, 56, 78, 119, 134, 164, 166
- 是命運.....53
- 為善.....24
- 為惡.....24

- 霸權** 2, 5-9, 11-15, 19-24, 30-33, 36-39, 62-64, 91-94, 98-101
- 主義.....62, 63, 127
- 地位.....23, 27, 33
- 制度.....32, 33, 87
- 慈善性.....38
- 框架.....31
- 秩序.....23, 31, 32
- 說.....17, 22-24, 69
- 論.....27, 31, 73
- 體系.....59

體系

- 限制.....98, 100, 129, 156
- 結構.....5, 35, 71, 75, 98, 101, 109, 165
- 層次...5-7, 9, 44, 45, 61, 65, 71, 77, 81, 82, 86, 99, 101, 143, 158, 165, 169
- 變數.....24, 60, 61, 80-83, 85, 141

論文：美國單極體系為何未遭制衡？——中國合秩序性崛起的個案研究
英文：Why Is The US's Unipolar Sytem Still Left Unbalanced? —
A Case Study On China's Order Confirming Rise to World Power
作者：Christian Schmidt (柯斯安)
地點：台北市文山區
大綱口試：2008.12.12
論文口試：2009.07.06
口試委員：陳牧民(主席)，陳士民，徐斯勤
頁數：188
句子：1997
詞數：56972
字數：133672
註：104
最後更改：07/28/2009
時間：07:17:37 AM

